

目次

武夷文化研究

- 朱熹修养工夫论的基础、内容与特征 李淑婷 (1)
从仪式到文化展演——武夷山喊山祭茶仪式变迁
..... 何 英 (6)

马克思主义研究

- “两山”理论的辩证意蕴及时代价值
..... 刘福强, 尤秋丽 (12)
马克思历史进步观的主体向度探析
——兼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民主体理论的创新发展
..... 韩博文 (18)
新时代廉洁文化的价值意蕴及实践向度
..... 喻兴平 (25)

社会·经济研究

- 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振兴: 内在逻辑、基本特征与
实践指向 李 苑 (32)
风险投资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来自新三板中小企业的经验证据
..... 周 蕾, 张礼风 (38)
慈善信托主体的权责配置与建构维度
..... 许冬琳 (45)

传播·艺术研究

- 数字叙事视域下地方文化国际传播路径
——以闽商文化为例 江盈盈 (52)

武夷学院学报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674-2109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5-1293/G4

第43卷 第7期 总第237期

2024年7月 (月刊)

编辑委员会

- 顾 问: 付贤智 黄汉升 兰思仁
杨江帆 李宝银
主 任: 吴承祯
副 主 任: 郑细鸣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卢道明 任宇红 刘卫群
许亦善 李远华 李宝银
杨 昇 吴承祯 沈慧芳
张乔根 张志雄 张国林
张品端 陈 铎 郑细鸣
赵升云 姜景莲 姚进生
郭翠莲 梁丽萍 雷能忠
廖 斌

编辑部

- 主 编: 吴承祯
副 主 编: 郑细鸣 沈慧芳 陈 果
责任编辑: 叶丽娜 白 琳 魏 琛
马阿曼 黄 超
英文审译: 魏景春

JOURNAL OF WUYI UNIVERSITY

目次

CONTENTS

融媒体场域下地方传统戏剧的文化遗产

——以粤剧为例 贺雪玲 (58)

苏绣图案元素在现代首饰设计中的形态表现

..... 黄鲁坤, 杨莹 (65)

数字戏曲界面适老化包容性设计 陈雷 (71)

思想政治与党建研究

高校思政课讲好中国故事探究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课程为例 张云霞, 卢艳兰 (78)

独立学院“党建+美育”融合发展路径探析

——以福州大学至诚学院传媒与设计系为例

..... 张文春, 林逢春 (85)

教育教学研究

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理论关联、分析框架与协同

进路 陈清森, 杨天平 (90)

大学生同伴排斥对学习投入的影响机制及自我肯定的

干预作用 戚心洁, 薛罕艺, 连榕 (97)

数字化转型下 SECI 多模态教学模式实践

..... 张姗姗, 陈欣, 方小枝 (104)

朱熹修养工夫论的基础、内容与特征

李淑婷

(安徽大学 哲学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儒家自先秦便有注重修养工夫的传统。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构筑了一个以“天理”为核心的哲学体系,以本体论和心性论为修养工夫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朱熹对“四书”等儒家经典的诠释入手,可以根据内在逻辑将其修养工夫论总结为“居敬涵养”“去欲复理”“格物致知”三部分内容,提炼出“整体性”“实践性”“主体性”“社会性”四大特征。这一结构为整体理解朱熹的哲学思想提供了工夫论视角,呈现了理学的特性与价值。

关键词:朱熹;理学;修养工夫论;格物致知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4)07-0001-05

修养工夫论是儒学的传统内容,在先秦儒家经典对于理想人格的描绘中就蕴含着最初的修养方法,只是尚无明确界定或专门论说,到了北宋理学家那里才得以展开集中讨论。朱熹基于其理气论和心性论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养工夫体系,为形而上的哲学理论开辟了一条落实到人生中的实践途径。他继承并发展了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1]的双重路径,将“敬”置于首要位置,以“格物致知”为核心,通往“内圣外王”的传统儒家理想人格。由此可见,修养工夫论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占据了独特位置,并且明确体现了理论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从整体角度和实践层面研究朱熹哲学思想时不可忽视的部分。

一、修养工夫论的基础

(一)理气论

朱熹综合张载的气本论和二程的理本论,将“理气”作为宇宙本体,但这并不是某种妥协的二元论。理在天地之先便已存在,是一个自然的世界,有理便生出气来,气中已经有理,进而流行发育万物。理与气不可分,也没有先后之说,而细究起来,理在逻辑上更为

根本,是事物所以然的本体,没有理则气无“所从来”,没有气则理“亦无挂搭处”,二者不离不杂。朱熹将理规定为无形体、无作为的自然法则,其中包含着事物的本质与发展的可能性,是事物之所以然,具象的事物只是已经存在的理的发用,即“理在事上”。在此基础上朱熹进一步解释了程颐提出的“理一分殊”,认为天地之间的理只有一个,而“万物各有一太极”^[2],虽然事物各自禀受的理表现不同,但自身的性理是一个完全的、整体的太极。

人类社会的伦理关系也是这个总体的理在道德领域的体现,并具体表现为各种准则、规范。“理”字在理学的语境下,一方面指万事万物必然遵循的自然规律,另一方面指封建社会建立并实施的道德原则,“而这两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即道德原则实质上是宇宙普遍法则在人类社会的特殊表现而已”^[3]。在理气论的视域下,“仁”是天地之理,也可称为生生之道,正是仁的发用流行贯彻到万事万物之中,赋予它们性质和存在的依据,再通过气构成形质,才形成这个世界,仁自然也蕴含于一切事物中。圣人发现了人们心中潜藏的仁性,便根据这一天地之性制定社会法度规范,教导人们以符合天理的方式生活,并总结出一套修养工夫帮助他人反省内心、明晓天理。儒学的本质正在于此。

(二)心性论

《中庸》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4]之言,程颐及其后学曾针对何谓“未发”

收稿日期:2024-04-05

作者简介:李淑婷(2001-),女,汉族,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儒家哲学研究。

“已发”及如何相应地修养进行讨论。朱熹原本以为人心始终处于运动的“已发”状态,相对静寂的性就是“未发”,但经过“己丑之悟”,他转而认为已发未发是心理活动的两种不同状态:尚未接触事物、没有产生思维活动的状态是未发,不偏不倚的“中”描述的就是不可见的“性”;一旦心性事物相互作用产生了思维意念,就进入了已发的状态,这种可见的表现称为“情”;心作为总体包含和主宰“性”“情”。这一划分扩展到修养工夫论上就是“未发工夫”与“已发工夫”的兼重。

在性的问题上朱熹与张载相似,将人性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前者禀受天理而成,也正是《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4]的涵义,因而是至善的;后者是人禀气成形后具有的性,气质清浊对“天命之性”不可避免地造成遮蔽,本性中天理之善的表露受到影响,不能完全显露甚至呈现为恶,而解决办法就是修养身心,通过学习加以纠正。

如此一来,朱熹的心性论既提供了人性本善的形上依据,又解释了人有恶行的生活现象,较为完满地解决了修身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问题。

二、修养工夫论的内容

朱熹对修养工夫的论说较多,并且对工夫的内涵作了明确的定义:“所谓功夫者,不过居敬穷理以修身也。”^[2]他强调无论是研究学问还是修身养性都必须按照次序循序渐进,“当以其大而急者为先,不可杂而无统也”^[2],故本文选择依照逻辑推进的顺序进行归纳并依次展开论述。

(一)居敬涵养

在朱熹的修养工夫论体系中,就实践层面而言,时间次序以“格物致知”为先,但就理论层面而言,逻辑上“居敬涵养”最为重要。《大学》三纲领以“明明德”为首,次说“新民”和“止于至善”,就是因为心是“身之所主”^[4],此后一系列工夫都建立在明了心中之理的基础上。明天理去私欲之后,心无偏私则德全,即达到了“仁”的境地,圣人能够将此仁心加以存养不放逸,言行自然中正得当,以至于可以教导他人依道而行。所以工夫必须先从本心做起,再慢慢向外、向他人推去,

修己而后治人。朱熹发挥了程颐“涵养须用敬”的思想,认为“‘敬’之一字,真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2],并且须“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2],可见朱熹对“敬”不仅高度重视,还提出了较高的方法论要求。国内学者对“敬”的知识性解释主要有“畏”“收敛”“惺惺”“主一”“整齐严肃”等条目,基于共同的出发点和目的,几种说法之间可以相互会通。“‘敬’字要体得亲切,似得个‘畏’字”^[2],在“敬”字上做的工夫和体会的感受与“畏”类似,而“收敛”“整齐严肃”“惺惺”描述的正是这一心理状态的实现方法和表现形式,故可以一“敬”字贯通统领。朱熹这种涵养工夫建立在心性论基础上,同时又构成了致知工夫的基础:“人之一心,本自光明。常提撕他起,莫为物欲所蔽,便将这个做本领,然后去格物、致知。”^[2]这一工夫对修养主体提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要求,就是持之以恒、不可间断,提防此心陷入昏睡。在解释“子在川上”章时,朱熹指出:“天地之化,……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4]正因天地之道如同流水生生不息,万物皆与道同体而能无穷无尽,所以学者体道也应落在“不息”二字上。像“居敬涵养”这种用在心上的具体工夫,需要由内而外发挥作用,因而更有时刻警醒的必要,“随事专一,谨畏”^[2],无事也不涣散走作,“专一”要求的精神集中是时常唤醒、长久用力,熟练了便养成习惯,不管有事无事都能保持内心居敬不动。“日用之间,无少间隙,而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4]只有始终沉浸在修养的状态中,积累渐进,才能潜移默化地步入圣贤之境,一举一动近乎本能地合于道。概括来讲,朱熹将“居敬涵养”作为“未发工夫”,主要用于心未发时,在思虑和情感产生以前,通过提撕、端庄、集中注意力、收敛身心等外在行为和内在精神活动涵养德性,使内心长期保持一种严肃敬畏、警醒专注的状态,既不自行放纵也不受外在因素干扰,从而为下一步的修养“准备充分的主体条件”^[3]。

“居敬”是“涵养”的主要方法,“涵养”的对象是已经觉醒但尚处于平静状态下的本心。朱熹将养心作为第一步工夫,是因为“识得此心,使无走作,虽不加防闲,此心常在”^[2]，“涵养”的影响是深远长久的。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朱熹极重视“居敬”,但“敬字工夫,乃是圣学之入门,非是圣学之归宿”^[5],而进一步的工夫就

是涵养本心基础上对天理的认知。

(二) 去欲复理

“敬则天理常明,自然人欲怨室消治。”^[2]以“居敬涵养”的工夫保持心中光明,自然能识得天理、消除人欲,如同磨亮的镜子,“其明无所不到”^[2],可以照见一切事物。但天理为欲望所遮蔽,要有意识地去“复”才能识得。人能“复理”的前提是“心具众理”,即认识主体先天具有认知能力,因此发明物理的过程就是用心中之理与外物之理相互印证的过程,也正是“与天相通”的过程。“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4]在朱熹的理论体系中,性禀自天理,而天道是天理之本体,也就是说性间接地与天道相通,这使性的可知与可复成为可能。

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的传统话题,而天人相通是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的一个极为根本的观念,天同时是人的根本和理想^[6],但天人之间存在着原则上可贯通而实际上有分歧的问题,理学家着力构建本体论和人性论正是为了证明前者并解释后者。天人之间的“背离”在社会道德层面表现为义利矛盾,在个人道德层面表现为理欲矛盾,因此如何看待和处理天理与人欲的冲突是修养工夫论不可避免的话题。自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4]起,“以理节欲”就成为儒家固有的观点。朱熹接续二程对《尚书》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4]进行阐释,认为人心中有形气带来的欲望,不过“人欲中自有天理”^[2],欲望的产生本身具有合理性,只是其中过分追求满足以致不顾道义的部分属于私欲,如果不加以控制会泯灭天理,使心陷入危险,如同泛滥的洪水会带来灾难。但天理赋予的道德潜在于心中,微妙难见不易察觉,所以必须明理灭欲,反省内心、克制私欲、显露道德,恢复人心的本来面目。朱熹比起理论上的分辨更重视实践中的工夫,宣称天理渐明则人欲自消:“这边功夫多,那边不到占过来。若这边功夫少,那边必侵过来。”^[2]

朱熹主张去除的是与公众利益相冲突的私欲,并没有全盘否定人的自然生理欲望。他鼓励人发现、保全、彰显自身区别于动物的人性,因为正是这些人所特有的品质使人能够和谐相处并构成社会组织,可见这套工夫论的目的在于教导人们服从社会道德规范,防止为追求个人利益而破坏封建等级秩序。“去欲复

理”本质上是向善去恶的自我修养,“去欲”的必要前提是“居敬涵养”,“复理”的关键方法则是“格物致知”。

(三) 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是朱熹认识论的核心概念与主要特征,也是能够概括其修养工夫论的关键词,相较于“居敬涵养”而言,“格物致知”属于“已发工夫”。根据《大学》中“格物”与“致知”两个条目,宋代理学家试图建立起一套新的修养工夫,朱熹继承了程颐的格物论并将其提升到整个理论体系的重要地位,认为“《大学》是圣门最初用功处,格物又是《大学》最初用功处”^[7],格物是最先进行的修养工夫。他将“物”解释为“事物”,将“知”解释为“知识”,而“格”就是“至”“尽”,而“致”就是“推及”;所谓“格物致知”就是对事物的认识达到极至,以致识得天下一切事物之理。“格物”实际上包括“即物”“穷理”“至极”三个阶段:首先广泛接触具体事物,心中必然产生相应的思维意识;其次要研究所接触的事物所以然之理,“穷得这事当如此,那事当如彼”^[2],即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且必须将每一事物的理“穷”到极致:须是“穷尽得到十分,方是格物”^[2];最后是“穷理”应该达到的效果,即“天下事物之理,知无不到……无所不知”^[2]的“知至”境界,对贯通在事物之中的普遍之理“彻骨都见得透”^[2],心中知识自然没有不尽之处,工夫做到了这一步,德性日用便可取代物欲,流行的就只有仁了。“……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4],穷物之理便是致心之知,后者是前者自然而然的结果。在这个逻辑关系中,“格物”才能“穷理”,而“穷理”即是“致知”,因此“致知”需以“格物”为基础,二者不可分割。

“格物致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认识活动,因为“世间之物,无不有理,皆须格过”^[2],起初在个别的具体事物上“格”,然后“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2],在不同的事物上不断重复“格”的操作,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产生质变,“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2]。“贯通”指人对事物的认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实现由形而下进到形而上的认识层次的飞跃,客体与主体相统一,表现为一种心中明朗的独特精神体验:“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4]朱熹对这个过程作了详细描述:“于这一物上穷得一分之理,即

我之知亦知得一分;于物之理穷二分,即我之知亦知得二分;于物之理穷得愈多,则我之知愈广。其实只是一理。”^[2]这一工夫是以朱熹的理气观为理论基础的,因为天理完整地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又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理一分殊”决定了认识对象的广泛性和认识方法的多样性,即“由殊求一”：“无事不要理会,无书不要读。”^[2]

《孟子·尽心》篇集中讨论了心性及其工夫问题,开篇首句便是:“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4]朱熹对此解释称,人心中包含着禀自天的道理即所谓性,知性即知天,对性的认知不能止步于理会的层面,必须知得尽了才是“尽心”,而“知性尽心”就对应着工夫领域的“格物致知”。张岱年曾指出:“认为致知方法与德行涵养有相依不离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6]朱熹的“致知”并不是单纯的知识论。由于与“天理”的双重含义相对应,“知”不仅是关于客观事物的知识,还包括了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知识,在这个意义上,“格物致知”使人认识到了内心天生具有的道德原则,于是顺理成章地遵从外在社会规范,以道德规范自己的行为。

三、修养工夫论的特征

朱熹的修养工夫可以提炼出以下四个主要特征,这也是他的哲学思想区别于其他理学家的关键。将修养工夫论视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有助于发现这些特征产生的深层原因。

(一)整体性

就修养工夫论的内在结构而言,它是一个各部分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整体,共同保证理论推行后取得理想效果。居敬是收敛持守的道理,穷理是推寻究竟的道理,针对居敬和穷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工夫,朱熹强调:“主敬、穷理虽是二端,其实一本。”^[2]又说:“持敬是穷理之本;穷得理明,又是养心之助。”^[2]不穷理则见不到义理,不持敬则把握不住,二者只是从不同方向呈现了同一过程。学习知识与道德修养相辅相成,如同走路,两足交替才能推动整个人前进,因此初学者“须是功夫都到,无所不用其极”^[2],思索义理和涵养本心不可偏废,各方面工夫都要用力去做,做到“由

乎中而应乎外,制于外所以养其中也”^[4]。

就修养工夫论的实际运用而言,知与行亦组成一个不可分的整体。朱熹主张“知、行常相须”^[2],既反对脱离实践停留在心性层面,也批评抛下养心工夫而一味埋头实践的现象:“有人专要理会躬行,此亦是孤。”^[2]不行则知没有意义,不知则行无从得来,如同走路,眼与脚协调合作,眼提供方向、脚提供动力才能顺利前进,因此必须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实践。

(二)实践性

朱熹将自己的工夫论总结为“工夫全在行上”^[2]。他虽然主张内外兼修、知行合一,但相比之下知易行难,而修身正是由“内圣”推出“外王”的关键步骤,所以格外注重对行多加论说。“居敬涵养”的“敬”并不是把事放到一边不管不问,而是随着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在事上体会专一谨畏的态度;“去欲复理”“格物致知”的“理”与“知”都涉及人伦日用,自然要“复”要“格”,同样要在事与物上下工夫。

修养工夫“须从事上做”,最终成效也要由实践检验。对于知与行这对传统范畴,朱熹认为在先后关系上知为先,但在轻重关系上行为重,即使是论学也不能完全抛开行来谈:“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2]“致知”是“为学”的基础与关键,“力行”是“为学”的目的与结果,要博学更要笃行。

(三)主体性

在内容上,“修身”修的是自己之身,“涵养”养的是自己之心,儒家的修养工夫总是先从自己做起、再推及他人,对本心的反省加深对自我的认识,达到个人与他人、与社会、与世界的和谐统一,即“由个体道德理性向集体道德理性转化”^[8]的过程。“理一分殊”的本体论决定了修养因人而异,使这套方法以及实践体验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能否提高道德自觉、培养理想人格则取决于修养主体,从而摆脱了意志上对宗教神灵的依赖。

在讲学中,朱熹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为“引路人”“证明人”,与弟子的关系仅限于遇到疑难时共同商量、在必要时适当引导点拨,很大程度上给予了学生学习和实践的自主性。他强调“敬”字存于心中,即唤即醒,与《论语》中“为仁由己”本质相通,自己对自己负责,“作与辍都不干别人事,须是自家肯做”^[2]。又叮

嘱学生“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2],自觉地践行认识到的理,不仅要实践,而且要亲自去实践,在实践中真正完成学习与修养。

(四)社会性

理论上,“理”的普遍性为修养工夫的社会性提供了形上学依据,使人们在社会中的伦理行为具有社会性,倾向于选择利他性原则,所处集体的共同利益优先,将自我奉献服务社会作为分内职责^[9]。朱熹推崇的修齐治平与“横渠四句”等先贤言论一样,流露出士人阶层特有的历史使命感,这是儒家自孔子以来传承不变的精神与情怀,正是在它的感召下,社会才能摆脱动荡、恢复秩序,文化命脉才得以延续至今。

实践上看,儒家的传统是修己而后安人,朱熹的修养工夫正是继承并发展了这个传统。个人只是出发点,要时刻提醒自己修身后面还有家国天下,修养是一个漫长的、逐步推广扩大的过程,其实有着宽广的视野和远大的志向,终极目标是影响社会,实现更高的价值。儒学不是纯理论,儒家知识分子的各种观点不是纯粹思辩的产物,一代代儒者将自己的政治诉求融入哲学思想中,归根结底还是着眼于“内圣”之后的“外王”。

四、结语

朱熹的修养工夫论主要由“居敬存养”“去欲复理”“格物致知”三部分组成,具有整体性、实践性、主体性、社会性等特征,这一结构既是基于其理气论和心性论的内在逻辑发展形成的,也是人们在修养自身

的实践中应当达到的理想状态。三种工夫各有侧重,是自我修养这一总过程的不同阶段,围绕“存天理、灭人欲”这个思想核心层层递进,通向儒家的理想人格。修养工夫理论是朱熹对“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4]的圣贤之道、对传统儒家内圣外王之路的新诠释,在朱熹的全部哲学思想乃至整个儒学体系中都具有重要地位,体现了理学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 [1] 程颢,程颐.二程集[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188.
- [2] 黎靖德.朱子语类[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2409,720,142,210,310,292,211,199,210,283,224,224,284,283,296,283,286,392,392,399,2891,150,150,151-152,148,152,223,222,212,223.
- [3] 陈来.宋明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186,205.
- [4]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18,17,3,113,94,79,132,14,7,7,356,133,36.
- [5] 钱穆.朱子新学案[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171.
- [6]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8,447.
- [7] 朱熹.朱子全书:第二十三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2773.
- [8] 汪艳琴.宋明理学道德修养功夫论的现代启示[J].黄山学院学报,2013,15(1):7-11.
- [9] 朱承.论朱熹哲学中的公共性思想[J].哲学研究,2017(5):70-77,128.

(责任编辑:魏琛)

The Basis,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Zhu Xi's Theory about Method of Self-cultivation

LI Shuting

(School of Philosophy,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9)

Abstract: Since the pre-Qin period, Confucianism has a tradition of focusing on cultivation and work. As the master of the Song Dynasty, Zhu Xi constructed a philosophical system with "Tianli" as the core. The theories about ontology and mind constituted the basis of his thoughts about methods of self-cultivation. From Zhu Xi's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such as the "Four Books",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l theoretical logic, his theory about method of self-cultivation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hree parts: "self-restrain", "get rid of desire and restore principle" and "explore knowledge from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extracted four characteristics: "wholeness", "practicality", "subjectivity" and "sociality". This structure provides a perspective of method for the overall understanding of Zhu Xi's philosophical thought,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s of Neo-Confucianism.

Key words: Zhu Xi; Neo-Confucianism; theory about method of self-cultivation; explore knowledge from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从仪式到文化展演——武夷山喊山祭茶仪式变迁

何英

(武夷学院 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要:武夷山“喊山祭茶”文化作为福建武夷山本土的一种祭祀仪式,是由众多象征符号构建而成的象征体系。随着时代的进程,武夷山的喊山祭茶文化活动发展至今,已从早期的祭祀仪式逐渐向文化展演的文化活动方向变迁。该仪式在历史的进程中,文化不断互嵌重构交融,在特定时空场域中强化了人们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使武夷山茶人的集体意识得以加强且身份得以确认,文化精神得以延续与传承。从“祭祀仪式”变迁到“文化展演”的视角,全面纪录该文化仪式的流程和内容的全套变化以及探讨其变迁的原因,探讨现代政治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嵌入交融,并且解读武夷山喊山祭茶仪式在科学与经济发展背景下在现代新媒体视域中的真实表达。

关键词:武夷山;喊山祭茶;仪式变迁;文化互嵌;文化展演;新媒体视域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4)07-0006-06

武夷茶始于唐,盛于宋、元,衰于明而复兴于清。在这一千多年茶叶兴衰史过程中,武夷山地方围绕着“茶”这一重要的农事活动,不断衍生出与其相关的宗教文化活动。而武夷山的惊蛰“喊山”祭茶仪式,是武夷山官方、企业以及百姓参与度最高的文化活动之一。喊山祭茶仪式,据民间流传说,发源于五代的南唐时期,现今留有相关的史料记载则为元代。元代大德年间建安北苑的茶被列为御茶,从而祭茶仪式走上了官方认证的平台。后传播推广到民间,闽地茶农于惊蛰日,将仪式简化为在自家茶园点香、放鞭炮来震醒茶芽,喊“茶发芽”。清代中期,迎来了武夷茶经济与文化的复兴。武夷茶在对外贸易方面突起,武夷山的下梅村成为与蒙古、俄罗斯等欧洲国家贸易的“万里茶路”起点站。清中期武夷山下梅茶叶大户邹氏夫人开山鞭打茶叶的故事流传至今,说是当年惊蛰日到,茶芽却未发,邹氏夫人拿柳枝轻轻鞭打茶叶,催茶发芽。

民国时期,由于经济凋敝,“喊山”保茶丰收的仪式在武夷山逐渐盛行,并且加入了祭祀新环节:焚香祭拜武夷山本地茶神“杨太白公”驱鬼来保茶丰收。新中国成立后破“四旧”,武夷山喊山祭茶仪式被废止。20世纪80年代,武夷山市政府以传统文化复兴的方式发展当地旅游业,喊山祭茶仪式以地方文化活动复兴的方式被重新组织并得到恢复。1999年武夷山“申遗”成功后,喊山祭茶仪式逐渐被改编成文化表演形式搬上舞台。21世纪以来,武夷山旅游业和茶产业发展迅猛,与之相关的茶文化活动日益丰富,再加上新媒体的传播发展,更多与茶产业相关的人加入到喊山祭茶仪式文化活动中来。

随着时代的进程,武夷山的喊山祭茶文化活动发展至今,已从早期的祭祀仪式逐渐向文化展演的文化活动方向变迁。然而,当前的学术成果,鲜有对武夷山喊山祭茶仪式变迁的理论研究及探讨。本文拟从“祭祀仪式”变迁到“文化展演”的视角,全面纪录该文化仪式的流程和内容的全套变化以及探讨其变迁的原因,探讨现代政治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嵌入交融,并且解读武夷山喊山祭茶仪式在科学与经济发展背景下在现代新媒体视域中的真实表达。

收稿日期:2023-10-11

作者简介:何英(1979-),女,汉族,讲师,主要从事传播学研究。

一、武夷山“喊山”祭茶仪式

回溯武夷山喊山祭茶仪式的历史,便可发现其仪式承载了一定历史情境下的文化重构,折射出武夷山本地茶产业的发展状况和闽北茶农社会的历史文化图景。随着商业和娱乐元素的不断植入,现代祭茶仪式的流程也经历了不断丰富与添加的过程。在当今网络直播等新媒体工具的放大传播下,仪式的神圣性和神秘性不断弱化,而表演性不断增强,武夷山喊山祭茶仪式逐渐变成现代文化活动的展演。根据功能主义人类学家涂尔干以及拉德克里夫—布朗的诠释:仪式具有“强化”功能,有助于确认参与者心中的秩序。仪式是对社会秩序的维持,是社会团结的强化剂。^[1]而同样的,文化展演以视觉性吸引观众,展演的目的是服务于国家和政治。正如人类学家汉德尔曼说的那样——文化展演呈现和反映着统治者操控分类体系秩序的工具。而武夷山喊山祭茶仪式正是在这样的功能主义驱使下,逐渐由宗教仪式变迁走向了文化展演。

(一)仪式的周期与空间

1.仪式周期

传统中,武夷山“喊山”祭茶仪式的时间大体安排在惊蛰时节。元代大德年间御茶园喊山台建设好后,地方政府官方制定了喊山祭茶活动的时间和仪式:“每当仲春惊蛰日,县官谐茶场,致祭毕,隶卒鸣金击鼓,同声喊曰:‘茶发芽!’”^[2]据元代诗人刘仁本在《建宁北苑喊山造茶是日大雷雨高奉御至》的诗歌中记载:“建溪三十里,北苑擅茶名。地耸岩峦秀,川洄陇瀨紫。溪山元蕴瑞,草木亦敷荣。远土修职贡,官曹任旌征。君恩濡泽降,天助振雷轰。鼓噪千军勇,喧啸万蛰惊。仙灵烦酒礼,使者引旗旌。白玉堂前客,红云岛内行。灵根连夜发,凡草感春生。渐觉龙芽吐,先期风嘴萌……”^[3]其中的“鼓噪千军勇,喧啸万蛰惊”,写的正是惊蛰日,官员主持喊山仪式,引导仪仗队击鼓来震醒茶芽。但民间的喊山仪式的时间周期安排并不固定具体的日期,而是大致安排在“清明后,谷雨前”这一阶段。官方(武夷山市政府)举办的喊山仪式,一般根据传统规则安排在惊蛰日。但是,民间的喊山仪式时间周期较为自由,常是根据自家茶山采茶时间安排来

提前进行。尤其是这百年来,武夷山的做茶工艺有了较大的区分,绿茶、红茶和岩茶的采摘青叶标准不同,导致了做茶时间差异。而喊山的根本目的是催生茶叶,所以仪式安排的具体时间有所不同。例如武夷山星村镇一带,采摘红茶金骏眉时间较早,一般为清明节前后,因此以制作红茶为主的企业会于清明前安排仪式。而岩茶的采摘标准为“三叶一芽”,大致在谷雨后开始采摘,喊山仪式则安排在谷雨前。2022年的惊蛰日为3月5日,因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武夷山茶业局以及海峡茶叶青年联合会举办的喊山仪式安排在4月7日,而岩茶采摘日则定于4月20日谷雨后。因此,虽然具体时间不固定,但总体而言武夷山喊山仪式的周期安排在从惊蛰到谷雨前,这一阶段的每一天皆可。

2.仪式空间

作为中国本土传统地方道教仪式开展的地方,通常要求能与天地神对话的特殊空间。在汉民族的祭祀中,与宇宙的神对话的并不一定是巫师或道长,而主要是主官。主官因皇帝所赐的官职地位,成为能够与神沟通对话的对象。喊山仪式最初由地方主官(县令)于北苑御茶园中筑建喊山台来举行,但该仪式逐渐在民间化后,只要有茶山的地方,茶农都可自行举行喊山仪式。可见在民间祭祀中,作为喊山祭茶的仪式空间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喊山台,而是茶山。而近年来已变身大型文化展演的武夷山大型喊山祭茶仪式,主要由官方牵头举办。例如,由政府官方茶业局(科局级)举办的选择在“母树大红袍”景点所在地——九龙窠进行,既方便游客观赏喊山仪式的表演,又有利于该文化的对外传播、提高知名度;民间社团组织武夷山海峡茶叶青年联合会的活动,则选择在莲花峰妙莲峰寺庙门口举办,原因是该寺庙门口场地开阔方便表演以及直播团队的拍摄;武夷山著名的天心永乐禅寺,在寺庙门口的天心岩举办喊山仪式,为的是宣传天心寺的佛教禅茶文化。总体而言,由于近年来喊山仪式的规模不断扩大,仪式所选择的空间也选择在了多个景点的开阔地,目的是为了扩大茶文化活动的宣传,便于茶人以及游客参与、观赏,以及拍摄和直播传播。

(二)仪式的祭辞

武夷山喊山祭茶仪式中的祭辞,在时代的变迁过

程中也逐渐发生变化。据元代《武夷山志》记载:御茶园有仁风门、拜发殿(亦名第一春殿)、清神堂、思敬亭、焙芳亭、燕嘉亭、宜寂亭、浮光亭、碧云桥。又有通仙井,覆以龙亭,皆极丹楹之盛。设场官二员领其事。后岁额浸广,增户至二百五十,茶三百六十斤,制龙团五千饼。泰定五年,崇安令张端本于园之左右各建一场,匾曰:“茶场”。至顺三年,建宁总管暗都刺于通仙井畔筑台,高五尺、方一丈六尺,名曰“喊山台”。其上为“喊泉亭”,因称井为“呼来泉”。旧志云:祭毕,隶卒鸣金击鼓,同声喊曰:“茶发芽!”而井水渐满,故名。^[4]这一风俗后来逐渐简化,在民间只在茶叶开采时,茶师在茶厂叫喊“好收成”“好价钱”。农业合作化后,“破四旧”取消了该仪式。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武夷山市政府重新恢复了“喊山”仪式。每年惊蛰日,由政府官员穿上古装,扮演仪式中的各个角色。司仪在祭祀过程中,恢复沿用了元代县令使用的祭文:“惟神,默运化机,地钟和气。物产灵芽,先春特异。石乳流香,龙团佳味。贡于天子,万年无替。资尔神功,用神常祭。”而后,同喊:“茶发芽!”

如今,由于武夷山茶产业的大力发展,政府、社团和茶企都热衷于举办喊山祭茶仪式文化活动。有实力的茶企各自为阵,在自家茶山或者企业的场地开展喊山祭茶仪式,祭文或抄或改,或请人代写,内容不尽相同。在此举例武夷山百年老字号茶企永生茶厂的喊山祭祀文为:“一拜天,二拜地,三拜山神!惟神,默运化机,地钟和气,万年无替!资尔神功,用申常祭。”文毕,众茶农齐声高喊:“茶发芽喽!茶发芽喽!”近四年,在民间社团联合政府和企业举办的喊山仪式中,具有代表性的武夷山海峡茶业交流协会青年联合会请人代写的祭文为:“伏以日吉时良,天地开张。金星太阳,光普四方。三和六合,五福九祥。瑞云七彩,祺泽八方。武夷神山,梅艳兰芳。九曲仙水,鲤跃鹤翔。群峰层峦,柏翠松苍。阡陌田畴,鸟语花香。钟灵毓秀,风顺水旺。宝地人杰,财富业昌。名盛声扬,山兴茶香。知恩报本,顶礼阙闾。武夷万众,聚集广场。奉果进饌,燃烛焚香。古仪民乐,丝竹悠扬。诚虔意敬,祀典循章。愿武夷茶神再现神光,布万众以风调雨顺,赐百姓以冬暖夏凉,一年四季,丰衣足食,东南西北,金碧辉煌;尚飨。”而后叩首,全体参祭人员高喊“采茶喽”三遍。

总之,武夷山的喊山仪式祭文因时代而不断地调整变化。但祭辞总体上表意一致,表达武夷茶为天地所赐的感恩,百姓对天地与茶神的敬重,以及传达了对茶叶丰产、丰衣足食的期望。

(三)仪式的秩序与象征

仪式“创造出某种短暂存在的微世界”,在这一临界状态人们遭遇“交融”或“国度”的感觉体验,最终实现某种“秩序”的重新恢复。^[5]武夷山喊山祭茶仪式大致包括以下几个环节,即“祭天、地和茶”,后经发展加入“祭杨太白公茶神”,现又加入茶人对党忠诚的集体宣誓仪式环节。在一段由本地茶人表演的《采茶舞》之后,工作人员把水果、锥栗、水酒、茶叶、猪头等祭品,摆在杨太白公的神像前,擂鼓鸣炮三响,齐喊:“采茶喽”三遍,而后在祭辞祷告之时播放道教清乐,敬香敬酒过后,在百人宣誓的誓词回荡在茶山中,开山祭茶仪式达到高潮。

仪式唤起的是群体对集体的认知与民族意识,通过仪式与天地神的沟通之后,重新构建当地新的宇宙与社会秩序。^[6]武夷山喊山祭茶仪式中的祭品、祭辞、歌舞表演、茶席直播体现了现代社会武夷山汉民族民间仪式的审美特色以及对茶人集体之间联系的强化;仪式中领导致辞、在职的政府领导给茶神敬献茶枝,而退休和民间茶人则给茶神敬香的区别性,不断弱化仪式中的“迷信”成分,体现了武夷山当地根据现代的生产、经济、意识形态以及社会价值观需要而作出调适。

二、从仪式到文化展演——“喊山”祭茶的变迁及原因

(一)祭茶仪式的变迁

1.举办主体与空间的扩容:从官方到民间,再到政企结合,各占山头举办

由于武夷山市政府本着扶持茶产业,大力复兴茶文化的精神,因此这些年来无论是官方、社团还是民间对喊山祭茶仪式都更加重视,参与者越来越多,举办的主体和空间都得到扩容。目前该仪式已经普及到即使是普通茶农都会在自家茶山做个简单的开山仪式,例如放一串鞭炮。而官方的祭茶仪式则程序环节越来越复杂多样,加入了很多文化展演活动的元素。

例如邀请省市级领导、代表性茶人致辞,以及歌舞表演等文化演出活动的环节。此外,大型企业邀请政府相关领导到企业中来开山祭茶,也成为普遍现象。邀请政府官方领导出席“加持”,赋予了喊山祭茶仪式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2.“喊山”祭茶文化展演内容的多元化融合

更值得注意的是,喊山祭茶仪式在逐渐转变为官方文化展演活动后,内容的多元化融合。首先与茶相关的歌舞表演环节的加入,使得文化展演的观赏性大大增强。由地方艺术团成员,或者是社团成员统一青绿色着装年轻女子载歌载舞表演《采茶歌》的植入,丰富了活动的娱乐性和观赏性。而新媒体直播的加入,更使得这一活动的展演性得到加强。受邀请的茶人在茶山中摆茶席,表演茶道和茶艺,吸引了更多不能到现场的线上观众关注这个活动。更由于航拍机的使用,从上帝视角对整个仪式进行全景全程的俯瞰直播,加强了仪式活动的视觉震撼效果,加强了该文化活动在网络上的传播推广。

(二)变迁的原因

仪式具有“强化”功能,有助于确认参与者心中的秩序。而仪式能转化为文化展演,与时代变迁以及国家政治需要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的仪式在社会风俗习惯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时说:“仪式这种宗教行为在社会上的功用就在创造心理习惯与社会风俗,对于群与文明有不可测量的价值。”^[4]通过文化展演的形式演绎的喊山祭茶仪式,在确认了活动参与者在社会秩序中扮演的角色与社会地位认同的同时,强化了文化的表演性功能,为打造地域性文化活动开辟新天地。

1.以政府为主导,对地方传统文化的复兴

国家权力的介入,有助于在一定边界的共同体内部构建出形成某种集团认同的文化标识。在权力意志的掌握和控制下,“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乡村旅游文化得到大力发展,在市场经济需求驱动中产业文化活动走向繁荣。武夷山喊山祭茶仪式,由于其历史悠久、仪式感强,具备转化为文化展演活动的潜质。因此,在当代政府权力的介入下,与其复兴带有“迷信”色彩的祭祀仪式,不如通过改造去除其“迷信”糟粕部分,将其打造为一个“与民同乐”的文化展演活动。必须承

认,经过多年的登台演出改造之后的喊山祭茶仪式,知名度得到大大的提升,同时也成为武夷山旅游文化和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民间社团的助力,丰富社团文化活动

武夷山喊山祭茶仪式的复兴,民间社团对于这一活动的发扬推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喊山祭茶在官方举办时已经去除了仪式环节中“糟粕”迷信部分,但本质上祭祀活动还是与天地神灵的对话。所以地方政府官员持谨慎态度,对该活动的推广重在宣扬政府对当地茶产业的工作支持上,而对仪式环节的宣传则有所保留。然而,民间的社团组织在执行这一活动时,具有更大的便利性。民间社团自发组织祭祀活动,既可完全按照古代仪规去操作,同时也可根据社团需要来添加其他元素来丰富这一文化活动。根据实地调查采访研究发现,民间社团复兴喊山祭茶活动,主要目的在于丰富该社团的文化活动。尤其是武夷山的茶青联社团,作为茶叶青年企业家的联盟,平时的工作主要在于销售和推广茶文化,而喊山祭茶仪式无疑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运作茶文化的着力点。社团积极举办喊山祭茶仪式,表达了对天地、茶以及政府支持的感恩之心,同时将其作为社团的文化活动,既加强了社团成员的集体黏性,又能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3.直播时代的社交媒体传播对多元化地方文化内容的需求,推动仪式变迁

媒体与内容的传播是互为推动的关系。新媒体尤其是抖音和微信视频号社交媒体直播在当代的盛行,推动了文化仪式的发展变迁。文化推手在活动上直播之前,通常会考虑传播效果问题。而传统的祭祀仪式由于过于严肃,往往传播效果不好。因此,为了得到更多的传播流量,获取更好的传播效果,文化活动通常都会被改造。武夷山喊山祭茶文化仪式也正是在这样的新媒体社会语境中,被添加了许多环节,增添了其他的内容,转变为文化展演。例如,加入的集体采茶舞表演,在视觉上具有更强的审美效果;而加入的茶席茶艺表演,也同样丰富了这一地方文化的展演性。

三、仪式展演与文化重构

在长期的交流交往过程中,中华大地灿烂的文化交相辉映。现代文化以其强大的黏性以及广受欢迎的娱乐性,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嵌入到严肃的祭祀文化当中。人类学家迈克尔·赫茨菲尔德认为:“展演的首要特征是视觉性——以图像运动和表演吸引观众……实际上,对于观众而言,展演离自我十分遥远,因为色彩和图像都被视觉客观化了。”^[8]展演的视觉性不仅是展现自我的手段,也是国家权利的工具。展演要使观众将视觉停留在欣赏表演艺术享受上,继而忽略了渗透在表演场合的官僚制度前提。古时候,喊山仪式的内涵本身就是一场官与神的权威对话。而在现代文化的融合下,它逐渐从宗教祭祀仪式中解脱出来,成为了文化活动的展演。随着新媒体的加入,仪式的环节不断增加和变化,从表演采茶的生活场景,再到茶人的集体宣誓,喊山仪式活动以当代特有的方式记录着自身的文化发展变迁。传统文化与当代“红色”文化的融合体现了极强的现代社会性。在某种程度上,不同意识形态的仪式,最终在文化展演中融为一体,形成满足当地人身份认同,符合地域社会发展需求和民族和谐共生的新格局。

(一) 武夷山茶青联社团喊山祭茶仪式中的誓词内容

“喊山祭茶”茶青联集体誓词

领誓人(独颂):我们是时代青年,我们是匠心茶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们决心励志前行!

领誓:我们庄严宣誓(集体跟誓)

领誓:感恩盛世,不忘初心!(集体跟誓)

领誓:守护生态,科技创新!(集体跟誓)

领誓:遵纪守法,诚信经营!(集体跟誓)

领誓:团结互助,合作共赢!(集体跟誓)

领誓:品质至上,面向百姓!(集体跟誓)

领誓:文化传承,产业振兴!(集体跟誓)

领誓:报效国家,万众同心!(集体跟誓)

茶青联的茶人集体“宣誓”仪式环节的创造性融

入,是祭茶仪式由宗教仪式走向文化展演的里程碑。武夷山茶产业的发展使得当地茶人的生活走向了富裕,对党和政府的高度信任和认同,是催生这一结构性文化交融的根本原因。

(二) 喊山祭茶仪式互嵌重构交融与文化的“适应性”

喊山祭茶仪式存在多种文化互嵌的现象,传统祭祀仪式和现代仪式的结构互嵌,为地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融创造了条件。礼敬具体偶像杨太伯公茶神的环节与茶人集体宣誓仪式均为现代人加入的创新环节,也呈现出两个信仰系统的仪式互嵌。^[9]宗教仪式的作用就是要将个体聚集起来变成群体,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正如涂尔干所言:“全部仪式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唤醒某些观念和情感,把现在归为过去,把个体归为群体,而已经集合起来的群体的心理状态,恰恰构成了我们称之为仪式心态的唯一稳定牢固的基础。”武夷山茶青联社团举办的喊山祭茶仪式中集体宣誓环节,体现了转变的仪式迎合现代茶人对身份认同的需求,“在仪式中从一种生命模式向另一种模式,从一种生存状态向另一种存在状况的转变成为可能”。^[10]

四、结语

武夷山“喊山祭茶”仪式作为一种祭祀仪式,是由一个个象征符号构建而成的象征体系。通过年复一年的复兴举办,其文化内涵不断重构交融,在仪式的特定时空场域中强化了人们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使武夷山茶人的集体意识得以加强,身份得以确认,文化精神得以延续与传承。而仪式的重构、共存与交融的成立,表明了政治文化渗透进入传统地域文化的权力文化网络。同时,这也体现了当地茶人群体对政府领导的认可。因茶产业发展走向富裕的茶人们,自发性举办创新的现代喊山祭茶仪式,其文化意义在于联合成不同分割的统一体,发展壮大自身群体,追求集体身份的认同,促进了更深入的社会团结。

参考文献:

- [1] 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1,521.

- [2] 徐焯.茶考[A]//徐学仁,选注.武夷千秋记文选,1985:180.
- [3] 刘仁本.羽庭集·建宁北苑喊山造茶是日大雷雨高奉御至[M]//纪昀,等.四库全书·别集类·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97:289.
- [4] 董天工.武夷山志:卷九[M].道光丙午重刊本,页十八至页十九.
- [5] GENNEP A V,VIZEDON M B,CAFFEE G E.The Rites of Passage:Translated[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19.
- [6] 王玥.广西“壮族三月三”的当代实践及交融范式发展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21(5):149.
- [7] 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M].李安宅,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23.
- [8] 陈蕊.“仪式”与“展演”:浅析文化人类学视阈下的湘西土家族茅古斯文化变迁[J].大众文艺,2016(22):37.
- [9] 杨洪林.苗族巴岱信仰的互嵌与交融[J].宗教学研究,2019(3):154.

(责任编辑:白琳)

From Ceremony to Cultural Performance: A Study on the Change of the Hanshan Tea Ceremony in Wuyishan

HE Y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Teacher Education,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As a local sacrificial ceremony in Wuyi Mountain, Fujian Province, the cultural event of "Hanshan Jicha" has constructed a symbolic system consisting of numerous symbols.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the cultural event of "Hanshan Jicha" has evolved from an early sacrificial ceremony to a cultural performance.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y, culture continues to interact, reconstruct and blend, strengthening people's sense of belonging and identity in specific spaces and times, and enhancing th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of Wuyi Mountain tea people, confirming their identity, and inheriting their cultural spirit. This article aims to record the full changes in the process and content of this cultural ceremon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acrificial ceremony" to "cultural performance", explore the reasons for these changes, discuss the embedding and blending of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into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nterpret the real expression of the "Hanshan tea ceremony" ceremony in modern media, science and economy.

Key words: Wuyishan; "Hanshan tea ceremony"; ceremony changes; cultural embedding; cultural performance; new media perspective

“两山”理论的辩证意蕴及时代价值

刘福强, 尤秋丽

(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17)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断丰富和完善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了以“两山”理论为核心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蕴含着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两山”理论沿着“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路径不断发展演变,同时,“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基于此辩证思想,从人民、国家和世界三个维度探求“两山”理论的时代价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两山”理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唯物辩证法;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4)07-0012-06

“两山”理论指的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又称为“两山”理念。“两山”理论无论在其内部结构还是发展过程中,都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自“两山”理论提出以来,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多维剖析:有的学者对于“两山”理论的历史渊源、科学内涵做了深入地阐释;有的学者对于“两山”理论的生态价值、贡献意义做了深刻地阐发;更多的学者则针对“两山”理论的现实指导和实践路径有更为突出的研究。但鲜有学者从否定之否定等辩证视角对“两山”理论的历史发展和内在逻辑进行深入探究。立足于此,通过梳理“两山”理论的演变历程,即顺应“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阶段,进而探求“两山”理论的哲学内蕴,即剖析“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内在辩证关系,对于我们统筹推进“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收稿日期:2023-12-12

基金项目:2023年度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FJ2023B005)。

作者简介:刘福强(1995-),男,汉族,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研究。

一、“两山”理论的历史演变

根据对立统一规律,我们认识到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矛盾构成的统一体。^[1]其发展过程并非直线式的一帆风顺,而是经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三个阶段,呈现螺旋式上升。在“两山”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绿水青山代表了第一阶段的肯定,即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而金山银山则代表第二阶段的否定,即强调经济发展优先;最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理论则代表了第三阶段的否定之否定,即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应相互协调,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肯定阶段:侧重绿水青山

在这个阶段,人们对自然环境的态度是相对尊重和敬畏的。人们认识到自然环境的存在和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和逻辑,因此人们需要顺应这些规律来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这种观念体现在许多古代文化和宗教中,例如“崇尚自然、尊重生命”^[2]等思想。此外,在这个阶段,由于人们对自然的开发能力相对有限,因此对自然的破坏也相对较小。虽然在一些地区,由于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的压力,出现了一些过度开发和危害环境的现象,但这些现象在整体上并未对自然环境

构成显著的破坏。

在那个时代,人们对自然环境经济价值的认识尚未深入人心,所以只能通过自然环境获取基本的生存需求,而无法从中获取直接的经济利益。这主要是因为人类的力量尚未发展到高级阶段,因此无法对自然环境进行更为深入的开发和利用。在这个时期,绿水青山对于人类来说,并不是一种可以掌控的和谐共鸣。相反,它们被视为一种无法开发和利用的资源,只能被视为一种自然的、无价值的存在。然而,尽管人类无法完全掌控绿水青山,绿水青山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类自身发展的需求,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与自然修复的需求相契合。绿水青山所提供的生态利益,是人们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的保障。

(二)否定阶段:侧重金山银山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和利用能力日益增强。金山银山逐渐“否定”绿水青山,成为了那个阶段的“历史主旋律”。在不断探索和开发大自然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金山银山所带来的经济收益远比绿水青山的生态收益更为重要。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人类智慧的不断提升,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利用能力逐渐增强,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人们开始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过度开发和改造自然,比如说人类开始大规模地挖掘矿产、砍伐森林、围湖造田,从大自然中获取更多的资源。但是,这种做法最终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害。大量的污染和生态破坏让绿水青山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生态平衡和生态价值。河流不再清澈,森林不再茂密,湖泊不再碧绿。

在这个时期,虽然人类可以享受到的绿水青山带来的生态收益,但同时也需要承担相应的经济成本。政府和企业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往往忽视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让绿水青山对于人类来说不再是必然,而是一种可以选择的利益。然而,这种短视的行为最终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自然资源的枯竭,给人类带来了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

(三)否定之否定阶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如今,人们逐渐认识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政府和企业开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推动绿色发展,

实现可持续发展。^[3]这一阶段,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绿水青山的价值,并尝试将其转化为经济收益。这些绿水青山虽然看起来是自然的美景,但其中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它们不仅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资源,而且也是经济价值创造的重要来源,这是对绿水青山的高层次回归。

为了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平衡,人类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寻找。通过科学规划、可持续发展等措施,人类可以在保持生态平衡的同时,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在实践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些成功的案例。比如,一些地区通过发展绿色旅游、生态农业等产业,成功地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这些措施不仅增加了当地的经济收入,还保护了生态环境,实现了可持续发展。此外,一些企业也开始注重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通过采用环保技术和生产方式,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同时也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这些成功的案例表明,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平衡是可行的。只要我们采取科学规划、可持续发展等措施,就可以在保持生态平衡的同时,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马克思指出:“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4]马克思亦说过:“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5]由此可见,人与自然之间并不是主仆关系、对抗关系,而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因此,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的人民更加幸福、国家更加繁荣、地球更加美好。

二、“两山”理论的辩证意蕴

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构成了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犹如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其中,绿水青山是实现金山银山的基础,而金山银山则是保障绿水青山的重要条件。即是说,只有在保护好绿水青山的基础上,才能实现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同样,只有当金山银山得到合理的开发,才能确保绿水青山的长久安定。因此,不管失去任何一方,另一方都将不复存在。

(一)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的基础

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的基础,这一观点已经深入人心,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只有把环境保护放在首位,将生态保护和改善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才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换句话说,只有在保护好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的前提下,才能够真正地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首先,健康的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生存至关重要。它为我们提供了生存所需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和丰富的食物等基本资源,这些是人类生存的基础。然而,如果我们过度开采和污染这些资源,就会导致空气和水污染、水资源短缺、生态系统崩溃等严重后果,进而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和健康。其次,环境破坏会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极大的威胁。这不仅表现在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事件等环境问题上,还会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物种灭绝等生态危机。这些环境问题不仅影响人类的生存条件,还会对农业、渔业、旅游业等经济领域产生负面影响,从而阻碍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最后,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依赖健康的生态环境。只有当我们保护好自然环境,才能够保证资源的持续利用和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如果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就会导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从而制约经济的发展。

绿水青山代表着自然的财富,是生态系统健康、生物多样性的象征。只有保护好这些自然资源,才能够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如果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利益,最终不仅会损害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会给我们的生存环境带来不可逆转的损害。因此,保护生态环境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金山银山只有建立在绿水青山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应该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环境保护,以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二)金山银山是绿水青山的保障

金山银山是绿水青山的坚固屏障,它就像一个身披铠甲的勇士,无论风吹雨打,始终坚守着我们的家园。这个比喻十分贴切地表达了金山银山的价值。金山银山不仅仅是我们物质财富的象征,更是我们生态环境的守护神、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的守护者。一

旦失去了这座坚固的屏障,就像一个精致的玻璃瓶失去了保护,随时都可能破裂,绿水青山就可能遭受无法挽回的破坏,失去其原本的美丽与生机。金山银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我们物质财富的来源,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支柱。作为自然环境的守护者,它是保持美丽和清新的关键因素。在这个资源日益匮乏、环境日益恶化的时代,我们的金山银山不仅是一种宝贵的资源,更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金山银山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它们的自然价值和生态功能上,还与我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它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水资源、木材资源、矿产资源等,同时还承载着我们的文化和历史遗产。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好金山银山是我们对未来世代的责任和承诺。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更加珍惜并保护我们的金山银山。只有通过科学合理的开发和利用,让它继续作为绿水青山的坚固屏障,我们才能为后代子孙留下一个清新、美丽的自然环境。这不仅是对自然的尊重和保护,也是对人类自身的关爱和呵护。

(三)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相辅相成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强调的是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利用。它主张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现阶段,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重要途径是发展生态产业。^[6]通过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例如,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等生态产业,可以实现经济和生态双重效益,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理念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同时,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它所体现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是当前社会发展的重要命题。这两者之间不仅存在对立冲突,同时也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环境保护;而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也要兼顾经济发展。只有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矛盾,才能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所以,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过程中,必须牢固树立这一理念,正确认识和把握“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辩证统一关系,并且始终把生态环境保

护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让美丽多姿的绿水青山为我们带来富饶丰盛的金山银山^[7],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8]。让人民群众在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也能享受到良好的生态环境带来的福祉。这一理念对于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三、“两山”理论的时代价值

深入探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内在辩证意蕴,深切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实践理念,对于人民、国家和世界三个维度都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人民维度上,对于民生福祉的增加具有加强作用;国家维度上,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具有促进作用;世界维度上,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推动作用。

(一)人民之维:有助于人民福祉的增进

“两山”理论,这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不仅在国内受到广泛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热议。它深入浅出地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微妙关系,明确指出:我们不能在牺牲环境的前提下,盲目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

“两山”理论强调,只有在充分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人民的福祉和健康。这不仅是对我们当前面临的环境问题的深刻反思,也是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清晰规划。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以及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该理论强调了人民的中心地位,坚定地指出,只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不仅是对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独特贡献。“两山”理论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发展理念,它强调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在实践中,我们需要将这种理念转化为具体的行动,通过创新和科技手段来推动绿色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同时,我们也需要加强对生态环境的监督管理,保障人民的健康和福祉。这需要我们采取有效的措施,例如加强环境

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加强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监测和预警、加强环境教育和宣传等。只有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我们才能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为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增进民生福祉,提升人民幸福指数。^[9]

(二)国家之维:有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0]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11],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和生态系统的需求越来越高。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生态文明建设占据重要地位,绿色发展的重要性更是日益凸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一定程度上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紧密关系。人民的需求和利益是发展的核心,在“两山”理论中,绿色发展被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因为它强调在经济发展中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因为它正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而提出的;因为它的实现前提就是生态环境保护,只有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因为绿色发展理念也符合全球发展趋势。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全球对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绿色发展理念强调在经济发展中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符合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这一理念深刻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际内涵,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它的最终目的是让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促进,实现共同发展,为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提供有力保障。

(三)世界之维: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5 年年会和党的二十大报告等一再强调:推动共建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2]这足以证明其重要性,因而有必要进一步推进。“两山”理论是一个崇高的理论,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自然生态系统中各种元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协调发展。这一理论从“山水林田湖草

是命运共同体”发展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需要逐步丰富。它不仅体现了中国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深刻认识,也反映了全球各国共同追求清洁、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愿望。“两山”理论是在深刻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之下提出的,体现着人类对于自然和未来深入思考的智慧结晶。“整体性”“系统性”的思想在这一理论中显露无遗,正是基于此,我们通过国际视野,深化对于“两山”理论的了解和认识,以更高站位理解和运用“两山”理论。

“两山”理论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中国自身的环保和可持续发展上,更在于它能够将中国的方案和智慧转化为世界共识。中国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而“两山”理论正是中国对全球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独到贡献。通过推广“两山”理论,我们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在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决心和行动,为全球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思路和方法。同时,“两山”理论也是一种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的理论。它为我们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引导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可以依据这个理论,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全球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因此,“两山”理论是一种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思想,它不仅体现了中国的环保理念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也为全球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方法。这个理念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深邃的思想和卓越的实践,更在于它能够为全球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通过实现“两山”理论,我们可以促进全球范围内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应有力量。

四、结语

“两山”理论源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实践探索和科学总结,是一种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发展理念。这一理论以其深刻的洞见、朴实的语言,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不能忽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必须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两山”理论的发展,迹循着“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逻辑,现实地体现在由侧重“绿水青山”到侧重“金山银山”,再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演变。从两者关系的历史演变可以认识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并不是孤立的、割裂的个体,而是需要从整体的、系统的层面来把握二者的辩证关系。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的基础,而金山银山又是绿水青山的保障,二者是辩证的相互关系。正是在深入剖析“两山”理论的发展演变以及辩证内蕴之后,进而从人民、国家和世界三个维度阐发“两山”理论的时代价值,发现其不仅在于指导“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转化,更有助于增加人民的民生福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实践证明,“两山”理论在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提供了有力的力量支撑。然而,它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是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两山”理论为全人类面临的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共同问题提供了一份宝贵的智慧贡献。它倡导人类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13],更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和谐的生态秩序”^[14],这正是全人类共同关注的议题。

“两山”理论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瑰宝,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思想。我们不仅要深入学习、广泛宣传“两山”理论,更是需要坚定不移、始终践行这一理论指导。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切实加强环境保护;在环境保护的同时,也要力求经济稳步发展。我们要着实推动美丽中国构建,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创造美好未来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 [1] 姜永清.哲学相对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6.
- [2] 张洋,刘志礼.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三个层面的有机融合[J].理论探索,2016(3):53-56,64.
- [3] 颜章雄,严志强,黄宗葵.区域性经济中心的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对策:以贵港市为例[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1):101-104.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

- 版社,2009:161.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2.
- [6] 郭亚军,冯宗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辩证关系及发展路径[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1):8-14.
- [7] 林章州.当前自然资源档案管理面临的难点及对策[J].文化产业,2022(31):10-12.
- [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9.
- [9] 刘燕华,李宇航,王文涛.新时代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再探讨[J].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20(Z1):49-52.
- [10]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3.
- [11] 漆思,梁文巧.在批判与超越资本逻辑中探寻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J].贵州社会科学,2023(1):17-23.
- [12] 陈琪.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内容、价值与当代表现[J].武夷学院学报,2022,41(5):13-18.
- [13]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603.
- [14] 陈文.试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伦理蕴涵[J].武夷学院学报,2018,37(11):1-6.

(责任编辑:魏琛)

The Dialectical Connotation and Era Value of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LIU Fuqiang, YOU Qiuli

(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17)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he ide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s been continuously enriched and improved, and the ide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the theory of "two mountains" as the core has been formed. The important argument of Xi Jinping that "clear water and green mountains are gold and silver mountains" contains rich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he theory of "two mountains" develops and evolves along the dialectical path of "affirming - negating - negat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lear water and green mountains" and "golden mountains and silver mountains" is interdependent and mutually promoting. Based on this dialectical thought, exploring the time value of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international, national and people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due meaning of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two mountains" theory;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materialist dialectic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马克思历史进步观的主体向度探析

——兼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民主体理论的创新发展

韩博文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传统进步观念在演进过程中主体向度的缺失,使得传统进步观念成为独立于人之外的僵死教条,而马克思历史进步观实现了对历史进步主体的科学建构。马克思认为,人既是历史进步的实践主体,也是历史进步的价值主体。这一重要理论观点被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不断发展,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历史进步,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执政观、“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观,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时代之问。

关键词:进步观念;历史主体;人民主体;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4)07-0018-07

历史究竟是不不断进步的单方向性过程,还是偶然事件的凌乱堆叠,理解这一切都不能不涉及解释人类历史演进模式的历史观念。自西方启蒙时代以来,历史进步观念逐渐发展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历史观,它把历史演进过程理解为“一个由理性先定的、由科学技术决定的、由客观必然性主宰的过程”^[1]。但是,对理性的盲目笃信和社会科学领域实证化研究方式的兴起,使得这种传统进步观念逐渐演化为缺失主体向度的僵化教条。在身处进步观念高潮时代的马克思看来,任何历史进步的原初动力都是人的实践活动。任何历史进步的价值意义都离不开人的自身发展,他在批判地汲取传统进步观的合理内容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历史主体的科学建构,形成了马克思历史进步观。中国共产党的人民主体理论正是来源于此,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党的人民主体理论又在实践基础上得到了创新发展。因此,从理论维度探析马克思历史进步观的主体向度,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人民主体理论的承继与创新。

一、传统进步观念主体向度的缺失

传统进步观念曾起到过重要的革命性作用,它的形成和发展破除了中世纪天意观对人类历史进行属灵化解释的权威,使人类确立起在世俗世界建立“此岸天国”的目标。然而,对人类理性的盲目笃信、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固守以及进步观念的意识形态武器化,使得传统进步观念逐步演化成一种僵死的外部教条,走出了一条从“人”到“非人”的演进路向。

首先,对人类理性的盲目笃信使进步观念自身蕴含的伦理价值性逐渐隐没,偏离了人的主体性轨道。近代理性主体的确立瓦解了中世纪“神圣”主体的外在权威,这使得思想家们开始思考人类社会不断完善进步的可能性,进步观念在此时取得了一种伦理性设定。但随着理性精神主导下的近代社会快速发展,以及自然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理性精神也开始向社会历史领域渗透。19世纪初,以圣西门、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思想家将科学理性引入到对人类历史演进模式的解释范畴内,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引申出万有

收稿日期:2023-12-15

作者简介:韩博文(1996-),男,汉族,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引力哲学,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引申出人类社会进化论,力图将历史进步论证为客观的科学规律。但当他们用实证方法去证明历史进步是稳定的客观法则时,不可避免地需要剔除人的能动性因素,将历史进步与人的主体性作用剥离开来,使其客观化和中立化。然而,这种做法漠视了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伦理价值诉求,使进步观念逐渐偏离了人的主体性轨道。

其次,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固守使进步观念自身成为先验主体,剥夺了人的历史主体地位。对稳定性、客观性的追求,反映出传统进步观念底层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性。所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就是“一种试图从一元化的、非历史的终极存在来把握人与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迷恋于最终主宰、‘第一原理’和最高统一性的思维方式”^[2]。进步观念的实证化过程使之成为一个脱离于人类实践活动而自存自足的东西,它先于人类实践活动规定了社会历史的走向。历史本应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但这种稳定客观法则的演化趋势,使得进步观念发展成为一种外在于人的、无法扭转的宿命论,人不再是历史的主体而是成为了进步法则实现自身的工具和载体,人的创造本性受到“先验主体”的压制,人的实践活动受到“进步逻辑”的宰制,进步观念剥夺了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

最后,进步观念的机械性质使之沦为意识形态武器,束缚了人的主体性能力。客观必然性的演化趋势也使进步观念沦为了一种机械性的历史规律。历史确有其规律,但机械性意味着对历史发展中偶然性、异质性因素的漠视,否定了历史发展的开放性,限制了人的生存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传统进步观念被统治阶级利用,演变成一种束缚人的意识形态武器。“进步观念被一些个人、群体、政党或国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为自己的统治辩护,使人们迷失在理论的迷宫内而看不到现实的非法性。”^[3]在这一意识形态武器的支持下,统治者可以将任何反抗势力打上阻碍历史前进的标签加以摧毁,剥削和奴役也由此变得合法。如果历史进步成为必然,那也就无所谓历史的反动者,任何反对反动者的行动也都将失去意义。因此,这种沦为意识形态武器的进步观念完全束缚住了人的主体性能力,剥夺了人在历史进程中的自由性和能动性。

随着现代性矛盾的凸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人的异化,工具理性肆意膨胀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对抗,历史退步和社会危机的景象接连涌现,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这种表征历史单向进步的传统进步观念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难以自治,逐渐走向瓦解。

二、马克思历史进步观的主体建构

“现实的人”是马克思进行历史进步叙事的首要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表示,历史进步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于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4]。实际上,“现实的人”的本质内涵是历史生成性,这种现实的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4]。因此,“现实的人”并不是进步法则实现自身的工具和载体,而是从事着现实的社会生产活动,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自身也不断发展的真实个体。以“现实的人”为基本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实现了对历史主体的科学建构。

(一)人是历史进步的实践主体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历史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历史本身“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4]。因此,人的“实践主体性”是马克思历史进步观的首要观点。

首先,人以实践活动建构了社会历史的开端,又持续以实践活动催动着社会历史向前迈进。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4],任何理论对历史进步的阐释都不能脱离这一基础。在真实的历史过程中,并不存在一只隐蔽的手操控着人类历史走向,也不存在任何客观必然的法则先验地确保历史线性进步,历史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

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4]因此,历史中存在的只是人类实践活动本身及其依次交替,人类正是以这种方式推动社会历史向前迈进。

其次,人的实践结果的外化是社会历史表现出规律性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当然承认,历史演进的步伐确实表现出规律性,但这种规律是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在历史中呈现的,而不是自在自为的外部必然性,历史规律性的显现离不开人的实践参与。恩格斯曾对这一点有过精辟的论述,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道:“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5]也就是说,历史的规律性是在主体能动的实践参与下才呈现出来的,而规律的客观性表现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合力”不以任何个体意志为转移。这种判断表明,人始终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而不是外部规律先验地规定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这一论断克服了传统进步观念的僵化教条,恢复了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个性自由和创造本性。

最后,人的实践选择是历史过程呈现出进步方向的根本动因。在马克思看来,“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6],历史进步归根结底是人的选择和实现这一选择的实践过程,是人对历史进程中诸多可能性趋势的选择或限制,使历史进程永远朝着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的方向前进。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这种能动选择表现为人们通过实践活动不断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不断满足自身美好生活的需要,从而实现社会进步。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解决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是实现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但社会基本矛盾本身的存在并不会直接推动社会进步,只有通过人们自觉的实践参与才能得到解决,使社会进步由潜在的可能变为现实的存在。因此,历史演进表现出进步特征并不是某种先验主体的外在保证,而是源于人类实践活动。

(二)人是历史进步的价值主体

马克思认为,人的实践活动是一种有目的的、对

象化的感性活动,正是通过实践活动,人将自己意识的观念想法变成自然界的现实存在,这一过程不仅确证了人的本质力量,而且包含着实现自身的伦理价值目标。历史进步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其经验性维度,更在于其理想性维度,倘若历史进步背离了人的主体性轨道,那么历史进步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人的“价值主体性”成为了马克思历史进步观的理论旨归。

首先,历史进步并不是一种自然的机械过程,而是一个承载着人的多维需要和价值诉求的实践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历史进步的意义并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必然性,而在于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历史进步应该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人的实践活动所内含的改善自身生存状况、求得个性发展的伦理价值诉求规定了历史发展向上向善的方向性特点,历史也正是在人们不断解决各种关切自身的社会矛盾、不断满足人们各种需要和诉求中前进和发展的。人是历史进步的价值主体,即是说历史进步始终围绕着人的自身发展这一价值目标展开,进步始终以主体为目的,而不是主体以进步为目的。因此,从人及其实践活动出发,通过人的自身发展来确证历史进步的目的和意义,是马克思历史进步观的独特理论价值。

其次,历史进步不是一种先验的、封闭的决定论,而是充满了偶然性与开放性的价值实现过程。马克思从来就不是一位决定论者,而从一开始就阐明了历史进程中充满着偶然性与异质性因素。马克思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说道:“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好像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其实,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中得到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7]实际上,历史进步贯穿着批判性与革命性因素,是人通过实践活动不断实现自我超越的过程。历史进步的这种开放性,使得人们可以不断地去追寻更多的可能性,不断地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从而拓展自己的发展限度与生存空间,这种历史才真正是人的历史。

最后,历史进步的真正实现并不在于思辨活动,而应该落实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中。历史是如何进步的,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给出了科学解答,历史进步必然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

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4]。在马克思看来,历史进步的实现过程并不是“用词句来反对词句”,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方式下,人处于异化的生存状态。但人类追求生存状况不断改善、自身不断发展的实践过程会使人不断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人自身将不断得到解放。马克思认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人才能最终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到那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因此,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展望,实际上就是他对于人如何作为历史进步的价值主体所给出的科学解答,到那时“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新的证明,人的本质得到新的充实”^[4]。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4]马克思历史进步观站在无产阶级立场阐述历史进步过程,实现了对历史主体的科学建构,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原则导向和价值遵循,也为中国共产党践行和发展人民主体理论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源泉。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民主体理论的创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毛泽东同志首先将马克思的历史主体观应用于中国的革命实践中,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就创造性地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根本宗旨;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无论是“先富带动后富”的理论创举,还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确立,邓小平同志从不同维度论证了人民群众在中国改革实践中的主体地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又分别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深化了对人民主体地位的认识。虽然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要面对的矛盾有所不同,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

民主体地位,始终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始终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并不断发扬人民主体性,更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成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论点和首要关切。这一思想内含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执政观、“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观,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时代之问。

(一)“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

马克思的历史进步观表明,历史进步之所以会呈现出向上向善的方向性特点,源于历史进步自身蕴含着实现人、满足人的伦理价值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的一切都聚焦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2013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在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将其升华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发展“为了谁”的问题。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主线脉络。党的十九大报告鲜明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7]。这意味着,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已经凸显为主要问题,人民群众原本的生存性需要已转变为发展性诉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深刻认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要求,科学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从各方面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8]“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锚定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奋斗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沿着“以人民为中心”这条主线脉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取得了脱贫攻坚伟大

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价值导向。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不仅需要吃饱穿暖,更需要优美的生态环境和居住环境;人民群众不仅需要物质丰盈,更需要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权益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①,指明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要求人民群众成为新时代发展的目标主体和价值主体。在新时代,党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具体化为民生建设新内容:教育、工作、医疗、社会保障、卫生服务、居住条件、自然环境等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民生建设的辐射网络,不仅更加注重量的增长,也更加专注质的提升。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主体,也理应成为发展成果共享的主体。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断致力于优化社会分配结构,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②,标志着我国分配制度向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迈进,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真实写照。

(二)“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观

在2021年2月举行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明确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重要论断,在202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重申了这一重要论断。“江山”指国家、政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人民当家作主,是对党的章程中“三个先锋队”^③表述的继承和发展。“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观,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依靠谁”的问题。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阐明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依靠主体。社会发展进步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④。马克思认为,任何科学的理论都不能自为的发生作用,都需要人民群众的

掌握并付诸实践,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写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⑤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领悟到了这一点,始终坚信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始终坚持人民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始终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人民群众的实践方向和价值取向取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成就和光明未来,而人民群众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创造的优越条件和自由环境中实现自我价值,这种双向发展逻辑最大限度激发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最大程度迸发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阐明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监督主体。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人心向背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这不仅是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经验总结,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在20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重大挫折之中,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在于部分无产阶级政党在发展中逐渐脱离人民群众且难以形成有效的自我监督,成为新的特权阶级,丧失了原本的阶级基础。中华文化也素有强调人民主体性的优良传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熟知的规律性认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汲取古今中外政党政权建设的经验,对党的执政之基有着清醒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⑥,指明了人民群众才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监督主体。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卓越成效,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走出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自我革命道路,党的面貌焕然一新,对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给出了“第二个回答”。

(三)“坚持人民至上”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观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进步的推动者,但“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⑦,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总是在历史前进的步伐中被隐匿了。马克思明确揭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进步中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无产阶级运动使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力变得明晰起来,“无产阶级的

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6]。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坚持人民至上”列在“六个必须坚持”的首位,表明了“坚持人民至上”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最清晰的立场观,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我是谁”的问题。

“坚持人民至上”要求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意味着党的政策制定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党的实践发展要以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为根本依靠,党的工作成效要以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为最高准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及时准确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11]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明确了人民群众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角色定位,也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底色。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不仅是一种号召,更是阐明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坚持和强调。

“坚持人民至上”要求必须时刻站稳人民立场。共产党人来自人民群众,是无产阶级运动中最坚决、最具能动性的部分,“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6]。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要求。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断明确人民立场,党的十八大强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要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12]党的十九大明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方略,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7]党的二十大更是鲜明地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9]这一党的根本价值观。

总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执政观、“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观三者内在融通、相互协调,在推动历史进步的议题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时代之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民主体理论的创新发展,不仅体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历史理论

的笃信坚守,也同样是百年大党经验智慧的科学总结;不仅体现了我们党历史认识的真理性,同时也蕴含着我们党带领人民推动历史进步的方法论。我们要立足新时代的新实践,深刻领会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和独特的现实价值。

注释:

- ①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提出这一观点。
- ② “三个先锋队”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参考文献:

- [1] 郝永平.进步观念的两种形态及共同缺陷[J].长白学刊,1997(5):18-22.
- [2] 贺来.边界意识与人的解放[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8-59.
- [3] 王成.从认知概念到伦理理念[D].长春:吉林大学,2010:42.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185,223,287,295,502,519,525,529,540.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2.
-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2,44,53,591.
- [7]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001).
- [8] 习近平.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J].共产党员,2022(15):4-13.
- [9]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2-10-26(001).
- [10] 习近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J].新长征,2023(2):4-7.
- [11] 习近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J].求是,2013(1):3-7.
- [12]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18(001).

(责任编辑:魏琛)

Analysis On the Subject Dimension of Marx's View of Historical Progress: Also On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Subject The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HAN Bowen

(College of Marxism,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00)

Abstract: The lack of subject dimension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progress makes the law of historical progress become a rigid external dogma for people, and the insights of Marx and Engels in the discussion of historical progress realize the scientific construction of the subject of historical progress. Marxist view of progress holds that man is not only the practice subject of historical progress, but also the value subject of historical progress. Thi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iewpoint has been inherited by president and has continued to develop. In particular, sinc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ed a new era,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Xi Jinping at his core has closely relied on the people to promote historical progress, forming the concept of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the concept of “the river is the people, and the people are the river,” and the concept of “upholding the people first.” It profoundly answers the question of the era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For whom, rely on whom, who am I?”

Key words: view of progress; historical subject; subject of the people; new era

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价值意蕴及实践向度

喻兴平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1520)

摘要: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不仅是百年大党开辟自我革命新境界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坚定文化自信和增强文化自信的现实遵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具有面向个人、面向政党、面向民族、面向世界的独特价值,能够多层次地注入廉洁基因,系统型构个人—社会—国家—世界“四位一体”的清廉政治环境。新时代的廉洁文化建设着重从“古”与“今”“破”与“立”“中”与“外”“知”与“行”上综合赋能,实现促进传承与发扬创新相互耦合,破除痼疾与牢固理论同频共振,对内为主与对外宣传双管齐下,理论认知与付诸实践同向聚合。

关键词:新时代;廉洁文化;价值意蕴;实践向度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4)07-0025-07

新时代廉洁文化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的创新发展,同时也是对我党百年来防腐倡廉的经验总结。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1]党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再次重申“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这是新时代我党发出的反腐最强音,剑指“不想腐”推进新时代党的廉洁队伍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廉洁文化发展的时代成果,展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清晰的历史传承以及独到的思想洞见。2022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要以“思想觉悟为导向,从思想上固本培元,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2]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探究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价值意蕴及实践向度,为形成拒腐倡廉的个人品质、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与海晏河清的清廉中国保驾护航,以期实现“不想腐”这一根本目标。

一、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价值意蕴

新时代新征程,营造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廉洁政治环境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要义。全面从严治党不仅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力度,扎牢不能腐的制度笼子,更要深耕不想腐的思想根基。新时代的反腐工作不仅是一场政治较量,更是一场文化斗争。新时代廉洁文化旨在从党员干部的思想上发力,筑牢“不想腐”的思想屏障,化解新时代新要求与党员干部旧思想的思想抵牾。同时,《意见》强调把廉洁文化建设融入到党风廉政制度建设当中去,这不仅涵盖了“不敢腐、不能腐”的相关内容,还从制度上呼应“不想腐”的廉洁文化建设目标,站在整体的角度实现“三不”一体化建设目标。一言以蔽之,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系统形构个人—社会—国家—世界四个层面的清廉政治环境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贯彻落实《意见》要求的重要保障。

(一)塑造拒腐倡廉个人品格的时代要求

中国共产党始终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推进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这也为塑造拒腐倡廉的个人品格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从人的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坚固屏障,不断提高自身党性觉悟,永葆共产党员的清正

收稿日期:2023-03-14

作者简介:喻兴平(1997-),女,汉族,教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廉洁本色。由此可见,新时代加强廉洁文化建设是塑造拒腐倡廉的个人品格的和隋之珍。

首先,加强廉洁文化建设能够提高党员干部的自我净化能力。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人民逐渐从生存资料消费转向发展资料、享受资料消费。部分党员干部思想开始滑坡,逐渐走上被金钱腐蚀头脑、被权势慑服本心的道路,违背了党的初心和使命。及时剷除腐败的思想毒瘤成为形成拒腐倡廉个人品格的应有之义。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通过集古代先贤的廉洁智慧,汲革命先烈的精神文化,取新时代的廉洁理念等方式,不断集聚塑造个人品格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通过廉洁文化教育注入党员干部的头脑,内化为廉洁思想,外化为廉洁行为,养成时时自省、事事自省的习贯,贯通学思用,统一知信行,从而不断提高个人面对腐败的自我净化能力。

其次,加强廉洁文化建设能够增强党员干部的自律能力。廉洁自律就是要求党员干部要自我约束,慎微慎独,严格规范自身的“思”与“行”。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新中国成立后焦裕禄制定的《干部十不准》,再到朱德总司令的“借款信”,鲜明的廉洁事迹无不闪烁着我们党廉洁自律的光芒。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写到:“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1]新时代的廉洁文化教育党员干部加强自我约束,外化为行动上的自觉,上升为人的自律,不断提高自我道德水平。党员干部在接受新时代廉洁文化教育之后,对照廉洁典型进行自我比对、自我反思,从而增强自身在面对权钱诱惑时的自制力与约束力,逐步在党员干部的头脑中种下“不想腐”的思想根基。

最后,加强廉洁文化建设能够锻造党员干部的自教能力。自我教育是促进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重要途径。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对党员干部的自我教育能力的提高提供了新思路。一是内含了党风廉政的各项标准与要求。党员干部作为清廉作风的先行者与实践者,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接受廉洁文化熏陶的同时,还要把清廉从政的要求作为行动的标尺。二是通过形式多样的教育载体实现对党员干部廉洁品质的塑造。新时代廉洁文化教育载体包括廉洁文化阵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实体资源,也包括英烈楷模廉洁事迹、

廉吏典故等非实体资源。党员干部在进入实体廉洁资源与学习非实体廉洁时,能够深刻学习领会历史与英烈楷模的廉洁品质,以他们为榜样规范自身从政行为,筑牢自我教育的思想根柢。

(二)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政治要求

清正廉洁是共产党人的生命底线与价值追求,廉洁文化是党员干部的政治钙质和精神营养。廉洁文化不仅对共产党人的拒腐倡廉品质具有塑造作用,而且对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有着涵养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决不姑息。”^[2]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党一体推进“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的基础性工程的根基,具有提振党风、匡正政风、涵养民风的基本功能。

首先,廉洁文化建设能够强化政治生态的思想根基。《意见》明确指出,要把营造气正风清的政治生态环境作为一项长期性、基础性的工作。培育党员干部廉洁的思想根柢是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的基础环节。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正是以“思想觉悟”为问题导向,从精神层面着手,崇德尚廉、崇廉拒腐,在人们心底筑起一道反腐败的思想防线。^[3]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把握政治生态的核心部分,从人的思想上激浊扬清,使廉洁奉公、大公无私、清廉自守、甘于奉献的廉洁品质入脑入心,强化政治生态的思想根柢。

其次,廉洁文化建设能够维护政治生态的生长环境。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对政治生态环境有浸润、滋养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政治文化‘日用而不觉’,潜移默化影响着党内政治生态。”^[4]目前,贪污腐败之风禁而未绝,溜须拍马、沆瀣一气等庸俗腐败关系仍有市场,有的地方官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使得败坏党风的沉疴毒瘤根深蒂固。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迫在眉睫。党内政治文化具有的特殊性在于,它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实践而形成的文化,具有政党的属性。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强调从文化建设的层面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对党员进行主流政治文化的熏陶与引导,坚定政治立场。新时代廉洁文化为党内政治文化提供价值体系基础与思想源泉,提供政治生态健康发展的“软件”保障,维护政治系统的稳定、塑造党的形象、形塑党员干部的精神家

园,全方位保证政治生态的风清气正。

最后,廉洁文化建设能够牢固政治生态的社会支撑。政治生态是地方党风政风社风的综合反映,在紧抓党风政风的同时,社风建设也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社风建设得好不好,关系到政治生态的社会支撑牢不牢靠。廉洁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能够为大众提供符合社会发展的主流价值观,推动我们的社会风气向善向好。进行社风建设时,应采用正面激励与反面教训相结合的方式,多管齐下地树立起党员看得见、够得着的严要求与高标准,形成浓厚的尚俭戒奢社会氛围。

(三)共筑海晏河清清廉中国的现实要求

廉洁文化通过发挥其制度文化功能与国际形象树立功能,实现社会结构的稳定以及国家形象的提升。廉洁文化在实践中表现为制度文化,为国家制定法律规范提供基本遵循。

一是为建立和完善反腐倡廉制度提供理论资源。廉洁制度文化包含的廉洁文化和廉洁制度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共生体。廉洁文化影响廉洁制度意识的形成、廉洁制度模式的确立以及廉洁制度价值观的塑造。就廉洁制度意识的形成来看,廉洁文化建设要求加强社会的公平正义,能够树立否定特权思想的平等制度意识。“如果说战争、运动、权力三大载体在反腐中主要是解决严厉的问题,那么以制度为载体的反腐,则主要解决严密的问题。”^[6]廉洁文化建设要求人们从传统的战争反腐、运动反腐、权利反腐转向制度反腐,树立起制度反腐意识。就廉洁制度模式的确立来看,廉洁文化在对以往廉政制度的传承与发扬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古今中外的廉洁制度模式。就廉洁制度价值观的塑造而言,廉洁文化建设的目标就是在全社会形成大众普遍接受、普遍认同、共同遵循的廉洁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符合中国反腐发展历史、符合清廉中国建设的最根本的价值观。将廉洁文化注入廉洁制度价值观塑造过程中,有利于提高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价值认同感,在全社会形成廉洁伦理规范。

二是为建立健全权利运行监督机制提供价值立场。毛泽东同志指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7]文化具有广泛的人民性,廉洁文化也不例外。这说明

权利不仅要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还需要人民的监督,从而有效地避免公权力的滥用与政治腐败。廉洁文化的建设过程也是人民群众不断追求政治参与的过程。随着人民群众对自身的权利认知愈发明晰,人们对权利的监督意识与监督能力也不断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能够推进人民群众政治参与方面的法律制度建设,从而促进政治体制与政治制度的发展完善,为人民群众监督公共权利提供法制保障。

三是廉洁文化能为提高国际形象提供文化载体。腐败不仅是危害中国共产党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也是国际政治的公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2019年,中国首次举办了廉洁丝绸之路分论坛,不仅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庄严的政治宣示,更向国际社会彰显了中国携手各国打击腐败的决心。由中国牵头的“一带一路”倡议天然带有廉洁的底色,廉洁分论坛正是通过“一带一路”向全世界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廉洁文化,将带有中国印记的廉洁理念通过“一带一路”展现给全世界,树立中国在国际上的清廉形象。

(四)为世界提供中国廉洁智慧的实践要求

国家的清廉程度直接影响全球的廉洁程度,不同的国家立足本国国情制定出不同的廉洁文化建设方案,形成同心共筑全球廉洁政治的强大合力。腐败不仅是历史性难题,也是世界性难题。纵观这一个世纪以来,由于贪污腐败而下台的政客屡见不鲜,中国也不例外。针对层出不穷的腐败现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时代新阶段,将反腐倡廉纳入到全球协同的战略高度,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反腐体系。中国拥有全世界最悠久的文明史与先进的执政党,在廉洁文化建设的历程中凝结出独具中国特色的廉洁文化结晶,为提高全球廉洁程度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一是新时代廉洁文化注重从人的思想入手,为其他国家反腐提供了切入视角。反腐倡廉的国家形象的塑造不仅靠强有力的制度来进行约束与规范,更需要人们达到“清则百毒不侵”的精神境界,这为其他国家反腐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意见》指出,领导干部要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自身党性觉悟,坚决筑牢“不想腐”的思想屏障。西方国家主要从制度上着手来抑制腐败的高发现象,比如英国确立文官制度、建

立反腐机构、建构监察机制,美国确立公务员管理制度、健全法律法规体系等。与西方国家重“不敢腐”相比,新时代的中国立足“不想腐”,注重从人的思想入手加强反腐的自觉性与主动性。

二是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重在推进阶段性主题教育活动,为其他国家反腐提供了实践案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领导党员干部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旨在通过持续不断的主题教育活动,督促党员干部在不同时代树立时代需要的理想信念,不断检视自己的思想言行,避免清廉思想蒙尘,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与斗争性。党的十八大以来,腐败现象的减少印证了持续推进阶段性的主题教育的有效性,这也为提高世界政党纯洁性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反腐的制胜法宝。

二、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实践向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祛疴治乱。”^[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反腐败斗争使党员干部“不敢腐、不能腐”的强制力约束不断加强。我国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以“不想腐”为建设目标,坚持守正创新,它既保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拒腐防变的反腐传统,又站在新的历史阶段给予廉洁文化更为丰富的时代特征。在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反腐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在“不想腐”的意识培养上还存在一些不足。新时代的廉洁文化建设,涉及内容、方式、载体、主体等诸多因素,务必以整体思维打造廉洁文化建设工程,重点从“古”与“今”“破”与“立”“中”与“外”“知”与“行”等多管齐下,从而一体推进“三不”基础性工程建设。

(一)“古”“今”结合,促进传承与发扬创新相互耦合

新时代廉洁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历程中,以马克思主义廉洁理论为指导,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取向,科学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在三者与时代的不断自洽中形成的文化新形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

设,应当遵循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相互耦合的原则,坚持古为今用,从深厚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中汲取精神力量。

第一,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涵养克己奉公、清廉自守的精神境界。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廉洁文化发展史。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应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廉洁思想,汲取崇德尚廉、廉洁奉公等传统廉洁文化精华。各个地方部门应当挖掘文物古迹中的廉洁思想,整理古今廉吏的嘉言善状,依托当地丰富的传统廉洁文化资源,打造廉洁文化品牌。同时号召人民群众阅读历史文献、学习廉洁典故,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思想,树立“以廉为荣、以洁为美”的清廉价值观,从思想上与行动上合力提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廉洁文化建设的创新性、创造性贡献。

第二,要以中国革命文化为源泉淬炼大公无私、甘于奉献的高尚品格。中国革命文化由革命物质文化、革命精神文化以及革命制度文化组成,其中革命精神文化是革命文化的根本。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要从革命精神文化中汲取力量,将廉洁教育与革命文化教育相结合。地方各部门应依托党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等革命文化空间进行廉洁教育,再现革命时期中共党员的廉洁事迹,弘扬革命先辈的廉洁事迹,激励干部群众严于律己。同时打造红色旅游路线,并利用各大历史事件纪念日、清明等重要时间节点,组织干部群众前往革命文化空间,感受革命实践的真实性、历史成就的震撼性,从而发挥精神力量的感召性。

第三,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培育为政清廉、秉公用权的文化土壤。廉洁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员干部追求以廉为荣、以贪为耻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需要总结提炼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成功经验,赋予廉洁文化时代内涵与时代价值,使新时代廉洁文化内化为党员干部的价值追求。此外,充分发挥廉洁文化的制度功能,将经过实践检验的廉洁文化经验转化为制度规范,结合制度的教育、指引和规范功能,增强人们的思想自觉性与行动自觉性。

(二)“破”“立”并举,破除痼疾与牢固理论同频共振
政治上的清醒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廉洁文化建设

中的“破”要求我们发扬党的斗争精神剔除腐败文化理论。腐败文化是落后、自私、功利思想的产物,玷污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纯洁性。廉洁文化建设中的“立”则要求把先进理论根植到干部群众的心中,廓清精神世界的迷雾,走出价值误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作为抵制落后腐败的关键一招,其建设步伐一刻也不能放松。新时代廉洁文化的建设关键在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绝对的信仰和坚定的信念抵制贪污腐败,坚守共产党员的精神家园,从而筑牢崇廉拒腐的思想防线和道德防线。

第一,加强理论武装,注重从理论层面增强政治定力与拒腐能力。将理论武装到头脑是坚定理想信念和信仰的前提。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理论每创新一步,党的理论武装就要更进一步。一是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马克思主义蕴含的公仆意识、廉洁政府、民主政治为廉洁政府的建设提供了核心理念、根本目标、保障机制,对于我国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党员干部要将公仆意识牢记于心,外化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行动当中,始终铭记党为人民谋福利的初心与使命。二是坚持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党员干部要坚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通过不断深入学习,杜绝精神“缺钙”现象,拧紧思想“总开关”,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拒腐防变能力与政治判断力。同时,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廉洁文化建设的相关论述纳入到人民群众的日常教育当中,扩大新时代廉洁文化辐射面,以思想理论的坚定保障行动上的坚定,形成拒腐倡廉的社会风气。

第二,坚定理想信念,发扬真理与信仰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8]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灵魂,理想信念的选择决定了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影响其言论与行动。党员干部缺乏坚定的理想信念,就容易走入贪污腐败的恶性循环中无法自拔,这于我党的形象与党风廉政建设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就要从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入手,将我党历来倡导的廉洁理念与优良

传统注入党员干部的思想与灵魂,形成廉洁自律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意志力、坚忍力、自制力。中国共产党要勇于自我革命,不断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将抵制贪污腐败作为一种自律的行为,从源头处清除一切有损党纯洁性的腐败杂质。

(三)“中”“外”联结,对内为主与对外宣传同向聚合

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表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也同理。正如马克思所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以来所代替了。”^[9]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不能走闭关锁国的道路,需要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走向世界的舞台。“中”“外”联结包括两层含义:其一就是坚持以我为主,通过丰富廉洁教育方式来自觉发展廉洁文化;其二就是加大对外宣传,依靠国际组织宣传本国廉洁文化以提升文化影响力。要而言之,提升新时代廉洁文化的建设实效,应坚持国内教育与国外宣传双管齐下,形成国内廉洁文化教育与国外廉洁文化宣传的建设合力。

第一,拓宽廉洁教育渠道,深化国内廉洁文化宣传教育。一是合理运用新媒体新技术,激活廉洁文化资源。廉洁文化资源作为廉洁文化的载体,是廉洁文化留存、宣传、更新的重要载体。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应充分利用廉洁文化资源对党员干部以及人民群众实施经常性与长期性廉洁教育,在全党、全范围内营造崇廉拒腐的清明政治环境。加强廉洁文化宣传力度,创新宣传载体与传播手段,提高人民群众对廉洁文化的知晓度与践行度。二是着重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廉洁教育,发挥“头雁”效应。领导干部是“关键少数”,是各地方、各领域、各单位的“头雁”,具有“关键作用”。新时代廉洁文化的建设需要为政清廉的领导干部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领导建设符合新时代的廉洁文化,这就对领导干部的道德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创新对外宣传结构,强化本国廉洁文化现实影响。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需要不断优化本国反腐倡廉的国际传播方式,向世界展现中国廉洁智慧。首先是创新宣传载体。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需要借助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多边组织宣传本国反腐经验。新时代

廉洁文化建设应当利用诸如“一带一路”这样的国际组织来增强宣传效应,向世界表明中国的反腐决心、借鉴中国的反腐成果,找到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共同点和话语交汇点,增强全球腐败打击力度。其次是创新宣传方式。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需要中国派驻熟知本国反腐建设经验的人才前往世界各地宣传中国反腐历史,同时也应邀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外国友人到本国来见证党风廉政建设所取得的成效。由此形成的双向合作模式使各国反腐合作落到实处,最终实现共赢与共享的理想效果。最后是培养传播人才。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需要我国把培养高质量、高素质的传播人才纳入建设计划当中去。我国既要把党员领导干部培养成能把我国党风廉政建设经验宣传好、把“打虎、拍蝇、猎狐”反腐成效介绍好的代言人,也要加强国际传播队伍建设,培养一批对本国反腐历史熟悉的高素质传播人才,在国际站传播中国反腐智慧。

(四)“知”“行”合一,理论认知与付诸实践同向聚合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10]廉洁文化作为党内政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党员干部有效抵制贪污腐败树立廉洁自信的重要支撑。廉洁文化建设绝不能只停留在党员干部的思想上,更应该在笃行上不断下功夫,走知行合一路线,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自信。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中应当深刻剖析廉洁文化与文化自信的内在关联,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引领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第一,促进廉洁思想内化于心,是增强廉洁文化自信的出发点。理论认识是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受教育层次与生活环境的影响,部分党员干部对我国廉洁文化的发展知之甚少导致思想地基不稳、廉洁观念薄弱。党员干部作为党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清廉程度直接影响到我党的肌体健康。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党史也是我党抵制腐败、瓦解风险的发展史。中国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廉思

想,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应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党员干部的日常教育中,善于运用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道德价值、哲学思维和廉洁事迹,发扬中国革命文化中公而忘私、甘于奉献的典范力量,汲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为政清廉、秉公用权的精神力量,从内心深处根植坚定的廉洁文化自信,增强党员干部知廉耻、辨善恶的能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第二,倡导廉洁思想外化于行,是增强廉洁文化自信的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种价值观念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去感知它、领悟它。”^[11]笃行是使党员干部从被动接受状态转换为主动作为状态的根本途径。新时代廉洁文化的建设,不仅需要个人树立廉洁用权、为官清廉的优秀品质,更需要将个人优秀品质外化到日常的行为当中去,发挥意识形态的指导力量。党员干部要讲政德,就是要对党忠诚、勇于担当、刚正不阿,清清白白做人,堂堂正正做事,自觉做到清白做人、清廉为官、公正办事,加强自身作风建设,形成“头雁效应”。党员干部为官是否清廉切实影响到人民的幸福指数与人民对党的拥护程度。清清白白为民做事是党践行群众路线的内在要求,要将自身的廉洁意识外化为廉洁行为。一是审慎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首位,不以权谋私,不搞权钱交易,自觉遵守廉洁自律的各项规章制度,发挥模范作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二是以常抓不懈的精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将我党百年来取得的反腐经验运用到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当中来,使其在与时代的自洽中不断升华。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69,42-43.
- [2] 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EB/OL].(2022-02-24)[2023-05-04].http://www.gov.cn/zhengce/2022-02/24/content_5675468.htm.
-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5.
- [4] 加强廉洁文化建设 习近平剑指“不想腐”[EB/OL].(2022-01-19)[2023-05-04].<https://news.cctv.com/2022/01/19/AR->

- TImQqm2tKoEDVLa6kOeeJe220119.shtml.
- [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96.
- [6] 李永忠.论制度反腐[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98.
- [7] 黄炎培.延安归来[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148.
- [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15.
-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0.
- [10]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001).
- [1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

(责任编辑:魏琛)

The Value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Direc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grity Culture in the New Era

YU Xingping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Chongqing 401520)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grity culture in the new era is not only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centennial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open up a new realm of self revolution, but also a practical adherence to strengthen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enhancing cultural consciousness, with significan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grity culture in the new era has unique values for individuals, political parties, nations, and the world. It can inject clean and honest genes at multiple levels, and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 integrity political environment that integrates individuals, society, countries, and the world.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grity culture in the new era focuses on comprehensive empower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ncient" and "present", "breaking" and "standing", "middle" and "external", "knowledge" and "action", to achieve the coupling of promoting inheritance and promoting innovation, to eliminate the resonance of chronic diseases and solid theories, to focus on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propaganda, and to aggregate theoretical cognit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the same direction.

Key words: new era; integrity culture; value implications; practical dimension

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振兴：内在逻辑、基本特征与实践指向

李苑

(中共三明市委党校 经济学与生态文明教研室, 福建 三明 365001)

摘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必然和现实依托。从内在逻辑看,乡村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有效应变局开新局、实现共产党人价值追求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由之路,而中国式现代化也为乡村全面振兴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和保障,二者具有思想内核、内涵要义及目标上的逻辑共通性。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振兴道路区别于既有的旧式现代化模式,具有基于中国底色的显著特征。未来要通过加强改善党的领导,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进一步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实现乡村文化繁荣和绿色发展,促进乡村的全面振兴,为新征程中拓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夯基筑台。

关键词: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振兴;中国式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4)07-0032-06

现代化是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产物,也是人类文明演进与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实践证明,迈向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不是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会因各国迥异的历史、国情、文化等而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多样性、差异性和适配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旧式的现代化不同,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性特征,更有立足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农耕历史悠久、农业人口众多,脱离“三农”问题谈中国式现代化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2]由此,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成为了新征程路上“三农”工作的重要抓手,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因而,正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同乡村振兴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深入把握中国式

现代化视域下乡村振兴之路的基本特征,以中国式现代化理念全面引领乡村振兴实践,对于丰富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三农”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关联

(一)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乡村振兴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国内外发展形势、立足中国国情与发展阶段作出的一项重要战略工程,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三农”领域的重要体现。

其一,面对日渐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实施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具备应变局、开新局强大底气的必由之路。从世界范围看,国际形势波谲云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给养为主的发展模式不再是最优选择,尤其是涉及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等领域。从国内范围看,在经历了数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后,中国各方面发展瓶颈与约束日益凸显,包括城乡失衡、资源环境、人口结构等问题。不难发现,上述问题或多涵盖于乡村振兴议题之中,其破解

收稿日期:2023-09-03

作者简介:李苑(1990-),女,汉族,讲师,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

与否,直接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效。^[2]因此,乡村振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应变局、开新局的必然选择,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有效破解发展束缚,助力形成双循环格局,充分释放乡村内在活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深挖潜力。

其二,基于中国国情的鲜明特征,实施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内在价值与目标追求的现实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3]中国共产党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和为民谋利的根本目标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必然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因此,在人口规模巨大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4亿多农村人口不能被落下。乡村振兴战略承载着百年梦想和不变初心,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依靠乡村全面振兴的发展路径让改革成果更多地惠及全体人民,实现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的基本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其三,着眼历史发展的阶段和进程,实施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有效回应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有力举措。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矛盾在城乡关系、乡村发展、农村治理等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说,“三农”问题始终是横亘在中国式现代化前进路上的一座大山,从解决温饱到脱贫攻坚、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不同阶段性矛盾、充分把握乡村发展规律探索出的有效途径^[4]。在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历史坐标上,“三农”工作重心全面转向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直接关系到农业农村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是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确保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力抓手,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相匹配。

(二)中国式现代化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保障

加快乡村振兴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关键环节有其必然逻辑,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为乡村的全面振兴提供稳固的现实基础和有力的支持保障。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蹄疾步稳、持之以

恒地系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就,为开辟中国式乡村振兴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一是经济科技实力持续增强,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力量,是一切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5]中国式现代化最先体现为生产力的现代化,即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经济质效的稳步提升。目前中国已然跃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工业规模不断扩大、新型技术持续突破,工业化、信息化加速融合。国家拥有更强大的经济实力助力乡村振兴事业,而信息技术与数字经济等新型业态的蓬勃发展,更为智慧农业、数字乡村等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探索实践赋能添翼。二是城乡协同发展态势良好,为乡村振兴创造了可持续的前进动力。步入新时代,中国更加遵循以协调发展理念统筹发展的速度与质量,特别是在城乡关系上,不断发挥中国式现代化在维护和促进公平正义上的优势,在现代化进程中确保弱势群体共享发展成果。无论是土地、户籍制度等各类改革探索,还是县域空间在联动城乡上的作用发挥,亦或是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农村资源配置的显著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在城与乡的框架内统筹布局,新型的工农、城乡关系日渐形塑,促进了城乡的良性互动。三是现代市场体系加速构建,为乡村振兴开拓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任务,而乡村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新发展格局下现代市场体系的构建。在社会主义制度资源配置的要求下,推动形成内在统一的市场空间,使得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市场主体活力充分激发,有利于乡村经济转型升级,促进全产业链的建设与传统农业运营模式的根本转变。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农业农村工作的领导核心,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根本体现。一直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在乡村振兴中所具有的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在顶层设计上,党中央及农业农村事业相关部门先后拟订了若干政策法规、发展规划、激励制度等。近年来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乡村振兴标准化行动方案》等,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振兴提供了全面的制度保障。在实践探索上,全国各

地乡村振兴的创新实践不断涌现,探索出了一系列有特色、有亮点、有成效的振兴发展新模式,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经验与科学指引。

(三) 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振兴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核。^[6]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发展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概括和系统总结^[1],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通过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成就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在全面现代化建设的探索中,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贯穿其中,乡村振兴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引对农业农村工作再认识、再升华的实践产物。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个创新理论成果,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最根本的思想内核。

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振兴在内涵要义上具有逻辑共通性。乡村振兴在发展指向、实践理念与宗旨上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具有高度同构性,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涵盖乡村“五大振兴”的内涵注解,如其“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高质量发展”“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本质要求,分别有力地回应了乡村组织、产业、人才、文化、生态振兴的实践指向,二者存在内涵要义上的逻辑共通性^[7]。

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8]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还是乡村振兴的重大实践,归根到底,其落脚点和最终归宿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此,回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元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乡村振兴共同的逻辑起点。

二、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乡村振兴道路的基本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为新时代乡村振兴奠定了具有中国

特色的独特基调,在追寻这一新式现代性道路的逻辑脉络下审视便会发现,我国的乡村振兴之路既有各国乡村现代化的共性特征,也呈现出不同于旧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的自我特色,主要体现为以下6个方面。

(一) 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

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1]的重要论断,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指出:“一定要认清,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9]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立足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适时调整“三农”政策,不断开拓农业农村事业新局面^[10]。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事实证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选择、时代呼唤及民心所向。乡村振兴战略是新的历史阶段拓展和推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为“三农”工作锚定了新方向,同以往党领导下的“三农”工作有效衔接、一脉相承。因此,中国式乡村振兴道路的实现,党依然是领导核心,脱离了党领导下的乡村振兴注定不会是“中国式”的。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之路因党而生,也必将以其为逻辑前提深入推进。

(二) 坚决维护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把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视为最根本的价值取向。而作为乡村建设主体的农民,其根本利益的维护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寻在“三农”领域的生动体现,也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贯穿始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下的乡村振兴道路,与西方国家围绕资本意志、生产力服从资本的逻辑主导下的乡村发展模式不同,西式现代化乡村建设不可能真正回应包括农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甚至还会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以迎合资本意志,使其成为资本的附属品。中国式乡村振兴道路,将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置于首位,充分重视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截至2022年,中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0133元,迈上了2万元大台阶,城乡居民收入比下降至2.45,乡村基本公共服务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农村人居环境不断改善,农民“急难愁盼”的利益诉求持续得到回应。在此基础上,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能被

更好地调动起来,村民自治、土地“三权分置”等改革实践就是重要证实。

(三)以“小生产”规模适应“大市场”需求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地关系紧张的程度尤为突出。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显示,中国耕地面积 19.179 亿亩,而人均耕地面积仅 1.36 亩/人,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 40%。无论是基于人多地少的农业资源禀赋,还是错综复杂的土地资源状况,小规模农业生产有其存在的合理空间,适度规模经营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1]。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2],由此引致了超大规模的农产品市场需求。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我国一样需要面临解决 14 亿多人口吃饭的问题,如何守好耕地红线、端好“中国饭碗”,以小规模生产经营有效满足大规模市场需求、实现“小生产”的现代化转型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任务,也是推进中国式乡村振兴的独有课题,更从侧面凸显了我国乡村振兴之路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四)注重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融合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的一个持续性、渐进性过程,乡村振兴贯穿其中,也必然展现出“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策略特征。其一,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各地乡村在区位条件、历史文化、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没有统一的乡村振兴模式可套用。因此,中国式的乡村振兴道路必然是“因地制宜”的,是在考量乡村发展不平衡实际、科学把握差异特征和发展走势上的大胆实践,最终实现兼容并蓄、各美其美。其二,中国共产党一贯依规律办事,由此决定了中国的乡村振兴道路重视对乡村发展、城乡关系变化阶段性特征的把握,秉持着循序渐进、久久为功的发展步伐。2017 年 10 月 18 日,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同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时间表路线图。纵观之,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步骤安排与党的二十大作出的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的战略安排有机统一、相互适配。

(五)更加关注乡村文化的传承振兴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生成的原生

性文化基因,而由中国农耕文明积淀形成的乡土文化,包括独具特色的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文化作为乡村发展的根与魂,其重要性日渐凸显,也成就了乡村现代化的魅力底色^[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4],而有别于旧式文明形态的中国特色文明模式,离不开乡村文化的内嵌,也必然要求乡村文明的复兴。因此,在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乡村文化的传承发扬,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5]的“三农”逻辑,也是新式现代化之于中国式乡村发展使命的独特性展现。在新式现代化下追寻乡村振兴发展,要求重新认识乡村文化的当代价值,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将乡村文化的内在优势转化为乡村全面振兴的推进动能。

(六)坚定不移贯彻绿色发展新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6]不同于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现在乡村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就是既要具备“金色”价值,又要显露“绿色”。乡村不仅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家园,更是能够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产品与服务的供给地,要正确处理好乡村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关系,注定推动乡村进行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而绿色发展作为发展观的一场革命,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只有坚持绿色发展引领,探索和畅通生态资源向经济效益转化的有效渠道,实现“绿色化”发展,乡村的全面振兴才有可能。换言之,以绿色发展新理念为引领,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本质要求的现代遵循与拓展,也必然彰显于中国式乡村振兴的全过程。

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振兴发展道路的实践指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为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明确了顶层指引和着力方向。在中国式现代化下推进乡

村振兴,必须基于中国制度和中国特色,实现“三农”方向上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为进一步拓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夯基筑台。

(一)加强改善党的领导,有效构筑政治组织保障

党的领导直接关系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和前途命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所在。因此,必须继续加强和改善党对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振兴的全面领导,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为关键,全方位构筑起推动农业农村事业发展的政治组织保障。具体而言,第一,队伍建设上要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队伍。以优化组织结构为目标,落实“头雁”的责任担当,做好后备干部的选拔培养,强化乡村能人的示范引领,确保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的政策、任务能够准确传达、落地。第二,体制机制上要健全责任落实与监督考核。落实落细五级书记抓振兴工作机制,引导村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精准厘定基层组织权责运作边界、优化创新监督方式和考核机制,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第三,职能建设上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引领作用。增强农民群众对乡村振兴的归属感、认同感,激发农民主体意识;加大对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引导与协调,助力小农户有效衔接大市场^[13]。

(二)构建现代产业体系,逐渐夯实共同富裕基石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兴国之要,而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则是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最终关切。对于中国式的乡村振兴道路,产业振兴的中心地位不容动摇,要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一是要加快产业脱贫模式的深刻变革,探索实施脱贫地区特色产业提升及产业自盈利培育工程,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二是要大力发展优质粮食产业,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保障主要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扛稳粮食安全重任。三是要精准发力开拓特色优势产业,以区域独特资源禀赋为基点,准确把握市场需求,科学定位方向,做好“土特产”和区域特色产业文章。四是要做好做活乡村产业融合文章,积极探索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一二三产业交叉重组,助力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五是要以科技赋能高质量发展,加强关键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借力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提

升产业附加值和市场竞争能力,推动构建智能化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全面提升乡村产业现代化发展水平。

(三)完善联农带农机制,稳固提升助农增收能力

中国式的乡村振兴道路必须坚持以农民为中心,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使更多增值收益留在农村、留给农民,奋力助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14]。一是依托多样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专业化合作、产业化经营等方式建立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形成经营主体同农户链上互补、分工合作的良好格局,积极增加农户经营性收入。二是持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深挖资源资产收益,以农地关系为主线完善产权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充分的权益,鼓励农户通过土地流转、房屋租赁等方式获取收益,巩固拓展农户财产性收入。三是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发挥政府再分配调节的重要作用,促进财政、保险信贷等补贴落地生根,合理提高农户转移性收入。四是积极推动各经营主体建立与农村劳动力的利益联结,拓宽用工渠道、规范用工方式等,积极吸纳农民就业,稳定增加农户工资性收入。需要注意的是,要确保经营主体在联农带农的过程中不损害农民权益,在利益分配上,保证公平规范、公开透明,真正达到强农富农,提升广大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四)繁荣发展乡村文化,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动力

走中国式乡村振兴道路,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把乡村文化建设作为“培根铸魂”重要工程抓紧、抓实、抓好,以繁荣的乡村文化为滋养,增强人们投身乡村振兴的热情和动力。具体而言,一要深入挖掘乡村文化的内生价值,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通过乡土文化与农民需求、现代文明的有机结合,在传承保护的基础上实现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丰富多样的当代表达。二要重塑农民作为乡村文化创造和实践的主体性。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通过文化培训基地、乡村对接帮扶等方式,强化对乡村本土文化人才的培育,着力提升农民的现代素养和文化水平,持续增进农民推动乡村振兴的身份认同。三要切实发挥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载体作用,以传承、发扬好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为乡村文明实践的重要内容,凝聚最广泛的发展共识和发展动力,统一乡村现代化发展步伐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局

之中。

(五)坚持生态绿色道路,推动乡村协调可持续发展

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强。因此,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生态绿色发展观引领乡村生态振兴。从实践层面看,第一,保护与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建设宜居和美乡村。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着力解决乡村生态环境突出问题,以治理垃圾、污水、厕所及村容村貌为重点,全面提升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第二,培育与利用生态资源优势,发展乡村生态经济。因地制宜开发“生态+”等绿色产业模式,探索“两山”转化新路径,走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发展之路,增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第三,强化与完善生态制度建设,确保有序顺利推进。从生态环境友好与资源永续利用出发,架构起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生态保护制度体系,全面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健全相关配套制度和生态信息平台建设,以乡村发展的可持续拓展实现高质量的中国式现代化。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吕方.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涵、特征、挑战及关键议题[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3(5):98-105.
- [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4] 谢玉梅.走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振兴道路[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23(6):15-17.
- [5] 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18.
- [6] 高杰,苏艺,付晓.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科学解析、生成逻辑与推进战略[J].农村经济,2023(3):1-9.
- [7] 杨贵庆.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实施乡村振兴的逻辑关联[J].农村工作通讯,2022(23):25-27.
- [8]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实践(党的教育版),2021(7):6-13.
- [9] 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57.
- [10] 王馨,李雪冀.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透视与实践路径[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0(5):9-18.
- [11] 孙迪亮.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三维审视[J].齐鲁学刊,2023(3):42-55.
- [12] 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J].奋斗,2019(3):6.
- [13] 孔祥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政策创新及理论贡献[J].教学与研究,2023(2):17-27.
- [14] 张琦,庄甲坤,孔梅.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农业强国之路的思考[J].新视野,2023(3):76-83.

(责任编辑:魏 琛)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ternal Logic,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Practical Orientation

LI Yua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anming Municipal Party School of CPC, Sanming, Fujian 365001)

Abstract: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he logical necessity and realistic basis for expand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From the internal logic point of view, rural moderniza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s the only way to effectively adapt to the situation, open a new situation, realize the value pursui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solve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has also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and guarantee for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the two have the ideological core, the connotation of the essence and the logic of the goal.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road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different from the existing old modernization mode and has the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Chinese background.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build a modern rural industrial system, further improve the mechanism of linking agriculture with agriculture, achieve the prosperity of rural culture and green development,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journey.

Key words: the report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Chinese-style rural revitalization

风险投资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来自新三板中小企业的经验证据

周蕾, 张礼风

(安徽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采用2010—2020年新三板中小企业数据,实证检验风险投资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可以显著正向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风险投资可以通过监督参与效应显著抑制管理者过度自信;管理者过度自信在风险投资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风险投资可以通过抑制管理者过度自信进而正向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过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仍然成立,风险投资通过融资效应、非资本增值服务、监督参与效应正向促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为发挥风险投资的作用并以此促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政策启示。

关键词: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管理者过度自信;数字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F49;F83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4)07-0038-07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指明以数字化转型推动中小企业增强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方向和路径。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有生力量,在稳定就业、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近年以来,国内外经济恢复基础仍不稳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为适应市场需求进行数字化转型就显得尤为重要,数字化转型可以变革业务管理模式、完善业务操作流程和降低企业成本^[1],为中小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稳步发展注入最强动力。但中小企业受自身规模小、实力较弱、融资渠道有限等因素影响,面临“如何转”“靠谁转”等难题。如何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党的二十大以来急需研究的课题。中小企业依靠市场机制推动长期可持续发

展才是明智之举,而风险投资是市场机制助力企业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风险投资被称为“企业孵化器”,可为被投资企业提供资本、技术、人才、管理等重要生产要素^[2],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经验、指明方向。相较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的管理者对公司管理决策影响更大、受更少的检查和制衡,因而容易产生过度自信的倾向。而风险资本介入能够通过派驻董事、监事等方式参与所投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为企业提供增值服务和监督控制^[3],管理者会感受到投资者的威慑,做出有利于投资者的重要决定。例如,关于更快的国际化^[4]或加速创新过程^[5]从而抑制管理层过度自信行为,使更多资金流向数字化转型建设。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有关风险投资的研究硕果累累,却鲜有研究从风险投资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角度入手,研究风险投资介入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尤其是对风险投资影响数字化转型的机制研究更少。本文对这方面文献进行了补充。第二,有关风险投资的研究,前期成果较少采用新三板中小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鉴于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本文聚焦风险投资通过管理参与抑制管理者过度自信

收稿日期:2023-11-2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BGL076)。

作者简介:周蕾(1981-),女,汉族,教授,主要从事会议理论与实务的研究。

进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风险投资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当前国内外关于风险投资影响受资企业发展的研究成果颇丰。区分风险投资的产权性质,施国平^[6]研究发现国企进行风险投资,能有效促进创业企业创新。吴斌等^[7]研究指出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创新效率的积极影响显著。梁婧姝等^[8]指出风险投资支持显著提升企业创新韧性。区分受资行业类型,张晓宇等^[9]以101家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风险投资可以显著促进医药制造企业创新。魏文江等^[10]利用A股半导体上市公司数据,指出风险投资能增加半导体企业创新能力。风险投资也促进了中小科技企业和初创企业^[11]、科技创新企业^[12]的创新。吴友^[3]从风险投资管理参与角度,研究指出风险投资通过派驻复合型的人员参与管理更能促进企业创新,且企业数字化转型从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也有研究将风险投资作为中间变量,如郝颖等^[13]研究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强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来提升企业研发支出、专利申请数。赵宝芳等^[14]研究发现企业获得政府创新补贴可以吸引后续风险投资,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还有研究区分企业创新的类型,王凯等^[15]从二元创新视角,研究指出风险投资更能促进企业探索性创新。

数字化转型对增强中小企业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其在数字经济代构建持续竞争力的关键路径。在当前数字经济时代,越来越多学者关注数字化转型路径和影响因素研究。路径方面,张夏恒^[16]从政策诉求、政府部门引导与政策扶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探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实现路径。影响因素方面,部分研究从企业内部因素出发,认为董事网络^[17]、员工技能^[18]、资产专用性^[19]和企业文化^[20]等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内部影响因素。另一部分研究从企业外部因素出发,认为制度环境^[21]、减税政策^[22]、消费者需求^[23]、风险投资介入^[24]等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外部影响因素。

中小企业自身资产短缺、资源匮乏、融资难、技术

基础薄弱等,各种因素共同制约着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风险投资可以为中小企业投入大量的、使用期限相对较长的资金,同时通过“筛选效应”之后,可以极大缓解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融资压力。其次,风险投资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可以促进受资企业技术创新、人才培养^[25],整合上下游资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支持和人才支撑。风险投资机构在长期经营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关系网,积累了各种行业运营的专长与经验,可以为受资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搭建关系网、发挥智囊团作用。因此,提出本文假设:

H1 风险投资显著促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二)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中介作用

过度自信是行为财务学中的一种认知偏差,基于高层梯队理论,管理者特质影响他们的战略抉择,进而影响企业的行为。新设企业创始人型管理者会比普通管理者更加过度自信。管理者创始人身份与权力高度集中,会助长管理者过度自信。^[26]本文研究的数据样本为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管理者大多为企业的创始人或企业最大股东^[1],这导致管理权和所有权之间界限模糊,代理冲突较小。相较于大型上市公司企业,中小企业CEO地位更高、权力更大,受更少的检查和制衡,由此可见中小企业管理者过度自信并非罕见现象。研究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易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27]、溢价收购^[28]等,这些行为都会占用企业大量资金,且使企业承担不必要的风险,挤占用于数字化转型的资金。而风险投资为企业提供增值服务和监督控制。^[29]此外,风险投资能够通过派驻董事以显著抑制管理层过度自信,从而降低并购溢价。^[30]

基于风险投资的监督参与效应,风险投资通过管理参与实施监督控制,定期访谈、派驻董事、监事等方式参与所投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从而抑制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的挤占企业数字化转型资金的行为。风险投资机构为了降低投资失败风险,期望获得更高投资收益,也会主动加强对企业日常管理和企业治理的监督。^[31]同时在日常管理中,管理者为了避免风险投资机构提出更换管理层,不得不更多的考虑风险投资机构的目标。其次,风险投资机构的参与,可以向受资企业传输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这一信息,从而提高管理者对数字化转型的重视程

度,形成将数字化转型提上日程的内驱力。为实现高收益,风险投资机构也会想方设法促进企业高效发展,进而形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外驱力。因此,提出假设 2:

H2 管理者过度自信在风险投资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从接受风险投资的中小企业角度入手,选择 2010—2020 年新三板上市的中小企业为样本,并进行以下处理:剔除 ST、*ST 类上市公司以及有缺失值的样本,对所有连续样本数据中的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 1%的 Winsor 缩尾处理;除数字化转型变量数据外,其余数据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数据处理软件为 Stata16。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现有研究中对数字化转型的测量比较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吴非等^[32]的做法,从五个维度对 76 个数字化相关词频进行统计。另一种是赵宸宇等^[33]的做法,从四个维度 99 个数字化相关词频进行统计。本文采用赵宸宇等的做法。

2.解释变量:风险投资。参考吴超鹏^[34]的做法,对于上市公司是否接受风险投资,按如下方法界定:公司十大股东的名称中含有“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创业资本投资”字样的公司界定为具有风险投资背景的公司。此外,对于十大股东名称中含有其他与风险投资词频相关的字样,则通过另外两步途径进行处理。本文构建风险投资虚拟变量,若样本公司接受风投,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3.中介变量:管理者过度自信。采用姜付秀等^[35]的方法,采用薪酬最高的前三名高管薪酬之和与所有高管薪酬之和的比值来测量。此外,管理者数据使用的是董监高数据。

4.控制变量。借鉴以往学者的相关研究,选取可能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上述具体变量的解释详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与度量

Tab.1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测量
被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	EDT	企业年报中数字化转型词频数总和+1 的自然对数
解释变量	风险投资	VCsup	企业前十大股东有风险投资机构为 1,否则为 0
中介变量	管理者过度自信	Default	企业董监高薪酬最高的前三名薪酬之和与所有董监高薪酬之和的比值
控制变量	现金流比率	Cashflow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除以总资产
	两职合一	Dual	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同一个人则为 1,否则为 0
	应收账款占比	REC	应收账款净额与总资产的比值
	存货占比	INV	存货净额与总资产的比值
	固定资产占比	FIXED	固定资产净额与总资产比值
	独立董事比例	Indep	独立董事除以董事人数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总股数
	账面市值比	BM	账面价值/总市值
	是否亏损	Loss	当年净利润小于 0 取 1,否则取 0
	股权制衡度	Balance2	第二到五位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大股东资金占用	Occupy	其他应收款/总资产	
是否四大	Big4	公司经由四大审计为 1,否则为 0。	
管理层持股比例	Mshare	管理层持股数据除以总股本	
上市年限	年份	ListAge	ln(当年年份-上市年份+1)
	年份	Year	虚拟变量
	行业	Industry	虚拟变量

5.模型设定

借鉴温忠麟等^[36]的检验方法,构造递归模型,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探讨风险投资、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

$$EDT_{it} = a_0 + a_1 VCsup_{it} + \sum Control_{it} + \sum Industry_{it} + \sum Year + \varepsilon_{it} \tag{1}$$

$$Default_{it} = \beta_0 + \beta_1 VCsup_{it} + \sum Control_{it} + \sum Industry_{it}$$

$$\sum \text{Year} + \varepsilon_{it} \quad (2)$$

$$\text{EDT}_{it} = \gamma_0 + \gamma_1 \text{VCsup}_{it} + \gamma_2 \text{Default}_{it} + \sum \text{Control}_{it} +$$

$$\sum \text{Industry} + \sum \text{Year} + \varepsilon_{it} \quad (3)$$

上述模型中,企业数字化转型为 EDT,风险投资为 VCsup,中小企业管理层过度自信(Default)为中介变量。 i 表示企业, t 表示时间,Year 是时间虚拟变量,Industry 表示行业虚拟变量,Control 为本文中用到的控制变量。 ε 为公式的随机扰动项。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从表 2 可知,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平均程度偏低,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5.7,各企业之间数字化转型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风险投资(VCsup)的均值为 0.159,表明接受风险投资的企业占比为 15.9%。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均值 0.455,表明将近有一半的企业存在管理者过度自信,标准差为 0.117。此外,其他控制变量中,大股东资金占用(Occupy)均值为 0.805,表示大部分中小企业存在大股东资金占用现象。

表 2 描述性统计

Tab.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变量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EDT	2.649	1.267	0.00	2.56	5.70
VCsup	0.159	0.365	0.00	0.00	1.00
Default	0.455	0.117	0.24	0.44	0.79
Cashflow	0.048	0.070	-0.22	0.05	0.28
Dual	0.337	0.473	0.00	0.00	1.00
REC	0.137	0.099	0.00	0.12	0.51
INV	0.138	0.103	0.00	0.12	0.77
FIXED	0.214	0.136	0.00	0.19	0.78
Indep	0.372	0.052	0.00	0.33	0.60
Loss	0.085	0.279	0.00	0.00	1.00
Top1	0.343	0.143	0.08	0.32	0.76
BM	0.559	0.687	0.05	0.54	10.14
Balance2	0.725	0.589	0.02	0.65	2.96
Occupy	0.805	0.022	0.00	0.01	0.20
Big4	0.014	0.151	0.00	0.00	1.00
Mshare	0.023	0.215	0.00	0.11	0.71
ListAge	0.196	0.769	0.00	1.79	2.83

注:括号中为 t 统计; * $P < 0.1$, ** $P < 0.05$, *** $P < 0.01$ 。(下同)

(二)回归结果分析

表 3 中的(1)~(3)列分别对应上文式(1)~式(3)的回归结果。列(1)是风险投资(VCsup)对企业数字化转型(EDT)的影响,系数 $a_1=0.0783$,在 1%水平上显著。由此,假设 H1 得证,风险投资能有效促进数字化转型。列(2)显示风险投资(VCsup)与管理者过度自信(Default)在 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风险投资可以抑制管理者过度自信。同时,结果显示两职合一(Dual)与管理者过度自信在 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由此证明组织结构是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温床”,权力越大,越容易滋生过度自信现象,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列(2)、列(3)中的、分别显著,说明中小企业管理者过度自信在风险投资影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同时由列(3)中也显著,说明管理者过度自信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H2 得证。

表 3 风险投资、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结果

Tab.3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venture capital, managerial overconfidence and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变量	(1)EDT	(2)Default	(3)EDT
VCsup	0.078 3*** (2.718 3)	-0.010 9*** (-3.472 0)	0.073 7** (2.559 6)
Default	0.443 0*** (2.646 7)		-0.464 0*** (-4.974 0)
Cashflow	0.096 9*** (4.223 0)	0.008 9 (0.467 1)	0.451 5*** (2.695 0)
Dual	0.364 5*** (2.950 9)	0.006 4** (2.556 4)	0.099 2*** (4.312 8)
REC	-0.589 4*** (-4.587 8)	-0.128 3*** (-9.476 3)	0.314 5** (2.536 5)
INV	-1.517 0*** (-16.653 6)	-0.057 0*** (-4.273 4)	-0.620 9*** (-4.812 8)
FIXED	0.731 1*** (3.502 3)	-0.023 1** (-2.142 1)	-1.530 2*** (-16.765 4)
Indep	-0.024 6 (-0.612 0)	0.252 8*** (10.330 4)	0.850 9*** (4.037 1)
Loss	0.090 4 (0.805 5)	0.020 0*** (4.319 7)	-0.013 8 (-0.344 3)
Top1	-0.079 7** (-4.430 4)	0.031 4** (2.309 0)	0.103 7 (0.924 2)
BM	0.066 7** (2.439 4)	-0.020 5*** (-9.061 8)	-0.090 3*** (-5.015 1)
Balance2	1.0037* (1.879 7)	0.004 6 (1.467 6)	0.068 3** (2.495 3)
Occupy	0.097 9 (1.421 5)	-0.027 5 (-0.472 8)	0.999 3* (1.873 3)
Big4	0.285 7*** (5.508 6)	0.026 8*** (3.338 9)	0.108 8 (1.577 3)
Mshare	0.209 5*** (10.659 4)	-0.044 4*** (-7.440 8)	0.270 4*** (5.199 6)
ListAge	2.251 7*** (20.400 3)	-0.004 2* (-1.798 7)	0.208 5*** (10.628 3)
_cons	9 213.0000 0.40 40	0.402 5*** (29.707 3)	2.442 0*** (21.077 5)
N		9 181	9 174
R ²		0.081 0	0.402 0

(三) 稳健性检验

1. 更换被解释变量。参考已有相关文献的做法,采用吴非等^[32]的做法,度量出数字化转型程度。表4为更换被解释变量后,式(1)~(3)的回归结果,各项假设依然得证,说明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4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变量	(1)EDT2	(2)Default	(3)EDT2
VCsup	-0.062 5*	-0.010 9***	-0.065 4**
	(-1.938 4)	(-3.4720)	(-2.030 7)
Default			-0.311 9***
			(-3.156 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0.716 4***	0.402 5***	0.845 4***
	(5.997 3)	(29.7073)	(6.7793)
N	921 3	9 181	9 174
R ²	0.415 0	0.081 0	0.414 0

2. 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由于风险投资机构向企业投入资金后,企业并不会立刻投入数字化转型的建设,而存在一定时间的滞后性,且考虑到本文的解释变量风险投资是虚拟变量,无法进行滞后估计,借鉴赵乐等^[37]与张栋等^[38]方法,对被解释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如列(2)所示,结果仍然在1%水平显著,与本文假设一致。

表5 工具变量法及控制个体检验结果

Tab.5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and

control individual test results

变量	(1)EDT	(2)F.EDT
VCsup	0.079 2***	0.084 6***
	(2.756 8)	(2.732 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行业	控制	
个体	控制	
_cons	1.362 6***	1.654 3***
	(9.131 9)	(10.353 2)
N	8 235	7 374
R ²	0.355 0	0.331 0

(四) 回归结果分析

进一步区分中小企业的行业类型,将其划分为高科技行业和非高科技行业进行分组回归。实证结果显

示,相较于非高科技行业,风险投资对高科技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起到显著促进作用。在划分中小企业所处地区,将其进行分组回归,发现处于东部地区的中小企业相较于西部和中部地区,风险投资对其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中小企业是否持有其他金融机构股份,在风险投资对数字化转型的作用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金融机构一般具有较强的市场分析能力和市场信息搜集能力,通过持有金融机构股份,企业可以获得更多市场资源,更能把握市场发展方向,而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大势所趋,故持有金融机构股份可以通过信息获取和决策者认知提升,显著提高风险投资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相关回归结果见表6。

表6 进一步分析回归结果

Tab.6 The regression results were further analyzed

项目	(1)高科技行业	(2)东部地区	(3)EDT
VCsup	0.116 0***	0.121 6***	0.072 7**
	(3.384 2)	(3.574 7)	(2.477 8)
FinInst			-0.283 8**
			(-2.287 2)
VCsup*FinInst			1.403 2*
			(1.919 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2.660 9***	2.129 9***	2.346 5***
	(17.565 5)	(15.610 1)	(19.557 1)
N	5 755	6 811	8 808
R ²	0.433 0	0.403 0	0.408 0

四、结论和启示

(一) 研究结论

通过融资效应、非资本增值服务、监督参与效应,利用2010—2020年新三板中小企业数据,实证检验得到如下研究结论:第一,风险投资通过融资效应,不仅能为企业提供大量使用期限相对较长的资金,还能通过信号传递理论降低企业外界融资约束,拓宽其融资渠道,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丰硕的资金支持。此外,风险投资机构在长期经营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关系网,积累各种行业运营的专长与经验,可以为受资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搭建关系网、发挥智囊团作用。第二,风险投资可以抑制管理者过度自信,进而促

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管理者过度自信在风险投资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这基于风险投资监督参与效应实现,风险投资通过管理参与方式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受资企业管理者基于风险投资后的股权稀释,权力受到削弱等因素。此外,风险投资机构的参与,可以提高管理者对数字化转型的重视程度,形成将数字化转型提上日程的内驱力。第三,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风险投资对属于高科技行业、位于东部地区或持有金融机构股份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二)研究启示

一是风险投资机构通过为中小企业投入大量的、使用期限相对较长的资金,同时通过“筛选效应”之后,可以极大缓解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融资压力。同时,风险投资显著的溢出效应整合上下游资源,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支持和人才支撑。风险投资机构在长期经营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关系网,积累各种行业运营的专长与经验,可以为受资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搭建关系网、发挥智囊团作用。风险投资机构通过股权投资、提供风险贷款等方式向中小企业注入资金,缓解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资金需求,同时通过管理参与抑制中小企业管理层过度自信行为,提高中小企业的管理水平。风险投资机构在提供资金和增值服务的同时,将自己的技术、管理、营销等理念注入到企业当中,为企业完善治理的机制及后续治理机制,有效推动中小企业发展。

二是中小企业可以通过主动与风险投资机构建立联系,选择最佳时机引入风险投资。中西部地区和非高科技行业的中小企业更应主动创新商业模式、整合资源,以便在风险投资的加持下更大程度的进行数字化转型。中小企业管理者要提高思想认识水平,转变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不敢转”“不会转”的窘境,重视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小企业管理者积极配合风险投资机构的管理参与、定期访谈,与风险投资机构派驻的董事、监事等人员共同治理公司。

三是政府要加快风险投资配套制度建设,完善风险资本的退出机制,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鼓励风险投资上下游产业集聚发展,完善募投退良性循环政策。支持开拓多元化募资渠道,如通过给予风险补助

等形式。丰富市场退出机制,如为风险投资企业股权或财产份额转让提供便利;同时,政府要积极探索出方法路径、市场机制和典型模式以鼓励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化财政金融政策协同,保障中小企业融资需求。

参考文献:

- [1] ANDRÉ H, RENÉ B, DAVID M, 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sights and implications for strategy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21(5): 1159-1197.
- [2] 曹文婷, 杨永华. 风险投资能否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基于受资中小企业溢出视阈的考察[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3, 40(3): 52-62.
- [3] 吴友, 董静. 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 效果评估与机制验证[J]. *上海经济研究*, 2022(4): 112-128.
- [4] MAULA M, AUTIO E, MURRAY G. 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ists and independent venture capitalists: What do they know, who do they know and should entrepreneurs care[J]. *Venture Capital: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Finance*, 2005, 7(1): 3-21.
- [5] HELLMANN T, PURI M. Venture capital and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start-up firms: Empirical evidence[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2, 57(1): 169-197.
- [6] 施国平. 国企进行风险投资能培育创业企业创新吗?[J]. *管理评论*, 2023, 35(8): 157-170.
- [7] 吴斌, 张雪莹, 石羞月. 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检验[J]. *财会月刊*, 2023, 44(11): 23-30.
- [8] 梁婧妹, 刘涛雄. 企业创新韧性及风险投资的影响: 理论与实证[J]. *科学学研究*, 2024, 42(1): 205-215.
- [9] 张晓宇, 刘安琳. 医药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与风险投资作用机制研究[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3(8): 178-181, 211.
- [10] 魏文江, 钟春平. 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 研究综述与展望[J].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22(6): 1-10.
- [11] 徐明. 政府风险投资、代理问题与企业创新: 来自政府引导基金介入的证据[J]. *南开经济研究*, 2022(2): 51-67.
- [12] 丁健. 风险投资对中国科技创新企业创新发展的影响[J]. *社会科学战线*, 2022(2): 246-251.
- [13] 郝颖, 李雪轶, 张喻雯, 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风投类型与企业创新[J]. *统计与决策*, 2023, 39(8): 168-172.
- [14] 赵宝芳, 陈晓丹. 政府创新补贴、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 基于信号传递的视角[J]. *管理评论*, 2022, 34(12): 109-120.
- [15] 王凯, 马超宁, 薛坤坤. CVC与IVC对初创企业二元创新的

- 影响[J].财会月刊,2022(3):42-50.
- [16] 张夏恒.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障碍、驱动因素及路径依赖:基于对377家第三产业中小企业的调查[J].中国流通经济,2020,34(12):72-82.
- [17] 李洋,罗建志.董事网络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效应及作用渠道[J].管理现代化,2023(5):98-107.
- [18] ELLER R,ALFORD P,KALLMÜNZER A,et al.Antecedents, consequences,and challenge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digitalization[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20(112):119-127.
- [19] 曾雅婷,徐新月,赵育瑶,等.资产专用性是否抑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审计与经济研究,2023,38(5):66-75.
- [20] HININGS B,GEGENHUBER T,GREENWOOD R.Digital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J].In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2018(1):52-61.
- [21] 孙伟增,毛宁,兰峰,等.政策赋能、数字生态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J].中国工业经济,2023(9):117-135.
- [22] 卢小祁,俞毛毛.减税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路径研究:基于增值税税率降低的视角[J].当代财经,2023(10):30-43.
- [23] 陈国青,曾大军,卫强,等.大数据环境下的决策范式转变与使能创新[J].管理世界,2020(2):95-105,220.
- [24] 王洪涛.风险投资、市场响应与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效性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21(11):103-106.
- [25] 刘娥平,钟君煜,施燕平.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J].财经研究,2018,44(9):52-65.
- [26] FAST N J,SIVANATHAN N,MAYER N D,et al.Power and overconfident decision-making[J].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2012,117(2):249-260.
- [27] 王霞,张敏,于富生.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行为异化:来自我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08(2):77-83.
- [28] ROLL R.The hubris hypothesis of corporate takeovers[J].The Journal of Business,1986,59(2):197-216.
- [29] 吴友,董静.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效果评估与机制验证[J].上海经济研究,2022(4):112-128.
- [30] 宋贺,余晶晶,何德旭.风险投资、管理层过度自信与企业并购溢价[J].商业经济与管理,2022(3):27-41.
- [31] 权小锋,徐星美.风险投资、内部控制与审计定价[J].财经研究,2017,43(6):132-145.
- [32] 吴非,胡慧芷,林慧妍,等.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1,37(7):130-144,10.
- [33] 赵宸宇,王文春,李雪松.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财贸经济,2021,42(7):114-129.
- [34] 吴超鹏,吴世农,程静雅,等.风险投资对上市公司投融资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12,47(1):105-119,160.
- [35] 姜付秀,张敏,陆正飞,等.管理者过度自信、企业扩张与财务困境[J].经济研究,2009,44(1):131-143.
- [36] 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4,22(5):731-745.
- [37] 赵乐,王琨,任宏达.CFO高管排位与企业投资效率[J].中国会计评论,2020,18(3):407-436.
- [38] 张栋,胡文龙,毛新述.研发背景高管权力与公司创新[J].中国工业经济,2021(4):156-174.

(责任编辑:叶丽娜)

Venture Capital and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New Third Board of SMEs

ZHOU Lei, ZHANG Lifeng

(School of Accountancy,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Anhui 233030)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on the New Third Board from 2010 to 2020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venture capital on enterpris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its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venture capital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venture capital can significantly inhibit managers' overconfidence through supervision participation effect; managers' overconfidence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impact of venture capital on enterpris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Venture capital can positively promote enterpris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y restraining managers' overconfidence. After the robustness test, the above conclusions are still valid. Venture capital is positively promo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MEs through financing effect, non-capital value-added service and supervision participation effect. This study provides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leveraging the role of venture capital and thereby promo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venture capital;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overconfidence of manager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慈善信托主体的权责配置与建构维度

许冬琳

(闽江学院 法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慈善信托的主体法律制度是慈善信托良性运行的基础。我国《信托法》《慈善法》对主体制度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其可操作性仍存在一定不足,掣肘了慈善信托的发展。为实现慈善信托的公益慈善目的,探讨慈善信托主体的权责配置实为必要。细化信托主体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明确监察人的选任和退出机制,调和各方利益、构建权责均衡的主体结构,以防范和化解滥用慈善信托的风险。

关键词:慈善信托;主体;权责

中图分类号:D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4)07-0045-07

起源于英国的慈善信托,因其灵活且有效的财产管理模式,成为实现慈善目的的重要途径。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以后大多移植了“慈善信托”制度,并以“公益信托”命名。我国在2001年《信托法》制定时,用专章规定了公益信托,从法律层面确立了公益信托制度。然而近20年来,我国却未能构建本土化、可操作的公益信托法律制度。立法供给不足,如税收优惠等配套细则的支持、公益事业管理机构不明确导致设立审批难等问题,使得公益信托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营业信托和民事信托。2001至今,公益信托数量屈指可数,包括准公益信托^①在内的公益信托约31个,且信托财产规模较小,发展几近停滞,并未成为我国慈善公益事业的主要形式。^②与此同时,我国慈善事业已有了显著发展,慈善捐赠规模稳步增长,但慈善捐赠的财产类型、规模和形式仍旧落后于发达国家,不少股权捐赠流向海外。在慈善公益活动面临种种困境之下,如何发挥公益信托制度的功能和优势,是立法者亟待解决的问题。^③因此,2016年《慈善法》再次移植了英美法系的慈善信托制度,明确了慈善信托属于

公益信托,是委托人基于慈善目的,依法将其财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意愿以受托人名义进行管理和处分,开展慈善活动的行为。《慈善法》及其配套制度的顶层设计,给予了慈善信托更多的激励和支持,并拓宽实现慈善目的的路径。相较于寥寥无几的公益信托项目,慈善信托登记备案数量相当可观,截至2023年11月28日全国范围内备案的慈善信托1563单,信托财产规模9285亿元。^④然而,慈善信托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却也面临着诸多困境,其主体法律制度有待在理论中进一步溯本清源从而完成本土建构。明确慈善信托主体的权利、义务、责任以及相互制衡的关系,以增强慈善信托财产的安全性、有利于慈善目的的实现,也是慈善信托良性发展的基础。

一、激励委托人参与慈善信托的制度安排

慈善信托的委托人,是慈善信托的发起人。委托人基于慈善目的,依法将其财产委托给受托人,开展慈善活动。因此,要检视和论证我国慈善信托主体的权责配置和建构,探讨委托人的资格和权利义务的制度安排,是必要的逻辑前提。

(一)委托人设立慈善信托的“慈善目的”探析

慈善信托由委托人设立,信托目的也是基于委托人的意思表示,《慈善法》第44条明确了委托人“基于慈善目的”设立慈善信托。从通俗词义上看,“慈善”是

收稿日期:2023-12-07

基金项目:福建省高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项目(JSZM2021069)。

作者简介:许冬琳(1981-),女,汉族,讲师,主要从事经济法学研究。

民间的扶贫济困,慈善主体多为民间力量(自愿提供);“公益”更强调社会福利和人类未来,公益主体多为政府部门(强制提供公益)。^[4]而从法律内涵上看,“慈善”和“公益”的法律内涵有一致性。“公益”的法律内涵,是不特定多数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慈善”的法律内涵乃是“为公益服务”“提供公共物品”,而《元照英美法词典》对 charitable(具有慈善性质的)的中文注解是“在法律意义上,该词意味着某一捐赠用于一般公共目的……服务于不确定数目众人的利益。”^[5]我国《慈善法》第3条亦明确了该法所调整的慈善活动是“公益活动”。可见,法律意义上的“慈善”,主要指救济贫困、促进教育、保护环境等社会公益活动,是提供公共物品的途径,也是社会福利再分配的渠道。从我国目前法律文本和信托实践来看,我国慈善信托和公益信托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指英国法中的慈善信托(Charitable Trust),均是以公共利益为信托目的,由此亦有别于其他信托类型。

(二)慈善信托委托人的资格

《慈善法》并未明确慈善信托委托人的资格,《信托法》第19条和《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第8条规定:“委托人应当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可见,慈善信托委托人的限制性条件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三)慈善信托委托人的权利义务配置

英美法系的信托委托人一般在信托成立后即不再对信托财产享有以所有权为核心的财产性权利,委托人不再参与信托治理,执行信托的权利转移给了受益人。慈善信托委托人也不例外,委托人不再享有信托财产的管理权、处分权和收益权等。大陆法系的信托委托人不再对信托财产享有财产权利,并不意味着退出信托,委托人仍然享有法定和信托文件约定的权利,当然在法律性质上并非财产权,而是基于其身份而产生的身份权^[6],根据信托法原理,慈善信托委托人享有的权利一般限于监督权。《慈善法》第47-49条,《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第11、33条均规定了委托人一定的监督权,包括知情权、获得救济权、对受托人关联交易的同意权、设立监察人的权利、变更受托人的权利、调整信托财产管理方法的权利。此外,《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第38条规定,信托文件也可以约定委托人享有其他权利,如增加委托人、增加信托财产、变更信托受益人范围及选定的程序和方法等。没有设立监察

人的慈善信托中,委托人保留监督权实为必要之举,这也是我国《慈善法》激励委托人设立慈善信托的举措。同时,允许委托人参与慈善信托运行,尊重委托人的意思表示,也符合我们当下的国民心态,实现其亲身参与公益慈善的意愿,降低了外部监管成本。^[7]

《慈善法》第47条明确了委托人变更受托人的权利:“慈善信托是委托人将自己的财产用于慈善活动,慈善信托相关事项明确需变更的,应当尊重委托人的意思。”^[8]在慈善信托的实践中,信托文件有必要对变更受托人这一权利配置事项作出明确的约定和指引。变更受托人的程序和选任方式,委托人应在信托文件中予以明确。若慈善信托委托人众多,投入金额不一,在变更受托人时缺乏相应的决策机制,可参照《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45-46条规定,设立委托人大会,通过召集、表决、公示程序决定变更受托人,信托文件可以约定委托人的表决权,譬如一个委托人一个表决权,与投入金额无关;在委托人大会长时间不能召开或有其他不能的情形下,由民政部门变更受托人。值得关注的是,自然人委托人死亡或者机构委托人解散且没有继承人时,即便设立了监察人,依照《慈善法》第49条规定,也并不享有直接变更受托人的权利,而变更权由谁行使,在《慈善法》未来修法中,应对这一问题有所回应,建议由民政部门行使变更权。

根据信托法的基本法理,信托成立之后,除某些特定情况约定成立后转移交付信托财产外,委托人原则上不再对受托人和受益人承担法定的义务和责任。但是《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第25条规定,受托人有获取慈善信托报酬的权利,如果信托文件中明确由委托人支付受托人报酬,那么委托人应当按照信托文件的约定履行支付受托人报酬的义务。目前的实践中,慈善信托受托人基于支持慈善事业的初衷而不领取报酬,或者按照一定的标准从信托财产中支取报酬。

二、慈善信托受托人的权责配置及其规范重塑

《慈善法》第46条明确了慈善信托受托人,限于信托公司和慈善组织。目前慈善信托的受托人模式一般有以下两种:慈善组织或信托公司单独受托、共同受托人。信托公司与慈善组织是两类性质不同的机

构,各有其优势,信托公司是营利性金融机构,营业信托是其主业,在担任慈善信托受托人时,可以发挥资产管理的优势,实现慈善信托财产的保值增值;慈善组织是非营利性机构,在慈善项目资源、项目实施乃至社会影响力上,都较信托公司有更大的优势。

(一)慈善信托受托人的权利

慈善信托成立后,完成了信托财产的转移,受托人即享有信托财产所有权,对信托财产享有请求委托人转移财产的权利,此外还有对信托财产占有、管理、处分等权利,且原则上不被干预和限制。此外,慈善信托合同也可以约定受托人享有其他权利,如可以约定受托人享有获取信托报酬的权利。我国《慈善法》并未明确赋予慈善信托受托人的获取报酬权,但是《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第29条第3款间接承认了受托人获得信托报酬的权利。

(二)慈善信托受托人承担的义务和法律责任

慈善信托受托人的权责配置,对慈善信托的运行会产生框架性的外部影响。慈善信托受托人享有信托财产所有权,并享有管理处分信托财产的权利,因此被严格限制了管理处分的行为,以实现权责的平衡。《信托法》《慈善法》和《慈善信托管理办法》仅以限制性、禁止性的条款约束受托人的管理和处分行为。目前我国立法明确的受托人法定义务主要包括以下6个方面:

其一,登记的义务。《慈善法》明确了受托人应当至信托文件签订之日起七日内,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的义务。

其二,分别管理的义务。慈善信托财产与受托人自有财产、其管理的其他财产,应分别管理,非资金类信托财产可以委托第三人保管;资金信托设置不同账户,分别管理、记账,并由商业银行担任保管人。对此,《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第26-28条有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私分、挪用、截留或者侵占慈善信托财产”。

其三,忠实义务。受托人应忠于委托人所托,以实现慈善信托目的为宗旨,对慈善信托尽到忠实、负责和善良管理的义务。最直观的义务表现是受托人不得为自己或受益人外的第三人谋取利益。我国《信托法》第25-28条、《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第24-25条对这一原则作出了阐释性规定,明确受托人应该“为了受益人的最大利益”“诚实、信用”,禁止将信托财产以任何方式转变为其固有财产,不得谋取除信托报酬外的信

托利益。《慈善法》第48条要求受托人“应当按照信托目的,恪尽职守,履行诚信、谨慎管理的义务”。传统信托法理中的忠实义务,一般禁止受托人“自我交易”^②和“双方代理”^③,以防止受托人在交易中获得事实上的或潜在的利益,违反“只为受益人利益”的原则。但受托人交易行为能让受益人获得更多的收益,也能使受托人在其中获益,那么从“受益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可以有限的容许本该禁止的交易行为。因此《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第31条突破了绝对禁止“自我交易”和“双方代理”的规则,在但书规定下,有限承认上述两种交易的正当性。我国在移植信托制度时,并未厘清信义义务,而信义义务恰是英美信托法预防和化解道德风险、保护信托目的的重要制度安排。在我国现有的受托人义务配置中,忠实义务应是信义义务的核心,也能充分化解和释放慈善信托的内部风险。随着现代商业活动的高度复杂化和专业化,受托人的信息地位愈显优势,委托人和受益人在信息获取、识别上的成本越来越高,信息不对称越来越明显。受托人的忠实义务有其不可替代的制度功能,通过这一义务的配置以维持受托人与受益人的信息均衡,约束受托人的自由裁量权。根据现有立法,受托人必须遵守法律的禁止性、限制性和其他强制性规范安排,如制作和保存账簿等;并通过损害赔偿等责任机制的设置,约束受托人的行为,以保障慈善目的的实现。但我国目前立法关于受托人忠实义务的规定存在一定的规制漏洞,主要体现在法律责任的尺度与违法行为不完全匹配上。根据《信托法》第26-27条的文义,受托人的违法行为并不能尽数被涵摄。受托人利用信托财产为自己谋利,但没有获利或者为第三人谋取利益的情形下,无法依据《信托法》第26条规定将“所得利益归入信托财产”,即无依据追究受托人责任;受托人侵占信托财产却未造成信托财产损失的,只需承担恢复原状的法律义务。这样的制度安排,忽略了受托人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本身的违法性、侵权性以及给受益人造成利息和投资收益等间接损失,尤其是慈善信托受托人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侵害了公共利益。未来修法或慈善信托合同中应建立相应的规范逻辑,防范利益冲突,对受托人利用其身份获利的行为,设定惩罚性机制,要求受托人承担包括直接和间接损失在内的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可追究其刑事法律责任。

其四,谨慎注意义务。受托人在慈善信托运行过

程中,为实现信托目的,应尽职尽责、谨慎管理,在投资过程中也应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避免信托财产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我国《慈善法》第48条明确了受托人“谨慎管理的义务”。当信托公司担任慈善信托受托人时,并不能完全适用私益信托的投资规则,基于慈善信托的慈善属性,信托财产的安全性应被置于首要位置,应综合平衡信托财产的保值、稳定增值,以规避投资风险。我国《慈善法》第54条规定了慈善财产投资应严格遵守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第30条明确了受托人低风险资产投资的原则和范围。当然,如果信托合同约定不得投资的财产,受托人也应遵守约定的义务。《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中还严格禁止慈善组织将政府资助的财产用于投资,信托公司在担任慈善信托受托人时是否应直接适用这规定,仍有待商榷,但委托人在信托文件中,应对投资的要求和范围作出必要的限定。

其五,公平对待受益人的义务。受托人在分配信托收益时,必须基于慈善目的,公平对待每一位受益人,不偏不倚,其公平义务主要体现在选择受益人时,给予受益人慈善扶持时。这一义务及受托人的法律责任我国立法尚未明确。受托人违反公平义务的行为,实质上违反慈善信托目的,依据《信托法》第22条规定,委托人、监察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处分行为,并要求受托人恢复信托财产的原状、重新选择受益人、变更扶持方式或者要求受托人(第三人)予以赔偿;不符合信托目的的“受益人”明知是违反信托目的而接受该财产的,应当予以返还或者予以赔偿。

其六,信息披露和清算义务。慈善信托受托人有向委托人、受益人、监察人、监管部门和社会公众披露信息的义务,包括信托事务处理情况和信托财产状况。此外,在慈善信托终止时,受托人有义务对慈善信托进行清算,并出具清算报告。

三、慈善信托监察人的地位和功能

美国信托法中的信托保护人制度是信托监察人制度的雏形,为有效督促受托人履行义务和保护受益人权益而创设,由保护人监督受托人的行为,在受托人无暇或无力监管的情形下履行监管职责并代为决定信托事务。^[9] 由于缺少衡平原则(the Principle of Equity),移植慈善信托后,日本创设了公益信托监察

人制度。通过设立监察人,赋予其监督的权利,也要求其忠实、勤勉地承担其职责,保护受益人、保障信托目的的实现。我国《慈善法》第49条明确了设立监察人的目的是监督受托人、维护委托人权益、协助委托人实现信托目的,对“受托人违反信托义务或者难以履行职责”的情形,向委托人报告或提起诉讼。可见,信托监察人成为委托人的内部监管助手^[10];同时,《信托法》第65条和《慈善法》第49条均规定了监察人应维护受益人的利益,因此信托监察人也是受益人的“保护人”。

《慈善法》第49条规定“慈善信托的委托人根据需要,可以确定信托监察人”,确立了慈善信托监察人选择性设置的制度,由委托人根据实际需要选择是否设置慈善信托监察人;对于小型慈善信托而言,资金规模较小,委托人可能无力承担设立监察人的成本,且委托人能自行监督受托人或者完全信任该受托人,则可不设立监察人;若委托人无暇监督,可设监察人替代自己监督受托人。由委托人自愿设立监察人,便利了慈善信托的设立,也降低了因选择监察人而增加的设立成本。

《信托法》和《慈善法》并未明确监察人的选任资格,根据“慈善中国”网站慈善信托资料统计,我国目前的慈善信托大部分设立了监察人,大多是律师事务所或会计师事务所,也有自然人担任监察人的慈善信托。对于慈善信托监察人的辞任、解任和变更,现有立法均未加以规定。

同时,现有立法对监察人的权利义务作了原则性规定,《慈善法》第49条第2款规定:“信托监察人发现受托人违反信托义务或者难以履行职责的,应当向委托人报告,并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慈善信托管理办法》明确信托终止时,受托人所作出的慈善信托清算报告应得到监察人的认可。可见,除了享有对受托人的监督权外,监察人还享有诉讼的权利,针对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或其他违法行为,侵害慈善信托财产或受益人的情形,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必要,监察人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此外,根据《信托法》第54条规定,在行使职权和履行义务的过程中,监察人也应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

(一) 现有慈善信托监察人制度掣肘慈善信托目的的实现

慈善信托的受益人不同于私益信托的受益人,是

抽象的不特定多数人,具体获益的个体或群体并不具有受益人的法律地位,没有信托法上的受益权,仅是受领人,无法如同私益信托的受益人享有监督受托人、变更受托人及其行为的权力。^[11]《信托法》和《慈善法》因此规定公益信托、慈善信托监察人有权监督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运作管理,维护委托人和受益人的权益。

《慈善法》明确了慈善信托选择性设置信托监察人制度。同时,将受托人范围限定为受到严格监管的慈善组织和信托公司两类法人,二者的设立审批程序严格、组织机构、运作均被严格监管。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制度安排能确保慈善信托规范有效运行,也简化了慈善信托设立的程序。但是,监察人空缺的情形下,慈善信托因缺乏特定的受益人,亦无法行使监督权,在内部监督上,只能依赖委托人行使监督受托人的权力。一旦出现以下两种情形,委托人就难以监督受托人,导致内部监督空缺、内部治理失衡:一是委托人和受托人勾结以公益之名行私益之实的情形,尤其受托人或委托人一方是另一方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抑或同受一个实际控制人所控制;二是委托人为社会公众难以形成有效意思表示和监管,慈善信托的内部监督则无从实现。^[12]从外部监管的角度看,如受托人的行为均由民政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监督,监管部门要及时制止和纠正受托人违背信托义务、侵害受益人权益的行为。行政监管的成本是巨大的,且可能存在“监管空白”,导致对受托人监督的弱化,一旦慈善信托受托人将信托财产用于非公益用途,实际上侵害了社会公益。若监督职能前移给监察人,经过监察人认可的事项,由监管部门予以核准,受托人公告;由监察人及时发现并报告受托人违法、违背信托义务的行为,足以减少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

(二)确立任意性与强制性有机结合的监察人设立制度

慈善信托监察人制度滥觞于日本,日本根据公益信托受益人的不同,采取不同的监察人制度安排。一类是无法确定具体的受领人的公益信托,如治理河流污染、保护生态的公益信托,采取监察人任意性设立的制度;另一类是能确定具体受领人的公益信托,如资助科研项目或奖学金项目,则须强制设立信托监察人,因为受领人除了被动接受信托收益外,几乎不能行使《信托法》上赋予受益人的各种权利。^[13]因此,我国

《信托法(2001)》明确公益信托“应当设置信托监察人”,是为强制性设置的制度安排;在考虑效率的前提下,《慈善法(2016)》突出了委托人的意思自治,选择了选择性设置监察人,也淡化了行政机关对慈善信托的干预。^[14]然而,在我国现阶段仍有“慈善乱象”等负面信息的情况下,《信托法》的规定仍有相当的合理性。我国的慈善信托监察人制度在未来修法中,可借鉴日本思路,根据委托人的实际监督能力设立慈善信托监察人,一种情形,即委托人是慈善组织、法人、其他社会组织或者特定自然人,委托人在监督受托人行为方面有更强的能力和动因,可以根据委托人的意愿设立监察人;另一种,委托人是社会公众、失去监督能力等情形,委托人无力监管;委托人或受托人一方是另一方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或同受一个实际控制人所控制,有滥用慈善信托的风险,应建立慈善信托监察人应强制设置机制,由负责备案的民政部门指定慈善信托监察人。监察人的设置,有利于提高慈善信托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有辅助监管机构监督、防止滥用慈善信托的功能。立法中还应明确监察人的任职条件,其任职条件一般应高于一般法人管理人员的任职要求,除了道德品行良好之外,还需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和技能。

此外,慈善信托监察人的退出机制亦有必要完善。监察人在任期上,有正当理由难以履行职责主动辞任的,经委托人或民政部门同意,并由委托人或民政部门按照信托文件约定的选任方式和程序,重新选任监察人。监察人死亡、解散、破产、被撤销等情形下,也应重新选任监察人。

(三)明确监察人职权以完善内部监督体系

除了现有立法赋予监察人的监督权和诉权外,委托人根据其实际需要,可以在信托文件赋予监察人和委托人同等的知情权等,以实现其在内部监督中的制度功能。《慈善法》第49条规定,在受托人因终止、解散、破产或辞任等因素不能履行义务、不能担任受托人的情形下,或受托人有较大过错或违背信托义务的情形下,监察人应报告委托人,由委托人变更受托人。此外,还可以赋予监察人报酬和监督费用请求权。譬如,当受托人提供的账簿等相关材料过于专业、复杂时,应赋予监察人咨询和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或专业人士鉴定说明,相关费用应从信托财产中支出。

监察人的职权具有权力和义务的复合性,其行使

权力也是履行义务。^[14]其义务应包括:高于一般人的注意义务、忠实义务、禁止关联交易、公平选择和对待受益人等义务。慈善信托监察人违背信义义务或者违反信托目的而有不当行为,就应当承担与其职权和职责匹配的法律責任。关于慈善信托监察人的法律責任,我国现行立法尚未明确规定,但是慈善信托法律关系的本质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一种,慈善信托监察人民事主体,其监督行为亦是民事行为,因此慈善信托监察人最常见的法律責任是民事責任,其責任形式主要是恢复信托财产的原状、赔偿损失等。

值得注意的是慈善信托清算,《慈善法》第50条规定,“慈善信托……清算等事项,本章未规定的,适用本法其他有关规定;本法未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的有关规定”。慈善信托清算适用《信托法》的规定,即受托人的清算报告要经过监察人的认可,并报主管机关核准,受托人予以公告。《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第42条^⑥延续了《信托法》的基本思路,慈善信托如果设立监察人,清算报告应经过监察人认可;但将公益信托清算报告的(公益事业管理机构)核准制,改为向民政部门报告制。根据文义推断,没有设置监察人的慈善信托,直接向民政部门报告后即可公告,《慈善信托管理办法》并未明确民政部门清算报告核准权。《北京市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第27条规定,清算报告应经过委托人或监察人认可,并提交原备案机关。委托人实际上是内部监督的重要力量,且在没有设置监察人的情形下,清算报告经过委托人的认可亦是合理之举。但现实中仍然存在委托人和受托人共谋滥用慈善信托财产的风险,因此《信托法》第71条关于“公益事业管理机构核准”清算报告的规定,有其合理性和价值性。未来修法有必要也应明确,未设置信托监察人的慈善信托,应依据《慈善法》第50条的规定适用《信托法》第71条,慈善信托的清算报告由民政部门对清算报告进行审核和认可,由受托人予以公告。

四、慈善信托受益人的权利和保护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慈善(公益)信托,其受益人一般都不承担义务,也没有对受益人的资格作出限制。在慈善信托法理上,受益人是一类不特定的人、构成社会公众的一部分;如果委托人指示(信托目的)选

择受益人是某一类特定的人,则并非为了公共利益,或者说不完全彻底为了公共利益,则不是慈善信托,因此委托人和受益人不存在私益上的关系。^[15]我国《慈善法》并未对慈善信托的受益人资格作出限制,也并未言明受益人是不特定的,但《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第10条明确了“慈善信托的委托人不得指定或者变相指定与委托人或受托人具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受益人”。

《信托法》规定受益人的权利与委托人基本重合,具体包括:知悉信托财产管理处分和收支情况、查阅、复制相关账目和文件;特定情况下有权要求受托人调整管理方法;有权申请法院撤销违反信托目的的处分行为;受益人权益因受托人不当处分遭受损害的,有权要求受托人恢复信托财产的原状或予以赔偿;受托人行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申请法院解任受托人。但是,由于受益人的不特定性,在成为受领人^⑦之前,受益人无法履行监督受托人的权利,也无法对受托人的利益冲突行为作出防范。英美慈善信托倚赖慈善委员会、检察总长来保护受益人,可以受益人的身份提起诉讼。日本则由公权力机关和监察人保护受益人权益,以维护公共利益。我国《慈善法》并未单列受益人权益保护之条款,在现有的立法框架下,受益人权益除了通过外部监管予以保护外,通过委托人、慈善信托监察人的监督以及受托人义务、法律責任的细化和优化配置亦可实现保护。

五、结语

慈善信托这一“舶来品”要发挥其应有的制度功能,其法律制度必须扎根于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具有深厚的“扶贫济困”的传统文化渊源,慈善信托法律制度恰是深耕中国传统文化和新时代中国的制度创新,《慈善法》对慈善信托委托人权力的配置,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也顺应了中国传统文化。当然,现有的制度设计在监察人的设置、受托人义务和法律責任上均存在“监管不足”“惩戒不力”的规则缺位。体系化地完善慈善信托制度,在发挥信托构造灵活和弹性的优势下实现有效的慈善信托主体制度安排,探求因地制宜的慈善信托构造,方能实现慈善信托不同于基金会等慈善组织的制度功能。

注释:

- ① 准公益信托是指不完全符合公益信托成立的要件,未经公益事业管理机构批准,信托目的既有私益也有公益、具备公益性质的信托。
- ② 自我交易即将受托人的固有财产与慈善信托财产进行交易。
- ③ 双方代理即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进行交易。
- ④ 现有已备案的慈善信托中,由信托公司设立的公募型慈善信托约占总数的 18%,委托人多是社会公众或信托公司员工,难以形成合力以监督受托人。
- ⑤ 《慈善法》第 44 条规定:“本法所称慈善信托属于公益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慈善目的,依法将其财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意愿以受托人名义进行管理和处分,开展慈善活动的行为。”慈善信托属于公益信托,因此慈善信托亦可以适用《信托法》“公益信托监察人”之规定。
- ⑥ 《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第 42 条:“受托人应当在 30 日内作出清算报告,向备案的民政部门报告后,由受托人予以公告;慈善信托若设置信托监察人,清算报告应事先经监察人认可。”
- ⑦ 在被慈善信托确定为受益人之后,可以称之为受领人。

参考文献:

- [1] 张永.慈善信托的解释论与立法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63,155,31.
- [2] 吕鑫.从公益信托到慈善信托:跨国移植及其本土建构[J].社会科学战线,2019(10):199-206.
- [3] 慈善信托财产种类与模式实现新突破[N].公益时报,2024-02-06.
- [4] 陈鲁南.也说“慈善”与“公益”[J].中国民政,2016(4):24-25.
- [5] 薛波.元照英美法词典:缩印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16.
- [6] 余嘉勉.慈善信托治理机制法律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10.
- [7] 柳长浩.论我国慈善信托法律制度的变迁逻辑与完善路径[J].齐鲁学刊,2020(6):119-131.
- [8] 阙珂.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解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148.
- [9] 赵云.美国信托法的价值变迁及启示[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15(1):85-91.
- [10] 刘佳.经济法视野下的公益信托及其运行机理[J].经济法学评论,2016(2):128-150.
- [11] 赵廉慧.慈善信托的误解与未来[J].中国慈善家,2016(11):1-4.
- [12] 夏雨.比较法视野下的慈善信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144.
- [13] 孙洁丽.慈善信托监察人法律制度探析[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104-110.
- [14] 闫海.慈善信托监察人:法制发展、法律定位与规范重构[J].学术探索,2018(5):83-90.
- [15] 何宝玉.信托法原理与判例[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320-321.

(责任编辑:黄超)

The Allocation and Construction Dimensions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Charity Trust Subjects

XU Donglin

(School of Law, Minjiang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8)

Abstract: The legal system of the subject of charitable trusts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healthy operation of charitable trusts. China's Trust Law and Charity Law have made principled provisions on the subject system, but their oper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still have certain shortcomings, which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charitable trusts.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allocation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charitable trust subject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ublic welfare (charitable) purpose of charitable trusts. It is essential to refine the rights, obligations, and legal responsibilities of trust subjects, clarify the selection and exit mechanism of supervisors, reconcile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and build a balanced structure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to prevent and resolve the risk of abusing charitable trusts.

Key words: charitable trusts; subject;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数字叙事视域下地方文化国际传播路径

——以闽商文化为例

江盈盈

(福建商学院 外国语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1)

摘要:数字叙事是新时代国际传播的重要路径,不仅能为闽商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有效载体,也能为闽商文化的推广提供新视角。通过梳理闽商文化的国际传播历史与现状,发现当前闽商文化国际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包括:社交媒体国际传播主动性有待增强、数字叙事渠道需进一步扩张、数字叙事内容文化接口亟需优化、数字叙事话语风格交互性不足等。据此提出了以“可能世界”为框架,以“第三空间”为内涵的国际传播数字叙事理念,对闽商文化国际传播进行创新设计与实践探索。从构建互动型多模态闽商文化“可能世界”以及培育基于共同价值的闽商文化国际传播“第三空间”两个维度出发,提供了提升闽商文化国际传播效能的数字叙事路径。

关键词:数字叙事;闽商文化;国际传播;第三空间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4)07-0052-06

2023年,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式上强调“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既是回答时代课题的必然选择,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呼声”,并提出了“三个倡导”,强调“倡导文明互鉴,构建更加平等包容的网络空间”。这为当前地方文化国际传播指明了方向。福建省政府推出了“福”文化概念,并不断强调福建特色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作为“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闽商文化的国际传播对文明互鉴具有重要意义。闽商文化历史悠久,史料丰富,从古至今闽商发散型的对外贸易路线清晰地记录了他们一次次绝地反击的精彩故事,这些故事涵盖了共同价值观,具备共情传播价值。在智媒时代形成系统的闽商文化国际传播叙事体系的过程中,如何扎根于本土化和民族性,构建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生成高传播效能的内容,是数字叙事理念应用于地方文化国际传播领域的重要问题。

收稿日期:2023-11-14

基金项目:2022年度福建省社科基金特别委托省中华文化外译传播专项课题(FJ2022TWY004)。

作者简介:江盈盈(1983-),女,汉族,讲师,主要从事国际传播、口译、英语教育研究。

一、闽商文化国际传播源流与困境

(一)从“他者”建构到“自我”传播

有史以来,闽商文化在国际社会中始终享有一定声誉,但历史上以境外“他者”构建为主。闽商文化的国际传播,南北朝时期便已开启,闽商在世界各地的商业活动以及开放的港口贸易,让世界对于闽商文化从物质到精神都形成具像化认知。13世纪末的《马可·波罗游记》曾将福建描述为商业文化繁荣的自由贸易港口。在书中,福建物产丰富、价格低廉,吸引着欧洲各国商人的目光。闽商果敢、聪慧的正面形象,也伴随其海上贸易行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播至世界各地。^[1]诚然,这些国际传播的结果多从“他者”角度出发,由于时代局限以及西方文化视野的改变,对于闽商文化的国际认知也随之变化,前工业文明时代的西方更多是将自己对财富的渴望投射于福建商业以及闽商形象之上,对其形成了较为积极的印象,而后工业文明时代由于经济文化的差异以及侵略扩张的野心,则使他们将“贫困”“迷信”“无知”“野蛮”等负面印象与闽商文化捆绑。^[1]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国家日益强盛,福建商业在原有基础上迅猛发展,闽商文化在新时代展现了新的形貌及样态,闽商文化的主动自我建构也在“一带一

路”政策引领下渐成气候。近年来,从官方到民间,线上到线下都在陆续发力,在将国际友人“迎进来”,以及让闽商故事“走出去”方面都初见成效。改革开放以来,闽商文化国际传播呈现主动积极的态势,政府、闽商以及相关社会团体为主要传播主体,通过各类会议、商务活动如三年一次的世界闽商大会等,由政府搭桥,将国际人士“请进来”,利用本土优势,最大化闽商文化特点,扩大闽商“国际朋友圈”以及美誉度传播范围。同时,各传播主体亦积极利用全媒体资源“走出去”,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美、澳等地开展各类海外推广活动,增强人文交流与商业合作,利用侨力资源,拓展国际亲和力,并利用国外社交媒体平台构建传播矩阵,搭建国际传播渠道。海峡卫视(亚洲版)落地覆盖 169 个国家地区,2013 年,《中国日报》(*China Daily*) 在福建建立了第一个“福建环球英文网站”(http://fujian.chinadaily.com.cn/),其中设立 Business 专栏对于闽商产业、文化以及项目进行持续报道以及宣传。2023 年 6 月,福建国际传播中心成立,并在海外社交媒体以 Hola Fujian 为主打品牌,围绕福建文化 IP 通过多个账号配合建立多元矩阵,进一步扩大福建文化国际传播效能,其中不乏对于闽商文化的相关宣传。

在当前国际传播的过程中,闽商文化借助地方经济政治的多元平台,以商带传,形成了新时代闽商的国际形象。国际上普遍认为闽商善于利用亲缘、地缘、业缘、血缘、神缘等 5 大体系,形成强大的商业关系网络,将自己所处地域和社会资源进行合理地组合配置^[2],进而实现利益最大化。同时,由于妈祖文化以及海洋文化的深远影响,闽商在贸易活动中多呈现包容、平和、敢于冒险的总体样态,且具有大城市精神(cosmopolitan spirit)^[3]。

(二)地方文化传播困境

当前我国地方文化国际传播多具有浅表化特征^[4]以及单向传播的问题^[5],闽商文化也不例外,此外在国际传播领域中还碰到了一系列特有的挑战。首先,传统与社交媒体是当前国际传播的主要渠道,但闽商文化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效果有较明显的不足。作为闽商文化海外传播主体之一的福建跨国企业在此方面的表现值得关注。如福建的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德时代”),其在《中国百企海外传播力阅读分析报告(2024 年 1 月版)》^[6]中表现优异,海外传播力指数为 12.77,居第 10 位;媒体传播度

指数为 7.26,居第 7 位。表明该集团在国内传播力方面处于前列地位,但其在海外的影响力及美誉度则未能跻身前 20 名。亦暗示在国际舞台上,尽管其国际传播效果显著,却仍需增加更多积极报道以提升其品牌形象,以利于与之相关的敏感或争议性议题的处理。同时,在全球媒体日益关注电动汽车及新能源领域的背景下,作为特斯拉的合作伙伴,宁德时代的海外媒体关注指数高达 6.89,位居第 6 位,但在海外媒体报道数量方面并未进入前十。可见其在国际市场的知名度与实际获取的媒体关注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在社交媒体层面,宁德时代在点赞数、评论量等社交媒体指标方面却均未出现在榜单之上。具体来看,以宁德时代官方 YouTube 账号 @CATL Official 为例,自 2016 年 9 月至 2024 年 3 月 1 日止,视频发布数量 53 条,粉丝数量 6000 余人。期间最受欢迎的视频《CTP3.0 技术发布》虽观看次数高达 4.7 万,点赞数达 556 次,但评论数寥寥。以上指标显示,闽商文化传播主体社交媒体活跃度和影响力尚待增强,撬动海外受众的文化连接接口十分必要。

其次,在国际传播叙事策略方面,虽已有企业与官方组织采取了多元化的叙事方式,且呈现出跨媒体叙事的主要特点,但在提高双向互动方面尚有较大空间。在对福建国际传播中心所运营的 YouTube 频道 Hola Fujian 进行分析时,可见其自 2022 年 5 月创立以来至 2024 年 3 月 1 日止,频道已上传 916 部视频,活跃度较高。该频道主要侧重于展示福建文化相关内容,其中涵盖多个项目,例如展示政和白茶的制作流程以及莆田根雕这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丰富了观众对福建地区文化传统的认知。然而,在整体传播策略中,直接涉及闽商文化的具体商业叙事较为有限。以关键词“Business”与“Entrepreneurship”检索结果及人工筛选后显示相关视频数量为 14 部。以上视频在叙事策略上确实做出了多样化尝试,采用线性、非线性与隐喻等叙事手法,体现了其在叙事方式上的跨媒介优势。然而,在互动性叙事方面,尤其是在评论区的双向交流方面似乎还有进一步增强的空间。在数字媒体日益重视受众参与和反馈的时代,互动性是构建国际传播效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在叙事内容方面闽商文化不乏“好故事”,却面临“说了传不开”的叙事困境,由于相关的情景营造以及场域融合不足,导致受众缺乏引发同情共振的互文环境。

第三,全媒体数字化时代的“去中心化”特征要求构建更为完善的协同传播机制。然而,闽商文化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却面临着传播主体和传播力度的局限。尽管不论民间还是官方传播主体在 Twitter、Facebook、YouTube 和 Tiktok 等国际主流社交媒体平台都具有一定影响力,也已完成部分矩阵搭建,但仍缺乏专门针对闽商文化的标签及讨论区,未形成有影响力的专门账号体系,以持续推广闽商文化。此外,闽商相关的自媒体、组织、学校和企业,还有新一代的侨民群体等民间力量的国际传播潜力尚未充分发掘。从以上闽商文化国际传播情况来看,进一步提升闽商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刻不容缓,及时掌握国际传播话语权,才能使闽商形象获得良性的向外输出。当前我国主流媒体对外传播研究内容已经转向至“借船出海——建构中国特色的对外传播路径”^[7],闽商文化国际传播也应针对自身特点及已有国际形象,形成相应的传播路径。

二、闽商文化国际传播数字叙事的理论观照

数字叙事的研究产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从概念而言,“数字叙事,被理解为使用数字工具和多媒体形式创造、表达、解释和分享故事、文学艺术作品、个人经验等的实践或方法。”^[8]数字叙事推翻了经典叙事学的视角和叙事者的焦点地位,叙事时间也出现了离散叙事的特质,由于其互动性特征,“将叙事结构的非中心化推向极致”^[9]与当前国际传播的主流传播方式不谋而合。

(一)以“可能世界”为框架

调和“叙事性”与“互动性”的矛盾,是数字叙事创作生产过程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数字叙事学家玛丽-劳尔·瑞安(Marie-Laure Ryan)提出了“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作为研究进路,是当前国内外学界获得较多共识的研究理论。^[10]其将可能世界作为数字叙事建构以及体验的直接对象,创作者通过“文本架构”(text structure)提供叙事内容,并设定相应的“互动模式”(interactive mode),通过“再中心化”(recentering)实现可能世界中的模态重组^[11],使叙事接受者成为叙事模式中的出发点,完成虚构世界中的体验。在建构可能世界时,应该遵循“最小偏离原则”(the principle of minimal departure),使可能世界的陈述方式尽可能遵循现实世界的表征。受众在创作者设定的可能

世界中,进行自主选择,形成差异化的沉浸体验。

这一理论也构成了数字叙事研究的底层逻辑,形塑了数字叙事的初始理论框架。在此理论框架下,地方文化国际传播的数字叙事的创设者可以尝试搜集大量有互动潜在性的文化内容,在社交媒体创建“可能世界”,让更多的国际受众成为叙事中的一份子,利用数字叙事的多样化互动模式,产生相应的共鸣或共情体验,从而达到区域文化的有效国际传播。为了提升受众沉浸体验,创设者应该对其中的客体(individuals)实现最大限度的还原,尽量接近现实世界表征,以相应的史实或者数据作为创作依据,使“可能世界”在受众的虚拟体验中完成“再中心化”。随着技术的发展,“可能世界”中的生产性互动以及体验性互动都可以通过多模态的数字人机交互完成,受众可以与搭载 AI 生成式内容 API 的页面助手(如 ChatGPT 等)进行与地方文化要素相关的人机对话,帮助其提升在“可能世界”中的沉浸体验。同时,为了保证地方文化的叙事意义,还可以使用不同文本块之间的链接功能,来实现意义引导,如空间链接、共时链接、背景链接等等。

(二)以“第三空间”为内涵

数字叙事是一种手段,其必须服务于某一目的。当前在国际传播的意识形态沟壑以及战略竞争壁垒面前,构建有利于国际传播效能的闽商文化“可能世界”应是其最终目的,从叙事以及跨文化传播视角而言,就是需要在“可能世界”中创设动态扩张的“第三空间”。20 世纪 90 年代,爱德华·索雅(Edward Soja)提出了叙事上的“第三空间”理论^[12],即第一空间指客观性以及物质性空间,对应数字叙事中的现实世界;第二空间则是全观念性的,强调空间知识的生产主要通过话语建构式的空间再现、精神性的空间活动来完成,对应至“可能世界”中受众的精神世界;第三空间则既包含了生活空间又包含了想象空间,与“可能世界”相互映射,其环境属性在此获得了进一步的阐释。在第三空间中“种族、阶级以及性别问题可以被同时讨论,而没有拜高踩低之行为……在这个空间中人可以……既受学科约束同时又超越学科限制”,这一空间的发展需要加以引导,从而实现某种解放潜能的实践,以此将知识转化为行动,以有尊严的方式改善世界。^[12]

在海外社交媒体传播中,“第三空间”指涉了一种“赛博”地方,其存在于拟态空间之中,是跨文化受众通过技术化身(Avatar)在其中展开交往的产物。^[13]拟

态空间中的地方,生于互联网,媒介化以及中介化特性显著。将之置于跨文化社交平台的语境之下,需要注重场域以及情境的创设,同时还需要注重“混生文化现象”(hybrid culture)的形成。^[14]“第三空间”的动态扩张就是通过跨文化的探索、协商,形成一个两种文化之外的中间地带,“在这里本国语言文化和外国语言文化实现真正的平等和对话,使交际者形成跨文化的复合人格”^[14]。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创设者不拘泥于单一的文化身份,重新建立跨文化身份,重塑多元的文化认同,尊重共同价值,包容不同文化,并通过不同文化的交往,以不同方式进行整合,最终形成全新的文化认同以及完成文化互鉴。

在国际社交平台场域中,地方不再边缘化,而是不断面临不同亚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社交媒体这一类新媒介注重对于人的价值的不断挖掘,体现对于人的尊重。社交媒体中,实现人的自由、敞开与本真是拟态“地方”的最终追寻。^[15]因此数字叙事主体必须在异质文化的交集和接口处,寻找文化传播的出发点,在跨文化传播的边际博弈(boundary game)中,经过不断协商,在共同价值指导下,实现对前述最终追寻的最小偏离,重新定义彼此间的边界线,逐渐扩展为边际区,持续扩大意义共通区域,从而提升彼此间的跨文化理解度。同时也需要培养“第三种”视角,提升跨文化传播意识,对于不同的符号以及回应能够理解其存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可能存在的差异,并且保持开放心态,与另一种文化进行积极沟通,通过在拟态空间的互动交往形成地方感,寻求价值共识。

闽商文化的数字叙事,需要在“可能世界”的框架内,构建以共同价值为核心的有效国际传播为导向的“第三空间”。构建融构真实和想象的“差异性空间”,从而实现最大意义共通的沉浸式体验。

三、闽商文化国际传播数字叙事策略

为了实现闽商文化“可能世界”的最小偏离与再中心化,需要在叙事性以及互动性中寻找相应平衡。在内容挖掘上,也应该以“第三空间”的共通意义空间为衡量,将闽商与不同地域、民族之间的联系纳入叙事体系之中,并通过故事化形式展现其社会价值和人文内涵。

(一)构建互动型多模态闽商文化“可能世界”

1. 多模态叙事模式

从数字叙事模态构建角度说,一方面,闽商文化国际传播创设者可在已有的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国际传播素材上,利用不同的叙事模态增加互动性。在进行闽商文化的相关数字叙事过程中,通过影视音乐、动态图片、角色扮演等形式整合不同模态,实现提升国际传播叙事趣味性的目的。依靠数字社交媒体平台的交互性,鼓励用户通过阅读、留言、交流、分享等行为加入国际传播叙事。增加内嵌链接定向访达闽商文化相关网站,扩大互动类型范围。如在Tiktok国际版中,在闽商历史杰出人物介绍的短视频内容中,可以利用ChatGPT等内容生成技术,根据关键词对受众提问进行回复,缩短叙事内容与国际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及时反馈沉浸效果,同时利用反馈信息自动筛选更能吸引国际受众的相关内容。

另一方面,从数字叙事互动模式来看,还应及时借用最新的互动性传播媒介与技术,拉近与国际受众的距离,提升其参与度以及互动沉浸体验。对于民俗等文化类型,可以充分利用5G时代云端技术的发展,依托数字孪生技术,对于闽商文化线路上的部分信俗仪式重要流程进行全息投影的全球直播。妈祖信俗随着闽商的发展广播世界,每年妈祖诞辰(农历三月廿三),海外的闽商多以各种方式参与妈祖祭奠仪式,这一仪式通常在莆田湄洲进行。若能实现数字孪生技术的全球直播,将能够形成强大的时空以及认知沉浸效果。数字孪生技术还可以对已有的闽商物质文化遗产实体进行复刻,利用已有考古信息,在此基础上进行数字化修复,还原当时的现实图景,实现其与现实世界的最小偏离。对于闽商文化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利用如VR全景互动模式,再现手工技艺,进行沉浸式互动,如对脱胎漆器制作、白茶制作、连城四堡雕版印刷过程等进行国际连线以及现场互动。

2. “可能世界”再现维度

为了达到“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最小偏离,创设者可以对闽商文化相关物质遗产以及非物质遗产进行内外维度还原,凸显地方文化底蕴与特色。入选素材库的内容应该具有数字叙事性,满足数字叙事的8个核心条件:空间维度、时间维度、非习惯性物理事件、心理维度、有目的的行动、导向封闭的因果链、故事世界总被断言的事实、传达的某种意义。^[15]以“海上

丝绸之路”为例,其见证了闽商文化出海历史,是上佳的数字叙事客体来源之一。其中的物质文化遗产包括闽商贸易相关的文物、建筑群以及遗址等,如2012年11月提出的22项“海上丝绸之路之福建史迹”,以及近年增加的漳州圣杯屿的元代海船遗迹、泉州六胜塔、厦门海关、泉州市舶司、福州罗星塔、福州古接官道及码头等闽商相关遗址。同时,在丝绸之路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更易引起国际受众的好奇,从而形成文化接口,如妈祖信仰、永春香工艺、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雕版印刷技艺、明代福建“海商集团”的发展历程、闽茶的传播历程等。另外其中具有较强因果链的闽商人物故事,可以依靠人工通用智能技术(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以下简称“AGI”)如GPTs等创设虚拟人物,加深观众沉浸感。以郑成功之父,郑芝龙的发家史为例。他本是南安小官吏之子,通过海外贸易,成为闽商巨富,利用其经济以及武力优势击溃荷兰东印度公司,并为当时出洋的中国商船提供庇护。这一过程因果链丰富,可以在视频评论区内嵌GPTs以及互动视频,利用明朝海禁的史实创设相应的数字时空环境,帮助受众沉浸代入这一数字叙事场中,并假设自己作为郑芝龙可以做何选择,从而导向不同的结果,形成沉浸互动的效果。

(二)培育基于共同价值的闽商文化国际传播“第三空间”

1. 叙事范式选择

在尽量还原闽商文化真实性基础上,创设者选取的传播内容与传播范式既要体现共同价值,也要兼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格局观念,这是在“可能世界”中创设动态“第三空间”的重要原则。注意遵循国际传播规律,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叙事理念,注重跨文化传播中的不同,尊重彼此的文化差异。叙事文本表达上尽量以口语化、真实化、平民化和本土化的方式进行传播。须谨防国际数字叙事中的结构扭曲,及时调整不同的叙事策略,发展多元协同参与的叙事格局,从不同视角对于闽商文化线路的内涵以及外延,进行主体的多元建构。叙事视角上,不仅仅引入官方立场,也要大力支持“民间立场”,保证对于闽商文化的客观阐释与宣传。实践证明,民间主体如高校学生等,利用探店、闽商名人故居旅行vlog等软性传播方式,有利于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实现拟态地方的最终追寻,实现共情以及认同,从而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在叙事内容中

尽量选择符合人类共同价值的内容,了解国际受众的真实心理诉求,采用平民化的视角进行展示,实现有效真实的跨文化沟通。比如许多闽商故事,如明代闽南第一商人李五的故事,他利用家乡优势,带领里人种蔗榨糖,运往京津浙江,买回当地盛产的棉纱,运回家乡给妇女们纺纱织布,再转运远销海内外诸地,大力发展家乡商业。这是早期晋江商业文化的代表人物,其中的拼搏、奋进、商业智慧等都属于人类共通情感,容易为国际受众所接受。又如历史上闽商通过出海带动了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大量的外籍商人也陆续定居福建各大港口,形成了较为显著的文化交换区,如泉州、福州等地都有类似“蕃坊”等外籍人士居住地,世界多个教派也在宋元时期齐聚泉州,这些在本质上存在共通性的历史都可以助力闽商文化与国际受众之间“第三空间”的动态扩张。

2. 叙事创设者选择

借力国外传统数字平台,开发多语种账号,形成传播矩阵。形成闽商文化线路优质传播内容,通过多个海外社交平台账号进行传播。完善已有国际数字传播平台,利用闽商社交网络实现相关平台账号的转发、互动等关联,提升矩阵传播效果。

重视大众传播渠道的拓展。一方面可以利用国内高校英语专业、商务英语专业等人才资源,进行数字传播内容创作,保证闽商文化国际传播内容中的共同价值阐释。因这方面人才在跨文化传播意识上较强,有利于通过民间传播增强“第三空间”的包容性以及交流性。另一方面,重视“第三文化人”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美国社会学家鲁斯·尤西姆曾经提出“第三文化人”概念,“是指那些成长时期被父母送至另一个文化环境,或是双亲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9]近现代,不少闽商定居海外,成为华侨,改革开放初期在美国、日本等国家,闽籍华侨数量都是最多的。他们通过商业人际交往构成了一张遍布东亚、东南亚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闽籍华侨身在海外,但心系家国,常常带着国外的贸易资源反哺家乡,具有较强的文化传播意愿。同时,福建省还拥有丰富的留学生资源,他们作为“第三文化人”,具有多重视角,更善于选择适合国际受众的相关话题,对于共享价值观更加敏感,更有可能以国际受众较为熟悉以及容易接受度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福建故事以及闽商故事。适当选择国际社交网络中具有影响力的博主,投放相应的闽商文化数

字内容,可以更高效地定位共通的“第三空间”,辐射闽商文化数字叙事的国际传播效能。

综上所述,国际传播的实践是一个话语的战场,数字叙事场域下,不同主体对话语权的争夺战无时无刻不在上演。闽商文化的国际传播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一种尝试和创新,在共同价值引领下,以数字叙事理论为指导,通过国际主流社交媒体,以数字叙事为手段、以“共通意义叙事+个性化互动”相结合,从而完成“可能世界”中跨文化“第三空间”的打造与拓展。同时,在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方法论指导下,应继续搜集能够增强“第三空间”包容性以及交流性的内容,寻找文化共通接口,构建“赛博”地方的良性拟态沟通环境,从而实现文化互促互鉴,增强国际认同。

参考文献:

- [1] 曾筱霞.“西方福建形象”研究:以克洛代尔为中心[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7.
- [2] SANTASOMBAT Y.The Sociology of Chinese Capitalism in Southeast Asia:Challenges and Prospects[M].Singapore:Springer Nature,2019.
- [3] WANG H,WU H & HUMPHREYS P.Chinese merchant group culture,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and cost of debt:Evidence from private listed firms in China [J].Sustainability, 2022,14(5):2630.
- [4] 王素芹,杜佳林.浅析河南旅游文化国际化传播问题[J].新闻爱好者,2021(11):57-60.
- [5] 刘瑛.地方文化国际传播的机制与创新[J].中州学刊,2020(10):168-172.
- [6] 参考智库发布“中国百企海外传播力月度分析报告(24年1月号)[EB/OL].(2024-02-06)[2024-03-01].https://www.sohu.com/a/www.sohu.com/a/756802951_114911.
- [7] 张帆,高根茂.中国主流媒体对外传播研究的迭变与发展:基于CSSCI期刊论文的可视化分析[J].当代传播,2021(5):75-78.
- [8] 付雅明,张永娟,刘炜,等.数字叙事作为数字人文方法:现状与可能[J].图书情报工作,2022,66(14):10-19.
- [9] 胡亚敏.数字时代的叙事学重构[J].社会科学文摘,2022(5):49-51.
- [10] 张新军.数字时代的叙事学:玛丽-劳尔·瑞安叙事理论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
- [11] RYAN M L.Narrative as Virtual Reality 2:Revisiting Immersion and Interactivity in Literature and Electronic Media:Illustrated Edition[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5.
- [12] SOJA E W.Thirdspace: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J].Capital & Class,1998,22(1):137-139.
- [13] 郭峥,张涛甫.媒介与空间视域下的赛博“地方”:兼论B站地方性[J].编辑之友,2023(5):46-51.
- [14] 叶洪,王克非.探索跨文化传播的“第三空间”[J].求索,2016(5):42-46.
- [15] RYAN M L.Narrativity and its modes as culture-transcending analytical categories[C]//Japan Forum.Taylor & Francis Group,2010,21(3):307-323.
- [16] USEEM R H,COTTRELL A B.Adult third culture kids[J].Strangers at home:Essays on the effects of living overseas and coming home to a strange land,1996:22-35.

(责任编辑:魏琛)

A Study on the Path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Narrative: A Case Study of Fujian Business Culture

JIANG Yingy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1)

Abstract: Digital narrative is an important pat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new era, which can not only provide an effective vehicl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Fujian Business culture, but als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cultural promotion online.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status quo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Fujian Business culture, some problems present themselves in the process in the field of number of digital narrative platforms, digital narrative content, and digital narrative discourse style. Therefore, this paper applies a digital narrative concept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with the framework of "Possible Worlds" and "Third space" as its connotation, and conducts innovative design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Fujian Business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entredness" of the "Possible worlds" and the dynamic expansion of the "Third space", the paper explores and proposes effective digital narrative methods 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Fujian Business culture.

Key words: digital narratives; Fujian business cultur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irdspace

融媒体场域下地方传统戏剧的文化遗产

——以粤剧为例

贺雪玲

(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092)

摘要:随着融媒体时代的到来和先进技术的加速发展,地方传统戏剧的文化遗产步入新纪元。以粤剧为个案对象,对融媒体场域下地方传统戏剧的文化遗产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当下,各级政府、传承人、社会大众等多方力量都在积极探索粤剧的现代化传承之路,粤剧与多元媒介的结合也日趋紧密。然而,粤剧的创新传承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如粤剧艺术内容创作专业性与传播力尚显不足,观众参与式审美对粤剧艺术本真构成挑战,粤剧产业化转型引发市场风险等。鉴于此,提出在融媒体场域下构筑“内容—观众—市场”三位一体的粤剧传承路径:一是通过创新作品激发粤剧传承活力;二是提倡扩展观众弥合粤剧传承沟壑;三是强调传播与价值变现赋能粤剧传承现代化。

关键词:粤剧;融媒体;文化遗产;地方传统戏剧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4)07-0058-07

随着数字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媒体指示范围逐渐模糊,表明“融媒体”时代已经到来。“融媒体”一词源自英文的“Media convergence”,最早可追溯到伊契尔·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的著作《自由的科技》中“传播形态融合”这一概念^[1],我国学者将其译为“媒体融合”或“媒介融合”。庄勇明确指出:“融媒体”是一个整合传统媒体和现代媒体,并将两者结合的优势最大化发挥的理念;也是一个整合新旧媒体特点,使其功能、手段、价值得以全面提升的运作模式。^[2]地方戏剧作为现场互动性极强的剧场艺术,有着明显的时空桎梏,加之眼花缭乱的艺术形式持续抢占受众稀缺的注意力资源,“融媒体+地方戏剧”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迫在眉睫。当前,地方戏剧创新与观众“高沉浸式”体验需求也在不断增强,戏剧电影、戏剧综艺节目等新戏剧艺术形态相继出现,不断推动民间戏剧跨界融合,提升其曝光度和创造力。^[3]

粤剧作为广东最大的地方剧种,近年来,其媒介化传承问题已引起学者们的注意。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破圈”的粤剧电影,如《白蛇传·情》进行再媒介化解读^[4],探讨戏剧在创新传承中如何把握“本我”与“超我”的平衡^[5],分析粤剧市场化现状^[6],反思艺术形式的大众化给粤剧音乐团体带来的后果^[7],强调粤方言背后的传统艺术精髓和文化内涵^[8]。由此看来,亟需构筑粤剧跨媒介传承生态系统,推动粤剧艺术的国内传承与国际输出。^[9]本文以“融媒体+粤剧”为例,深入探讨两者融合对粤剧传承产生的巨大作用,力图回应在一个超级传播时代,地方戏剧具备怎样的发展契机,又面临着哪些主要困境?在媒介与地方戏剧渐趋融合的趋势下,如何构建地方传统戏剧的现代化传承之路?

一、融媒体场域下粤剧的文化遗产驱动机制:多边合力与媒介技术赋权

媒体融合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变革方向,还改变了行业、市场、观众之间的关系^[10],融媒体时代加速地方戏剧的革新,对戏剧的现代化传承提出了新的要求。对“融媒体+地方戏剧”的转型探索需要学界和行业共同发力,理论研判要以行业实践应用为基础。当前,政府、传承人、观众等愈发关注粤剧的融媒体转型,积极探索多元媒介、时代技术如何赋权粤剧的现代化传承。

收稿日期:2024-01-1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20YJA86000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2YJC860008);上海市曙光计划(19SG20)。

作者简介:贺雪玲(1998-),女,汉族,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数字文化产业研究。

(一)多方力量推动粤剧的文化遗产

其一,政府支持粤剧传承。近年来,各级政府日渐重视戏剧艺术的现代化传承,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国家层面,国务院办公厅在2015年颁布《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鼓励“通过新媒体普及和宣传戏曲”;且2021年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提出要“适应媒体深度融合趋势,拓展传播渠道”。地方层面,佛山市政府2016年的《关于促进戏曲传承发展的实施意见》指出“通过扫描方式将剧本数字化”;广东省政府也于2017年发布《广东省粤剧保护传承规定》,强调“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应当通过专题专栏等方式普及、宣传、推广粤剧艺术”。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还使用经济手段为粤剧发展提供保障。譬如,作品创作方面,佛山市自2016年起便开展原创文艺作品扶持工作,并对舞台艺术类作品的扶持标准作出明确规定;佛山粤剧院的原创粤剧《哪吒》《将军令》分别在2020年和2021年获得相应的创作扶持资金。可见,利用数字化媒体技术推动地方戏剧传承已成为普遍共识,在国家文化政策和文化规划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其二,传承人与社会大众推进粤剧传承。当代粤剧传承人同样与时俱进地推动粤剧融媒体进程,在人才培养、剧目创新、戏剧传承转型等方面不断探索。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广东粤剧院改变传统的戏剧传播模式,积极转型线上直播,由该院牵头、多方联合策划的“粤韵online”系列线上演唱会,全球在线观看人次累计超过500万,获得业内专家广泛好评。粤剧大师倪惠英也曾变身戏剧网红在酷狗平台发起“非遗大师课”首秀直播,吸引近16万人次在线观看,并与大批年轻观众粉丝进行在线互动、收藏、分享等,进一步增强了粤剧的文化影响力,扩展了粤剧的受众范围。抖音平台则构筑了更广泛的粤剧观众互动生态,已进驻粤剧播主207个,累计直播732场,粤剧相关产品商店21个,约25%(51个)的播主粉丝数量在1万以上,拥有最高粉丝数量(155.9万)的“陈艺鹏(粤曲腔)”将国风歌曲与粤剧、京剧等戏腔进行融合创新的尝试得到观众的广泛支持^①,其中不乏90后、00后年轻观众。由此可见,粤剧专家以及非粤剧行家出身的艺术家播主、观众共同推动着粤剧艺术传承与创新,对弥合传统粤剧与现代年轻观众的艺术话语沟壑具有重要意义。

(二)多元媒介与技术赋能粤剧传承

其一,“媒介+”场域推动粤剧时代传承。数字媒体的兴起,以及融媒体在各行业领域的广泛运用,意味着新的粤剧传承生态构建趋势已不可逆转,相较于粤剧的传统传承模式,多元媒介的融合与其更广泛的潜在用户为粤剧在新时代的弘扬提供了快速生长的土壤。首先,融媒体结合、继承传统大众传媒与新数字媒体的优势,并突破传统媒体中传承主体单向输出内容的局限,创建了观众和戏剧传承人的双向或多向传输模式。抖音粤剧话题综合指数调查显示^②,抖音一年平均4次引发粤剧相关的热点内容讨论,其中2021年7月24日综合指数达到峰值,当天的热点话题分别为“#粤剧#帝女花之香夭#任剑辉白雪仙”等。显而易见,抖音作为短视频平台的后起之秀,能够较高程度地匹配当代观众的新媒体使用能力。其次,融媒体数字技术不仅可以容纳海量粤剧资源,丰富粤剧的艺术表现形态,还能提高信息传输速度,突破信息传播的时空限制,推动其在更广泛的时间和地域范围内进行时效传送。B站相关数据调查显示,“粤剧曾小敏”作为拥有B站粤剧粉丝最多(6.3万)的UP主,该账号二次创作的粤剧版《原神》神女劈观获得约170万点赞,年轻观众群体对改编作品赞不绝口^③。最后,基于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合理利用多个媒体平台中的用户端数据,可以有目的地进行粤剧的创作、输出和产业化,有效弥合断层观众。粤剧院团进而将艺术价值进行资本有效转化,提升剧团运转的资金保障能力和戏剧从业者薪酬水平,推动优质产品不断输出,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

其二,“技术+”场域推进粤剧的文化创新传承。随着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新的文化符号席卷而来,对“技术+粤剧”的传承实践产生重要影响。首先,高清摄像数字化技术在抢救和保存珍贵地方剧种资料中起到关键作用,当前中国已经对一些地方戏剧的文献资料、实物史料、图片资料等实行全面记录与保存。其次,在拓展戏剧舞台边界,弥合观众与粤剧距离,以及提升舞台后期生产力上,数字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数字技术对粤剧舞台的演员、场景布置、道具装配等全方位的革新拓宽了舞台的空间边界,为现场观众带来多感官的沉浸式体验和视觉享受。^④实际上,数字技术搭建起来的戏剧舞台,更关键的功能是其后极高的生产力,搜推算法技术能够精准

定位观众的兴趣喜好,助推粉丝社群与粉丝经济的形成。最后,流媒体技术增强了观众参与粤剧艺术审美的自主权,观众通过倍速模式、拖播模式、“一起看”模式等重构粤剧艺术文本内容,形成自定义文化审美理念,对粤剧的UGC生态作出一定贡献,同时也与粤剧的文化遗产者(PGC主体)之间构建起有效的建设性反馈信息轨道。

二、融媒体场域下粤剧的文化遗产主要困境:艺术本真与技术场景博弈

媒体技术推动了地方戏剧文化遗产方式的转型,“融媒体+地方戏剧”的交融显示出强大的可持续发展生命力。然而,由于地方戏剧的传统性、特色性、小众化等特征,在与现代媒介技术结合应用的过程中面临一定的挑战。粤剧艺术内容创作专业性与传播力不足,粤剧观众参与式审美损耗艺术本真性,粤剧产业化转型引发市场乱象风险等,成为粤剧传承在融媒体时代转型升级时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粤剧文本创作与传播挑战

其一,创作者生态复杂,粤剧内容制作专业性缺乏。在融合媒体时代,创作主体呈现去中心分布特征,每个人都可以自主对粤剧艺术文本进行定义和创作,海量创作者生态推动粤剧内容生产。然而,由于粤剧内容生产者的知识文化水平、道德素养等方面的差异,粤剧内容生产或解构过程难以准确识别和解码,导致粤剧的文化内容创作肤浅,同质化问题严重,娱乐化的审美遮蔽经典粤剧艺术文本的意义和精神内涵,对粤剧的曲解也削弱了经典粤剧的文化权威和生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著名粤剧大师的作品才能获得对经典粤剧的科学解读和传承,无论处于什么时代,粤剧都应根植于群众的生活、习俗、精神和审美意识之中,因而与不断发展变迁的社会环境以及观众的审美密切相关,经典粤剧若拒绝向下与大众审美趋势相融,则容易失去时代创新的活力。

其二,人才供需错配,粤剧融媒体传承转型驱动不足。粤剧融媒体转型要求艺术人才更加专业化和体系化,但由于中国粤剧人才培育与资金保障机制未成体系,地方院校培养方案尚未完善,年轻人的职业选择多样而不愿进入低收入低保障的粤剧行业,致使当前粤剧创作人才十分紧缺。从整体来看,现阶段鲜少

有剧团能够做到“创新编导-专业演出-新视角点评-多元传播-产业化营销”五位一体所需的人才资源配置,粤剧现代化发展人才需求与供给矛盾日益突出。如在戏剧编导人才的培育上,广东粤剧学校作为专业性较强的中职院校,偏向粤剧表演人才的培养,并未专门开设戏剧影视导演专业,编导教学有所忽视,省内仅有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和广东文艺职业学院开设了该专业。由此可见,相较庞大的粤剧编导人才需求,专业院校的年轻人才输出仍旧捉襟见肘,戏剧点评、传播及营销人才也面临类似的瓶颈。

其三,多元媒介形式局限,粤剧文本“传—收”受阻。随着粤剧融媒体实践的深入,融合媒介传承方式的短板也日益凸显。尽管粤剧艺术的融媒体内容生产与传播突破了剧场演绎的时空限制,但也剥夺了观众与戏剧亲密互动的原始审美能力,因而只是在浅层上推动粤剧传承。除时间、剧场和虚拟互动因素以外,可从观众观演的角度将粤剧表演空间进一步细分为表演舞台空间和表演心理空间。^[2]在文本和广播中,观众受到观演舞台空间的限制,粤剧院团向观众“单向灌输式”传输信息,缺少真实或虚拟互动体验。电视与电影看似为观众还原了真实的戏剧与舞台,实则也受到摄像机机位、镜头、蒙太奇剪辑画面拼贴等技术的操纵,由此使观众观演的主体性地位缺失。虽然粤剧的新媒体传承实践正努力通过虚拟互动归还观众的观演主体地位,但在表演空间维度上与电视电影一样存在着相同的媒介技术限制。

(二)粤剧观众参与式审美挑战

其一,自主定制观看模式,屏蔽粤剧的文化精髓。倍速模式、拖播模式等满足了现代观众对粤剧的文化审美体验,但这些模式追求的高效性固化了观者的审美习惯。在社会时间的影响下,观众更少关注粤剧制作的内容质量,而是出于快速完成观看任务的心理,或是娱乐消遣的心态。譬如,近3个小时的经典粤剧电影《帝女花》难以在一个集中的时间段看完,基于社会时间竞争心理,观众往往会使用倍速模式或拖播模式进行观看,难免会错失部分经典场景,减损剧情的人文内涵。此外,粤剧短视频传播形式的普及能够更好地适应观众的流动性和离散性时间,但事实上为了满足当下的娱乐需求,观众在碎片化的粤剧创作中往往忽略了关键情节和精神内涵,导致对粤剧的文化理

解也只是浅层认可,难以建立更深层次的审美与专业知识体系。

其二,个性化内容推荐,陷入粤剧艺术“审美茧房”。搜推算法技术基于观众在媒体平台中遗留的大数据洞悉观众的兴趣、情感、心理等,进而更有效地推荐符合观众审美的粤剧内容创作。但这种持续反复的闭环分发模式是否会进一步阻碍用户的其他审美可能?观众在新媒体平台上留下的观看足迹,展现了对粤剧艺术的审美态度、认知、情感等,并通过搜推技术不断强化对以往粤剧艺术的审美意识。观众在粤剧的文化审美观的固定框架内将不断重复自己的审美体验,使自身陷于“审美茧房”的危机。在“茧房”中进行的审美反馈行为,往往具有直观思维,审美行为也表现出随大流趋势,进一步加剧了粤剧审美观的僵化。

其三,内容解码歧义与异化,淡化粤剧的人文内涵。去中心化的创作生态包括PGC、UGC、PUGC等,催生了大量的粤剧艺术内容。其中,UGC生态占主导,这些粤剧艺术作品除了版权纠纷外,还存在观众对粤剧审美的解码模糊和异化,究其原因受观众知识水平、道德修养、经济利益优先理念等的影响,粤剧艺术文本的人文内涵逐渐被稀释,观众译码者对原粤剧创作精神解读的偏离,进一步加剧整个粤剧艺术生态的审美界定和逻辑的偏航。例如,观众将经典粤剧演员的“鬼畜”视频定义为一种表达情感的社会工具,完全脱离了原作者的审美意志,观者的审美场景和语境也发生了变化,把原粤剧文本的精神涵义转化为具有娱乐性和社交性的审美理念。可见,当粤剧的内容生产、解码偏离粤剧艺术原本的人文内涵时,粤剧的艺术本真也随之消失。

(三)粤剧市场化转型风险

其一,新兴技术反客为主,粤剧艺术本真遭遇挑战。技术为粤剧的文化遗产提供极大的生产与传播动力,但在粤剧的文化生产和传播过程中仍然存在损耗粤剧艺术本真的风险。数字技术对于戏剧舞台的渲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观众对剧场舞台的审美偏向和忠诚度。譬如,3D特效、VR/AR技术等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视觉盛宴,创造了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而一些粤剧的文化内容生产商为了捕捉年轻观众的注意力资源,在不必要的时候选择大量使用特效技术,导致观众的注意力被“廉价”特效所拦截,粤剧艺术逐渐丧失最珍贵的文化底蕴。实际上,传承人和观众对文化

的不自信正是粤剧艺术本真被新兴技术冲击的根源,在探索粤剧现代化传承过程中若丧失戏剧的人文理念,则可能在技术创新和经典保护之间出现失衡,大众就很难从深层情感方面树立和感知粤剧所传播的文化自信元素。

其二,网红经济效应残存,粤剧传承人的流量微乎其微。在数字媒体时代,各行业网红迅速崛起,“网红经济”模式已经成为企业商业模式的重要组成。粤剧内容生产者的多媒体平台账号往往由专业代理团队运营,为迎合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增强粤剧的热点话题吸引力,粤剧艺术文本容易产生过度商业化制造行为。例如,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和流量,某些团体倾向制造无精神营养的“鬼畜”视频,利用经典粤剧元素蹭热点直播。同时,搜推算法技术进一步导致粤剧艺术等非遗文化创作者的“马太效应”^[13],即处于流量优势的内容创作者不断强化和巩固粤剧的艺术审美话语权和平台资源,而传统粤剧传承人因缺乏融媒体传承方式支持被挤压至流量的边缘。

其三,社会效益低于经济效益,粤剧产业化转型遭遇瓶颈。一方面,当前粤剧的融媒体传承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生态系统,粤剧院团鲜少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技术整合粤剧行业资源,也难以对观众的深层次态度、认知和思维进行具体分析,进而对戏剧下一轮传播的内容和方式缺乏目的性,更容易为了眼前的经济效益而忽视长远的社会效益。另一方面,尽管当前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与财政拨款对粤剧进行支持,但仅靠政府的支持没法维持剧团的长久发展,尤其是小型团体,因而他们必须要使自身拥有“经济造血”能力。在此压力下,部分粤剧团体为达到经济效益反而催生某些“机会主义”行为,损害粤剧艺术文化价值,形成恶性竞争的戏剧市场生态圈。另外,当前对地方戏剧产业化的相关政策和市场法律法规仍未完善,缺乏戏剧产业的发展规划,造成大多粤剧团体难以找到合适的市场发展环境。

三、融媒体场域下粤剧的文化遗产革新路径:“内容—观众—市场”三位一体

先进技术的不断革新为融媒体与地方戏剧的融合实践提供了无限可能,在政府、传承人、观众等多方主体推动下,“融媒体+地方戏剧”在行业的成熟运用

已成为传统戏剧在 Web3.0 时代转型的核心目标。当前,融媒体与地方戏剧在内容创新、观众主导、产业化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鉴于此,本文力图以粤剧的文化遗产创新方案作为研究方向,努力探索“内容—观众—市场”三位一体的地方戏剧现代化传承之路。

(一)创新粤剧作品,激发传承活力

第一,推进粤剧剧目革新,平衡专业性和大众化内容生产。首先,发挥粤剧传递主流价值观、推动社会教育、提升文化品位的重要作用。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主流文化,经典剧本历经时代的演变也应融入当代价值观,充分利用和发挥好粤剧名家作为网络意见领袖的引导优势,推动“经典”和“时代”的融合。其次,编导应尽可能深入民间走访,创作出高品位、本土化、大众喜闻乐见的现代化剧目,推进粤剧的“向下”传播。再次,运用媒体技术在戏剧的表演形式上进行创新,突出能抓住观众心智的戏剧精华。传统文化的形式美是当代粤剧电影的核心要义,力图向观众展示传统文化精致的面孔,营造大众与粤剧传统文化之间的亲近感。^[4]最后,加大国家和社会的支持与资本赞助。政府应通过财政支持、税收优惠等手段鼓励并引导社会资本投资,真正关注到粤剧院团等文化企业的需求,促进粤剧与技术领域的交融,深刻贯彻落实国家政策对于地方戏剧的发展要求,制定切实可行的粤剧现代化发展对策。

第二,专业院校和社会机构共同助力,健全粤剧人才培养体系。一方面,专业院校应根据粤剧的特点、人才需求、市场前景等,尽可能地将不同板块的戏剧人才进行专业细分或研读方向细分。完整的粤剧人才队伍应包括编导、表演、点评、传播及营销人才,因此需要制定合理的课时学习比例,并分配专业研究方向的师资团队开展针对性教学,同时,完善多媒体技术教学设备,以新型教育理念和新型发展技术作为支撑,激发学生的互联网媒介思维,提升其软硬件技能。另一方面,面对庞大的粤剧人才缺口,当前粤剧市场不能完全依赖各大戏剧院校的人才输出,当务之急是集合粤剧家协会、粤剧指导专家、民间私伙局的力量培训专业的粤剧人才。首先,通过多方力量建立专门的粤剧培训机构,在粤剧编导、点评、新媒体传播和营销等方面进行全方位人才培养,对学员采取学分制和基本技能考核评价制度,合格后给予粤剧艺术从业资格证书。其次,粤剧培训机构应尽可能利用社会资源扩

大戏剧实践基地,自建“学校+基地”为一体的教学基地,可考虑与当地知名粤剧院团和博物馆进行合作。

(二)扩展粤剧观众,弥合传承沟壑

第一,坚持粤剧观众导向的创作与传承,精准分析观众画像。一方面,充分发挥粤剧艺术生态圈的作用,粤剧传承人或组织与媒体平台在圈内搭建合作共享的戏剧数据聚合平台。在融媒体时代,粤剧团体更要重视与媒体形成合作开放、合作共建、合作共赢的行业关系,把平台资源整合优势充分运用于以观众为导向的粤剧创作和传播中,打破粤剧行业间数据资源相互孤立的状态,建立一个全新的粤剧用户数据资源聚合平台。另一方面,由于人的行为的外显性和多变性并不能准确表现内心深层次的情感和想法,粤剧传承人或组织应深入观众的心理认知、情感态度等数据对其外显行为进行分析,从而真正了解观众内心真实的需求,做到以观众为中心的粤剧内容生产与传承。并且,针对粤剧传统艺术特性和传承模式产生的粤剧观众断层现状,深入探索年轻观众和中老年观众的媒介使用习惯,分析他们对于粤剧传承与发展的认知态度、审美角度和作品偏好,以及学习、工作和生活与粤剧艺术的关联,精神满足的层次和程度,进而有目的地利用大数据捕捉观众的情感,针对匹配度高的媒介渠道有区别地进行推广。

第二,推动粤剧内容的二次创作与传播,打造年轻观众主力军。一方面,粤剧院团可召集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戏迷组成再创作者团队,制作粤剧艺术短视频进行传播,可基于现代视角解读粤剧经典,或是粤剧演员舞台幕后故事,亦或剧中主角的自传式演讲、场景特效等。但也要提防为博取关注和经济利益对经典粤剧进行恶搞,制作低俗、无道德底线的作品,创作者必须注意保留离散化的粤剧文本之间的逻辑关系结构和精神内涵,助力观众界定科学的粤剧艺术审美理念。基于媒介平台上以输出优质内容积攒的大量忠实观众,各院团可充分利用观众资源,通过公众号、微博、粉丝群等多元线上和线下媒介实现二次传播以及粤剧艺术生态圈的扩张。另一方面,观众应以更高逻辑的审美感官约束粤剧娱乐快感,粤剧艺术的审美价值不应是疯狂的“快”与非理性的“娱乐”思维,否则难以品味粤剧的人文精神内涵。换言之,身处趣缘社群的粤剧观众,不能一味地以线性思维对粤剧的文化新形态、新范式进行粗暴地“好”与“坏”评价,只有以更客

观、理性的角度看待粤剧与其他艺术融合的新形式,树立正确的艺术审美价值观、自觉过滤低俗的内容,才能深刻感受和理解粤剧艺术的“本真”,粤剧演员的“本我”和粤剧传播的“本质”,科学准确地解码粤剧。

(三)推动粤剧传播与变现,赋能传承现代化

第一,开发粤剧融媒体传播创新型路径。建造粤剧艺术生态系统,推动粤剧跨界演绎及拓展粤剧线上传播渠道,是实现粤剧融媒体转型的重要路径。首先,可形成以粤剧院团官方网站或某媒体平台为核心,辅以其他综艺电视节目等传统媒体和短视频 APP 等新兴媒体,持续向外输出、推广粤剧内容创作,发挥粤剧传播“1+1>2”的效果。其次,在戏剧内容、剧种、风格及媒介上勇于跨界创新。譬如,在内容跨界层面可将观众喜爱度高的粤方言经典小说、电视剧、电影等改编成粤剧进行演绎,在剧种跨界层面融合其他剧种对经典剧目进行同台演绎,或在风格跨界层面综合舞蹈、粤剧、当代音乐等艺术要素重塑戏剧主人公形象,在媒介跨界层面借助时事热点打造戏剧电影、戏剧综艺节目、戏剧真人秀节目、戏剧网红直播等吸引观众眼球、扩展受众范围。最后,粤剧院团应拓展线上媒体传播方式,开通和完善官方网站,将精彩纷呈的粤剧艺术的数字视听资源、展演讯息、新闻动态、在线反馈渠道等在网站中呈现。同时开通微信公众号、微博、B 站、抖音等具备社交媒体性质的官方账号,在平台中推出优质的粤剧创作内容,组织生动有趣的戏剧活动,加深与观众的交流互动,让观众真正参与到粤剧的创作和传播中来,触达消费者心智。

第二,建立粤剧市场化创新型路径。粤剧产业化的实现离不开优质 IP 和营销渠道。首先,通过融媒体推广思维和 IP 现象级产业链的运作理念,拓展粤剧的文化 IP 长尾效应。构建强势粤剧 IP 要基于大众审美的解读,在视觉上,打造粤剧元素鲜明、简明统一、观众喜闻乐见的 IP 传播符号;在情感上,重视注入粤剧艺术文化承载的情绪价值,精确解读和凝练时代文化,发挥社会教化功能,增强其地域文化身份认同和文化自信。其次,通过有效的产品推广博得消费者注意力。一方面,基于大数据对粤剧消费者媒介使用习惯、兴趣爱好、情感认知等进行精准分析,运用线上和线下渠道营销,协调多元媒介构建粤剧的融媒体营销矩阵。另一方面,在 MCN 和粉丝经济的成熟运作下,实现粤剧创作内容的稳定输出和消费者的有效接收。

各粤剧院团可在微博、B 站、抖音等大粉丝流量平台中输出优质 IP 产品讯息,发挥粤剧网红关键意见领袖的引导作用,制作爆点话题,投放创意广告或争取主流媒体的报道,同时吸引大批具备新媒体运营才能的粉丝志愿者对粤剧 IP 话题或产品进行二次营销,在更大空间和时间范围内造成现象级影响,实现产品商业化的稳定变现。

第三,构建粤剧守正与创新型路径。构建粤剧融媒体传承之路,既要推进“粤剧+技术”融合,也要秉持“粤剧内容为王”理念,坚守人文立场。一方面,发挥数字科技对于粤剧艺术的塑造和传播优势。首先,利用数字化储存技术保存与传播海量粤剧资源,建立地方戏剧资源数据库,为洞悉相关历史背景、流派演变、人物发展等提供研究资料基础。其次,运用数字媒体动画技术进一步丰富粤剧图文、视听资源的呈现方式,让观众能够方便快捷地享受多姿多彩的粤剧艺术资源。最后,运用 3D 等技术为粤剧观众提供沉浸式艺术体验、构造舞台场景、互动交流、教育学习等。另一方面,在融媒体时代戏剧艺术的技术变革中,粤剧的“后戏剧剧场”发展趋势已势不可挡^[5],应一贯坚守戏剧内在的艺术精神。譬如,新编粤剧《户部黎公》获得业界的高度认可,其成功源于主要创作团队熟谙戏曲的美学本质,遵循其传统、发挥其优长,作品呈现的“内在戏剧性”与观众的时代审美理念高度融合。^[6]由此可见,编剧必须坚持粤剧“内容为王”的创作初衷,基于粤剧剧目题材和情节,准确识别戏剧的可应用技术和部位,在粤剧专家指导下“量体裁衣”,让技术真正为凸显粤剧艺术之魂而服务。同时,应发掘科技在粤剧艺术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加强戏剧艺术市场的监管,对某些挑战法律底线,为了炒作和博眼球而制造低俗恶搞话题的不良媒体或商家进行严惩,保证公平、开放、良性的竞争市场。

四、结语

多元媒介和先进技术为地方戏剧的传承带来了诸多机会,媒介与地方戏剧的融合日益密切,同时繁杂的艺术形态也不断冲击着地方传统戏剧的发展。通过粤剧的个案研究,发现当前粤剧作品缺乏创作力、专业性、人才供需错配等问题,应着力提升现代剧目创作力度,平衡粤剧内容生产专业性和大众化审美的

尺度,加大国家和社会支持与资本赞助,重视人才输出效率。在粤剧观众层面,则存在观众参与式审美的挑战,应始终坚持以粤剧观众为导向的创作与传播,提升观众的二次创作和二次传播动力。在粤剧融媒体道路探索初期,融媒体传播方式尚未成熟,粤剧市场化程度偏低,应构造粤剧艺术媒介生态系统,推动粤剧艺术跨界融合以及开拓网络媒体官方平台,并通过打造粤剧的文化IP和拓展粤剧营销渠道构筑粤剧市场化路径,推进“粤剧+技术”融合、坚守粤剧内容为王,把控粤剧守正与创新的尺度。

注释:

- ① 数据源自抖音官方平台,统计时间截至2022年8月31日。
- ② 数据源自抖音官方平台,统计时间为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
- ③ 数据源自B站官网,统计时间截至2022年8月31日。

参考文献:

[1] POOL I D S. Technologies of Freedom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23.

[2] 庄勇. 从“融媒体”中寻求生机的思考与探索[J]. 当代电视, 2009(4): 18-19.

[3] 章晓杰, 丁韬文. 融媒体时代中国戏曲节目的发展理路、创新思路与传播进路[J]. 中国电视, 2021(12): 77-82.

[4] 林茜. 粤剧电影《白蛇传·情》的再媒介化叙事[J]. 电影文学, 2021(24): 121-125.

[5] MO L. On the road of innovative blueprint desig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opera: Take the newly edited Cantonese opera "White Snake Biography and Love" as an example[J]. Academ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2020(6): 142-152.

[6] 马臻邾. 疫情之后的思考: 粤剧城市市场的培育以广州为例[J]. 中国戏剧, 2020(9): 75-78.

[7] CHEUNG A L. The voices of the voiceless: The Cantonese opera music community in Guangzhou, China[J]. Asia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2019(4): 443-453.

[8] XU J L. The language features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Cantonese opera librettos[J]. Frontiers in Art Research, 2021(2): 20-29.

[9] 黄露, 刘俊玲. 文明互鉴视域下粤剧在东南亚的传播论略[J]. 艺术百家, 2019(6): 40-45.

[10] HENRY J. The cultural logic of media convergen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004(1): 33-43.

[11] 王金礼. 文艺晚会: 数字技术媒介化新赋能[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1-05-06(A03).

[12] 曹敬辉. 从剧场到网络: 表演空间重组与表演者身份转换[J]. 文艺争鸣, 2021(10): 170-173.

[13] 袁梦倩. 基于抖音短视频平台的非遗传播: 内容策展、参与文化与赋权[J]. 中国文艺评论, 2021(7): 87-98.

[14] 王一冰. 探索戏曲电影“国潮”文化共同体价值的新路径: 评粤剧电影《白蛇传·情》[J]. 艺术评论, 2021(9): 91-102.

[15] 汉斯·蒂斯·雷曼. 后戏剧剧场[M]. 李亦男,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238.

[16] 于琦. 此中真趣最动人: 论新编粤剧《户部黎公》的内在戏剧性[J]. 艺术评论, 2018(4): 141-144.

(责任编辑: 白琳)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Local Traditional Opera in the Context of Media Convergence: Taking Cantonese Opera as an Example

HE Xuel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Abstract: With the arrival of media convergence era and the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technology, the culture inheritance of local traditional Opera has entered a new era. Taking Cantonese opera as a case study, studying the inheritance culture of local traditional Opera in the context of media convergenc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Currently, various forces at all levels, inheritor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are actively exploring the modern inheritance path of Cantonese opera, and the combination of Cantonese opera and multiple media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los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difficulties in the innovative inheritance of Cantonese opera, such as the professional and communicative deficiencies of Cantonese opera's artistic content creation, the challenge posed to Cantonese opera's art authenticity by participatory aesthetics, and market risks caused by Cantonese opera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 view of this, it is proposed to construct the Trinity cultural heritage path for Cantonese opera in the context of media convergence, namely "content-audience-market". Firstly, innovative works should be created to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Cantonese opera inheritance. Secondly, it is suggested to expand the audience to bridge the gap in Cantonese opera inheritance. Thirdly, it emphasizes that communication and value realization should be emphasized to empower the modernization of Cantonese opera inheritance.

Key words: Cantonese opera; media convergence; cultural inheritance; local traditional opera

苏绣图案元素在现代首饰设计中的形态表现

黄鲁坤, 杨莹

(武夷学院 艺术学院,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要:通过对苏绣独特的艺术语言及表现形式进行分析,以现有苏绣元素产品作为研究对象,以苏绣的发展历史及行业现状为基础,分析各类苏绣产品的文化内涵和风格特征,根据市场上常见苏绣产品的图案、形态、色彩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为现代首饰设计引入苏绣元素提供了充足的创造空间和美学价值。将现代首饰设计与传统苏绣元素中的图案、颜色、布局相融合,使苏绣文化得到蜕变和再生,从而解决苏绣市场受众面小、产品种类单一的问题。通过将苏绣的艺术审美特征融入现代首饰设计之中,不仅能更好地丰富现代首饰的文化艺术内涵,使现代首饰设计与传统苏绣文化的延续相互涵养,还能为苏绣的传承与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提升首饰设计的文化内涵和创作空间。

关键词:苏绣图案元素;形体布局;首饰设计;形态表现;创新应用

中图分类号:J5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4)07-0065-06

苏绣是苏州地域文化与审美理念的结晶,它以清雅恬淡为尚,充满创造力,蕴藏着辉丽的艺术魅力。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苏绣艺术经世代流传形成了自成一派的艺术秉赋,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在传承苏绣艺术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将苏绣元素融入首饰设计之中,使现代首饰设计与传统苏绣文化的延续相互涵养,既为苏绣的发展与传承注入活力,也为现代首饰设计带来更加广阔的创作思路和创新空间,为苏绣图案元素在现代首饰设计中的应用提供些许参考资料。

一、首饰调研分析

(一)首饰历史背景

中国的首饰历史源远流长,凝结了许多独特的文化内涵。中国最早的首饰可以追溯至原始社会,人们

对石头、海贝、兽骨等进行简易的加工处理,作为装饰佩戴于身上,至此,以装饰为目的的首饰开始形成。随着人们审美认识和工艺技术的不断提高,唐代达到首饰发展的一个高峰期,出现了形态各异的金银簪钗、碧玉项链,其神韵和工艺皆精美绝伦,具有富丽堂皇、绚丽夺目的时代特点和造型风格。宋代之后的首饰受唐代文化影响颇深,在其基础上不断创新,寓意、造型、工艺三者并重(图1)。



图1 明代宝石双龙纹金镯

Fig.1 Gold bracelet with double dragon pattern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外来文化不断传入中国,中国首饰行业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渗透与熏陶。机器生产取代了传统的手工制作,审美逐渐走向西化。中国首饰开始从注重寓意、文

收稿日期:2024-01-12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3年度课题(FJJKBK23-065);福建省教育系统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JAS23145);武夷学院教研教改项目(KC20231032SC)。

作者简介:黄鲁坤(1986-),男,汉族,讲师,主要从事产品设计研究。

化、地位等逐渐被装饰、时尚、潮流所替代。首饰行业被打乱重组,中国成为世界首饰的加工基地,以加工外单为主的首饰企业比比皆是。生产的扩大化造成了淡泊品质和品牌的观念,从而导致首饰设计缺乏创意,发展滞后。因此,如何挖掘传统文化基因,并在自身的文化优势上加以创新,将新元素、新理念、新思维注入首饰行业,是现阶段首饰行业应该深思的问题。

(二) 现代首饰设计现状

我国现代首饰设计起步较晚,文化底蕴欠缺,创新思维不够,使得首饰设计大部分都很庸俗,缺少特色,存在着一家设计百家用的现象。因此,无论是首饰的设计理念还是造型都与国外的产品有着明显的差距。随着首饰设计瓶颈的出现,越来越多的设计者开始意识到文化元素的重要性,传统文化元素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但由于文化底蕴的积累不够,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不够灵活,出现了图案直接套用的现象。现阶段设计者要做的是深入理解传统文化元素的内涵,再通过现代设计表现手法和工艺技法将其融入作品设计之中,从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原创作品。

经过市场调研发现,我国首饰设计面临的现状存在以下4个问题:第一,造型大众化。首饰的造型大同小异,设计元素千篇一律,这样的现状使得国内首饰行业难以形成独特的设计语言。第二,文化的缺失。市场调研中可以发现优秀的首饰作品中最为核心理念是文化属性,目前国内市场中大部分首饰设计缺少自身的文化内涵,一味地追求时尚潮流,导致设计平庸,缺乏新鲜感。第三,材质种类的稀少。市面上可见的材质多以黄金、银、铂金为主,稀少的原材料种类导致首饰缺乏亮点,难以吸引消费者的目光。第四,审美的西化。根据首饰市场调研可知,消费者更青睐国外的造型设计,国内的首饰设计借鉴西方的造型居多,消费者在品牌上更倾向选择西方的品牌。

(三) 现代首饰设计发展趋势

现代首饰发展主要呈以下3个趋势:第一,在造型上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在造型设计中更加注重风格表现,从不同的风格上体现多种主题内涵。通过对传统图案的文化内涵再解读与再创造,将传统之美与现代首饰相结合,从而赋予现代首饰设计独特的艺术魅力。第二,在风格上强调艺术化的表现形式。首饰设计

要将艺术性和时代感相结合,做到艺术与生活的统一,实现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对推动首饰设计的进步有一定的意义。第三,新工艺与手工艺并重。现代机械工艺和传统手工技术是首饰设计的核心,两者缺一不可,将手工技法与现代机械技术相结合,使首饰展现出精湛的工艺和完美的造型,既体现了科技的创新和进步,也使手工艺技术得以流传和延续。

二、苏绣图案元素的文化分析

(一) 苏绣图案元素的历史背景

《事物起源》中记载的“断发文身”是刺绣的最早起源。“文”通“纹”,即在身上纹以龙的图纹,以避蛟龙之患,这是苏绣最原始的艺术创作。随后,仲雍不忍后人承受文身之苦,倡导人们将五彩丝线按照发辫结构将纹身图案表现在服饰中,至此刺绣取代了纹身,这便是苏绣的萌芽。唐宋时期,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苏州成为经济文化发展要地,从而也带动了苏绣图案和配色的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封建社会逐渐衰败,吴地艺术文化受到极大的推崇,为苏绣的成熟确立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以山水入绣,形成了苏绣独特的设计语言,苏绣当时被列入“中华四大名绣”,并凭借精细雅洁、风格典雅、色泽鲜明、雅韵与俗趣交相融合的独特风格被誉为四大名绣之首。苏绣的风格特征有别于其他绣种,在图案的选择上更加秀丽,构思更加巧妙,绣工更加细致,用活泼的针法和清雅的色彩展现出独特的刺绣风格,具有典型的苏州地域特色。

(二) 苏绣图案元素的文化艺术价值

苏绣之美,在于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受江南地域文化的滋养,具有浓郁的地方风貌和地缘情趣。苏绣艺术植根于江南的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生态,在江南核心区域生长、发育、成熟,被广为传播。其艺术形态,特别是纹饰图案,不仅受到了江南精神的影响,更折射出自然和社会所保持的“精神联结”。苏绣的图案元素以花鸟图案、林园图案、几何图案等为主,饱含意蕴的图式灵活运用,使苏绣散发出馥郁芬芳的江南韵致,从而体现了苏绣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苏绣之巧,在于造型与图案的奇特结合,或动物与植物组合(图2),或器物与植物搭配,或文字与动物

等共同呈现。这些形象,由民间艺人代代相传,不断修改提炼而成,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他们通过象征性图形抒发对生活的期望,获得精神或情感方面的寄托,使得苏绣图形题材丰富,跃动着节奏与韵律之美,这也使得苏绣艺术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



图2 动物与植物纹样

Fig.2 Animal and plant patterns

(三) 苏绣图案元素的艺术特征

苏绣图案构图工整、结构均衡、纹样生动,对动与静、疏与密、曲与直、点与面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苏绣在线条处理上流畅自然、一气呵成,文化内涵丰富、寓意美好,图案中蕴含着创作者的精深智慧和卓越才能:

第一,花卉图案。苏绣产自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江南地区,所以花卉图案常被苏绣创作者纳入针下,最能体现苏绣精细雅洁的特色。其主要图案种类有梅花、牡丹、月季、菊花、葵花、芙蓉、莲花、虞美人等,这些图案寓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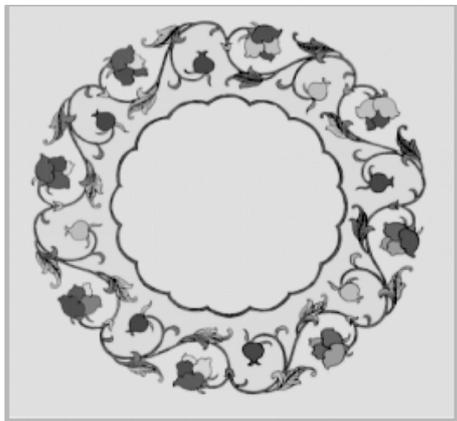


图3 花卉纹样实例

Fig.3 Flower pattern

第二,鸟兽图案。苏绣的鸟兽纹样华丽生动且构图简洁,善用谐音双关的吉祥图案。主要有龙图腾纹样、凤凰纹样、鸳鸯纹样等传统图案,都寓意吉祥;而松鹤表示长寿,百鸟朝凤意为吉祥,鸳鸯戏水则象征幸福美满。

第三,人物图案。苏绣人物图案与其他图案相比所占比例较少,但是这类图案内涵颇丰。主要是寓意美好的民间传说或中国戏曲的角色图案,比如麒麟送子、大孝感天等。

第四,园林图案。苏州园林环境毓秀,受自然环境的熏陶,将亭台楼阁的精致臻丽化作千针万线融入苏绣中,也成为苏绣的一大特色。

第五,文字图案。受文人雅士的影响,这类图案将诗词、画作、题词等以风雅的形式凝结在苏绣中,创造出无数新异、精致的文字样式和富有情趣和韵味的文人画式,迎合了文人墨客的审美情趣和品味。

(四) 苏绣图案形态布局的表达形式

苏绣图案纹样布局形式主要分为3种:

1.“折枝式”布局。折枝式布局简练含蓄、构图巧密,此构图只截取花卉中的一株,以极其精练的形式表达出花卉蕴藏的美。这种布局一般将图案集中在画面的中心,在视觉上能迅速吸引人们的目光。折枝布局构图清新隽雅,画面生动传神。

2.“书画式”布局。宋元以来,苏州聚集了一批文人和士子大夫在此定居,使得苏绣积淀了诗歌题对、品茶论画的文学艺术形式。这种布局以书画式的布局为主,以文人的画作入绣,分为:文字与山水、文字与植物、文字与鸟兽几类,是诗与画相结合的布局。书画式布局的刺绣也体现了江南人文雅士的审美情趣,既体现出布局的形式美感,又表达了文人的情怀。

3.“框景式”布局。框景是用园林中的门、窗或由乔木树冠抱合而成的空间形式作为画框,将苏州的山水风景纳入漏窗之中,使观者看上去犹如在欣赏一幅墙画(图4)。框景是苏州园林的点睛之笔,是苏州的地域符号,每一个窗棂和门框都犹如一个配有特殊花纹的镜框。受苏州园林这种“框景”的影响,在刺绣的布局上采用“框景”布局,所框之景与外缘形成对比,既增强了装饰性,也能在视觉上更容易吸引人的注意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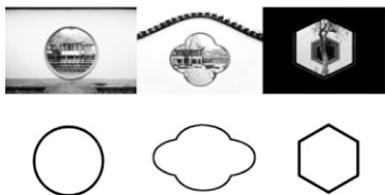


图4 “框景式”布局

Fig.4 “Frame view” layout



图5 梅花形变类型

Fig.5 Plum blossom deformation types

三、苏绣图案元素融入现代首饰设计之中的形态表现

(一)形变、赋寓、临境下的造型创新设计

苏绣图案题材丰富,造型种类繁多,有的简洁精炼、有的繁琐复杂,每一个纹样都独具艺术魅力,这对首饰设计而言是灵感汲取的源泉,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照搬、照抄纹样图案。将苏绣图案应用于首饰设计是一个取其精华的过程,是纹样进行演变、整理、提炼,从而设计出新的首饰造型的过程。

以苏绣梅花元素首饰设计为例:第一,形变。将梅花元素从繁琐的图案中抽离出来,化繁为简(图5)。由于苏绣中梅花元素较为生硬,照搬只会缺乏美感,要对其进行删减和重组。结合苏绣的当地文化,对这些元素进行有规律的排序,使其看起来既保留了原有的形,又增添了苏绣的韵味。第二,赋寓。苏绣图案的呈现形式,一般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图案结合,形成了以形寄寓的创作原则。将梅花元素与石榴元素相结合,不仅丰富了设计形态,也将梅花与石榴的寓意表现淋漓尽致。第三,临境。受苏州园林的影响,苏绣具独特的地域特色。苏州古典园林被称为文人园林,文人雅士在造园时如同吟诗作画般,以自然本真的山水情趣为精神寄托,因此,园林中的景色大多注重清高和风雅,尽显文心和书卷气。设计中因地制宜,通过亭台花窗以艺术表现形式交融于设计之中,借一花一窗之景于创作中,使苏州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与首饰设计相结合,将苏绣的地域特色通过园林花窗的点睛之笔烘托出来,在造型细节中品味文化氛围,在线条构成中凝聚园林风光,使该作品在每一处造型上都和苏绣文化产生共鸣。

(二)“雅而不蔫,艳而不俗”配色搭配

苏绣的图案都崇尚吉祥、平安、富贵的寓意,因此苏绣在配色上大多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喜好用色彩饱和度高且对比强烈的民俗颜色(图6),通过明度、纯度面积的不同,来增加图案的视觉冲击力。由于苏绣地处江南地区,深受文人志士崇雅观念和清丽的江南审美倾向影响,因此降低了色彩的饱和度,用一些浅色系的配色,通过宝石的透明感调和了颜色的纯度,这不仅符合江南柔和的气质,也展示苏绣精丽高雅的地域艺风,体现出“雅而不蔫,艳而不俗”的风格特点。红色和绿色的搭配在苏绣图案里应用得十分广泛,两种颜色强烈的对比,能在视觉上吸引力人们的注意。同样,在首饰中加入蓝宝石,也会取得良好的视觉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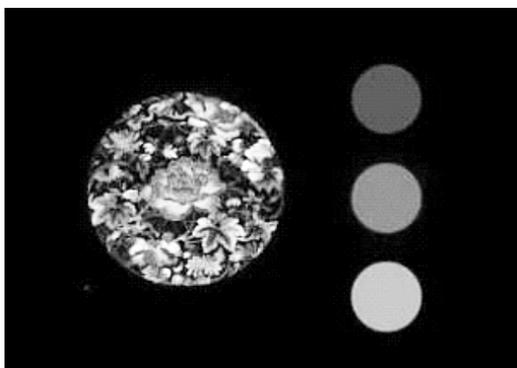


图6 民俗配色

Fig.6 Folk color matching

(三)“折枝式”和“框景式”的图形布局创意

对比是首饰设计布局中不可缺少的创作手法,通过动与静、曲与直的对比如能增强首饰的艺术表现力。采用“折枝式”布局和“框景式”布局的方式设计(图7),在展示苏绣文气的同时将文化的内涵含蓄地融入设计中。截取梅花灵动的一面,以极其简练的设计语言传递梅花的曲线之美,在布局中融入框景式结构,将梅花元素置入框景中心在视觉上形成收束作用,给人以良好的视觉艺术观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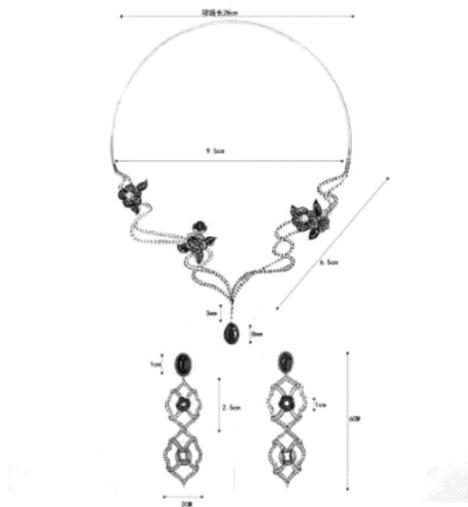


图7 “框景式”布局设计首饰实例

Fig.7 Jewelry layout design in a "frame view" style

四、苏绣图案元素下的现代首饰创新点

1.形态创新:将苏绣图案中梅花元素进行提取与再造,并非是对原有纹样的直接表现。以象征性图形传达文化内涵,通过隐喻、谐音等表现手法,巧妙地将具象纹样形态转化为吉祥的艺术形象,既能获得精神或情感方面的效果,也能体现首饰形态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将苏绣纹样中的梅花、石榴图案进行变化重组,再进行实际运用,以梅花图案为主体,以石榴图案为衬托,能突破传统图案刻板保守的形象,赋予首饰设计传统意蕴和创新表现融合表现的风格。

2.造型创新:苏绣图案在造型上直接取形于生活中常见的植物、器物等,以生动、有趣、吉祥为创作意旨,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受苏州园林的影响,苏绣的造型布局采用了园林框景的形式,将苏绣中的园林框景布局形式融入首饰造型设计中,所框之景与外缘形成对比,凸显了装饰性和主体性。由内而外地表达苏绣独特的美,画面更加活跃,造型更加丰富,给人视觉上的双重审美享受。

3.色彩创新:苏绣对色彩的运用,既有规定更有对感情和生活的吟唱。因调和色彩手法各异,加之纹样的简繁疏密不同,往往会产生或雅洁或华美的不同艺术效果。苏绣图案中常见的民俗配色,以对比色为主,兼具浓、艳的色彩特点,体现了苏绣艺术的大俗大雅,

将之运用到金属首饰色彩搭配上,能营造出一种既有秩序又灵动欢快的色彩效应(图8)。



图8 苏绣图案元素首饰设计运用实例

Fig.8 Application of Suzhou embroidery pattern elements in jewelry design

五、结语

通过对苏绣纹样、色彩、造型的分析研究,可以发现苏绣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水平。在苏绣作品辉煌而又曲折的发展历程中,展现出它自然纯朴和色彩鲜明的风格特点。苏绣作品对吉祥寓意图案题材的选用,不仅包涵了中国传统图案元素的主要内容,又有浓郁的苏州地域特色。苏绣图案元素首饰设计吸收苏绣图案配色以及布局的形式,将苏绣纹样元素进行提炼并融入作品之中,不仅有助于苏绣文化的发扬,使苏绣文化得到蜕变和再生,而且也丰富了现代首饰的文化艺术内涵,为苏绣元素在现代首饰设计中的应用提供了创作灵感和参考思路。

参考文献:

- [1] 加佳.近代民间服装装饰品中的苏绣技艺研究[D].无锡:江南大学,2014.
- [2] 陈国玲.论传统银饰和现代银饰的融合发展[D].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0.
- [3] 韩雪,袁丽伟,刘海艳.框景于现代园林之新用[J].安徽农业科学,2010:13-15.
- [4] 洪锡徐,洪苏.苏绣艺术[M].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6.
- [5] 李明.苏绣[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 [6] 吴聪.江南民间荷包的艺术与功能解析[J].装饰,2013 (5):118-119.
- [7] 孙明,赵璐,张阳.基于图形语言的创新设计[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
- [8] 白一宏.首饰设计符号性之初探网[D].北京:北京服装学院, 2011:12.
- (责任编辑:白琳)

Research on the Modern Jewelry Design Based on Suzhou Embroidery Elements

HUANG Lukun, YANG Ying

(School of Art,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It has rich culture connotation, with remarkable artistic value and social meaning. Based on 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modern jewelry design, this article combines modern jewelry design with pattern, color and layout of traditional Suzhou embroidery elements, allows the Suzhou embroidery culture to reborn and evolve, which also enriched the culture art connotation of modern jewelry. Meanwhile, this article brings wide creative space for modern jewelry design, and provides several refere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Suzhou embroidery elements in modern jewelry design.

Key words: Suzhou embroidery pattern; shape layout; jewelry design; shape expression; innovative application

数字戏曲界面适老化包容性设计

陈雷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 福建 福州 350202)

摘要:包容性设计理念与数字戏曲界面设计相结合,为老龄人的数字化产品提供可借鉴的设计路径。针对数字媒体时代的特点,分析了老年群体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并据此提出了适用于数字文娱产品的界面包容性设计原则,以神州戏曲网为例展开了适老化设计。在包容性设计中通过深入访谈,收集了25份用户访谈数据,再将其转换为数字戏曲界面设计需求,通过对设计完成后的操作体验和情感体验进行全面评估,设计达到了提升用户体验的效果。包容性设计理念在提升老年群体使用数字媒体产品的用户体验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连接传统文化与数字媒体的桥梁,更好地满足了老年群体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

关键词:数字媒体;数字戏曲;界面设计;包容性设计;适老化

中图分类号:D699.6;TP3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4)07-0071-07

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年轻群体在互联网上进行沟通交流,享受精神文化生活。但老年群体在参与数字活动过程中容易遇到挫折,从而产生较差的用户体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3年人口统计数据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2.9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1.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17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5.4%。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提出要打破老年人的“数字鸿沟”,必须解决智能化产品和服务应用的难题。当前多数信息界面和新媒体艺术都立足于年轻群体,相关设计准则未考虑到老年群体生理和心理特征。本研究通过老人数字媒体生活环境、任务和行为特征等包容性的分析,制定更加具有针对性、灵活性、个性化以及多样性的适老化产品设计策略,提升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的质量。

收稿日期:2024-04-02

基金项目:2024年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FJ2024C132);
2022年福州外语外贸学院校级科研项目
(FWX21012)。

作者简介:陈雷(1996-),女,汉族,助教,主要从事数字媒体艺术、人机交互设计研究。

一、包容性设计的设计理念

(一)包容性设计概念

英国标准协会为包容性设计下的定义为:一种设计理念,旨在满足大众的需求,使更多人可以直接使用,无需额外的学习或调整。^[1]它来源于数字产品设计,是对通用设计的进一步发展。在设计中,强调将潜在用户的差异性映入到设计流程中,尊重人在生理的、社会环境等多维度的差异,并在设计中尽可能地去包容这些差异,为更多的人做设计。以包容性理念为基础的老年产品设计,应从老年人的使用感受,认知与行动的不同,提升感觉、信息和行动的易用性。^[2]通过对弱势群体的包容性设计,建造一个平等的不受年龄、性别、能力等因素制约的设计环境。^[3]包容性设计的目标用户范围为最大程度协调独立可协商的普通人群,这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设计理念,需要不断迭代。在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时,包容性设计由于其非极端的设计方式和动态发展的特性,具有更好的可行性。^[4]

(二)数字媒体时代的包容性设计特征

在跨学科的发展背景下,数字媒体视阈下的理论

和应用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建设适老化社会,不仅需要满足老年群体的生活保障及物质需求,同时也要提高老年群体精神文化建设和数字化时代的需求,如表 1。针对我国老年网络健康服务的实践,应注意关注老年个体差异化需求、优化服务模式与平台质量,并提倡同伴关怀以发展老年健康互助模式。探究老年群体认知特点,为后续适老化设计提供设计准则。

表 1 包容性的类别及内容

Tab.1 Categories and content of inclusivity

类别	内容
多样性和灵活性	包容性设计注重提供多样化的界面和功能选项,认识用户群体的多样性,划理想人群范围并在设计过程中和结果中考虑用户的无意识行为,以适应不同用户的需求和能力水平。这包括提供可定制的设置、多种操作方式和内容呈现形式等,以确保老年人和其他特殊群体能够方便地使用数字媒体。设计可以让不同人以不同方式参与的方法,并确保每个人都感到归属,然后逐渐理解、包容、认同彼此的差异。
易用性和可访问性	采用简洁清晰的界面设计、明确的标识和指示、以及易于访问的内容布局等,以提高老年人和其他用户群体的可接受性和使用体验。
反馈和辅助功能	包容性设计考虑到用户可能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障碍,因此在数字媒体中提供了丰富的反馈机制和辅助功能。这包括提供实时反馈、错误提示、语音导航、放大镜功能等,以帮助老年人和其他有特殊需求的用户更轻松地使用数字媒体。

(三) 包容性设计老年人产品的相关研究

包容性设计出于社会公平性的视角,照顾到那些经历数字边缘化(Digital Design Marginalization)的特殊群体^[4-5],深刻地影响了为老年人做设计的理念,促使设计师开始从用户需求、可用性和情感体验等多层面支持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美国 Paciello 集团(The Paciello Group, TPG)总结了偏向界面设计的包容性 7 个原则:可比体验、考虑情境、保持一致、给予控制、提供选择、优先内容和增添价值。^[6]以数字为主的微软公司归纳为精炼的 3 个方面:识别排斥,从多样性中学习,解决其一、扩及其余。^[7]

国外学者针对数字媒体对老年人生活的影响进行了一定研究。布鲁斯(Blusi)等证明了网络社区的户外、音乐、访友和休闲活动都能显著提高老年人社会

活动参与感。^[8]瓦哈色(Quan-Haase)等提出维持现有社交关系是老年人融入数字媒体生活的主要动机。^[9]

国内学者注重于包容性的适老化设计。刘婵君等侧重于探讨老年人借助网络参与社会事务后所获得的成就感,但与老年人强烈参与意愿形成对比,目前专门针对老年人的网络志愿服务平台非常缺乏。^[10]尹丽仙依据本特松的“用户金字塔模型”进行比较,发现相对于无障碍设计和通用设计,包容性设计避免了特殊化和乌托邦式设计的两个极端。^[12]郜红合等用包容性理念和 AHP 层次分析法为老年及用餐障碍人士解决自理问题提供了思路和参考。^[11]刘晓娟等从培训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探究欧洲老年人数字素养教育实践特点,有助于推进数字素养教育进程及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水平。^[12]林璐等从情境视角下分析智能家居的设计形态,是提升适老化家庭健康产品“智能”的关键,为老年人智能家居提供新的设计路径,从而让老年人享受到更加自然、舒适的家庭生活。^[13]曹俊杰对家用制氧机界面设计中的认知负荷度量方法对认知负荷在老年用户产品界面的优化设计提供了创新路径。^[14]白肿航等提出基于包容性的服务接触点改进原则、适老化服务痛点类型、适老化服务设计流程和针对服务流程的包容性评估方法。^[3]

通过文献梳理可看出,国内外众多学者对数字文化产品的适老化服务展开了相关研究,但缺少包容性设计实践落地与评估结果。因此本文以文娱产品的数字适老化展开可行性分析,探讨老年人数字包容服务的有益实践探索,最后提出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建设和数字化时代需求的提升路径。

二、数字文娱产品的包容性设计

(一) 传统文娱产品载体与数字服务的配合

传统文娱产品的载体与数字服务的融合是当前文化娱乐产业的一个重要趋势。数字媒体艺术具有强烈表现力,且带着着综合性和多媒体的特点。数字媒体的表现形式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媒体数字化结构转化,通常主要是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另一种是新兴的数字媒体艺术风格,这种艺术风格一般同时具有数字化、网络化与交互特征。多样性的表现形

式体现了数字媒体艺术的跨界融合性和包容性。随着数字科技的发展,传统文娱形式如戏曲、曲艺等正逐渐与数字服务相结合,为用户提供更丰富、便捷的文化娱乐体验。例如,戏曲表演可以通过网络直播或在线点播的方式传播,不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同时,数字服务还可以为传统文娱产品提供更多的衍生内容,如在线学习课程、互动社区等,丰富了用户的体验和参与方式。传统文娱产品与数字服务的配合,不仅有助于传承和推广传统文化,还能满足用户多样化的需求,促进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

同时,数字媒体艺术是跟随着数字技术从传统艺术中发展而来的,并且这一发展还在延续中。数字媒体艺术在本身的品质和表现形态上与传统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对于数字媒体中文化产品的包容性设计,在形态呈现方面解决新的互联网产品不能够满足老年人的使用需求问题,在文化内容上与年轻的主流内容的差别进行讨论。在内容方面对于老年人与社会社交关系的讨论,对新事物接受程度、文化认知深浅度也有着较大的帮助。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专门为老年人设计数字化的文娱产品是必需的。

(二)数字文娱产品平台的适老化构建路径

在设计老年网络健康服务模式时,需综合考虑记忆力、健康状况、知识水平、技能水平等因素,归纳不同类别老年用户的个性化特征,以提供符合其需求的信息服务模式。因此,设计老年文化产品需要创新,提升用户体验,同时满足老年人差异化需求和数字技能和媒体使用差异。要关注老年人差异化需求,加强网络信息的包容性设计。

问题识别:通过观察、问卷和深度访谈等调研方法,识别老年用户体验中存在的问题。

问题解决:设计人员根据包容性特征对问题进行分类,并优化处理关键性问题。

概念验证:通过功能和情感维度的包容性评估,邀请老年用户和专家对里克特量表进行评分,以改进设计并确保满足老年用户的需求。

包容性设计的核心是将用户能力、用户心理、用户体验作为基础支撑的用户为中心的设计(UCD)^[15]。在经典的包容性设计研究体系里,视力、听力、认知能力、沟通能力、灵活度、伸展触达能力、移动能力这7

方面会经常被纳入考虑。包容性设计的设计流程更加照顾老年人视力下降、认知力下降、手指操作灵活度下降的状况可以将老年人使用大部分手机界面时遭遇的痛点变为设计机会,提高老年人使用智能互联网产品的自主性。通过此设计流程,将包容性设计转化为适老化数字文娱产品的设计思路,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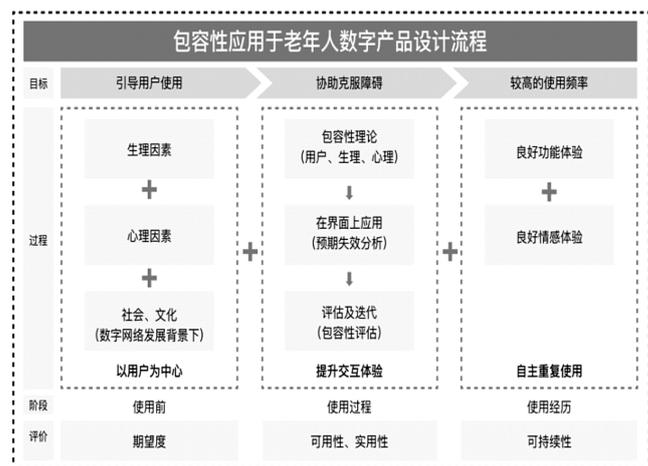


图1 包容性理论适老化人机交互方面的设计流程

Fig.1 Design process for age-friendly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三)老年人文化产品的选取与转化

居家养老娱乐是提升老年人精神文化的重要部分,但目前市场中,极少有开发针对老年人文化产品的。在现代社会,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家庭结构的变化,老年人独自生活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因此,居家养老娱乐、学习对于老年人精神文化的提升就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帮助老年人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提高生活质量以及缓解孤独感。老年人的文化产业的潜力巨大。传统戏曲在这个数字化时代显得稍显落后,依然坚持欣赏传统戏曲的大多都是比较年长的观众,选择传统曲艺作为老年人文化产品的选取和转化平台。

当前数字媒体艺术发展势头猛烈,已成为主流艺术之一,使得传统艺术形式发生改变。在文化创新方面,老年人群体的喜好与传统文化相关,借此机会可以结合新技术传播传统文化。通过网络信息化和数字化的手段促进传统文化的发展创新,促进戏曲文化的传承和普及,使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和欣赏这一传统艺术形式。同时,可以通过适老化设计,将新信息和新文化等向老年人普及,减少老年人对于数字时代的陌生感,满足进步与自尊需求,对老年人社交活动和社会

心理的研究有一定的意义。老龄化群体的智能养老也将成为时代新热点,利用新兴服务为老年人带来便利化、智能化、多元化。设计能丰富老年人生活的产品,能畅通无阻地使用互联网去学习、娱乐,以满足老年人对传统文化的需求,并提升其文化娱乐体验。

三、以神州戏曲网为例的文娱类产品设计实践

神州戏曲网作为专注于戏曲艺术的在线平台,拥有丰富的戏曲资源,包括各种经典剧目、名家演出等。对老年人来说,通过观看戏曲不仅可以愉悦身心,还可以增进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识。神州戏曲网可提供社交互动功能,老年人可以在平台上与其他戏曲爱好者交流和分享心得,促进社交活动,减轻孤独感。平台可根据老年人的喜好和观看记录,提供个性化的推荐服务,推荐符合其口味的戏曲表演,增强用户体验。对老年人来说,戏曲是一种传统文化形式,可以提供老年人喜爱的内容,能够唤起他们的回忆和情感,因此选择这样一个资源丰富的平台。

(一)用户访谈分析

在数字媒体背景下的文化产品设计中,必须认识到老年群体的差异性。研究表明,老年人在生理上经历着感觉、认知和行动能力的衰退。本研究采用了结构化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与 25 位老年人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同时在他们操作的过程中采用出声思考法和观察法,以了解他们的真实需求,如表 2。

表 2 访谈内容及归纳

页面层级	访谈内容	归纳概括
交互流程	“在原网页中发现同模块内容在展开菜单下方...” “位置较为隐蔽...” “点进去又是重复的内容...”	操作难度大、导航和反馈不友好。
界面设计	“文字太多很难找到黄梅戏...” “所有信息都在一起...” “内容很复杂,其实每次只用两个功能...”	信息呈现不清晰,区分度不够,内容不匹配。
用户体验	“经常点错了,有点怕又要重新来...” “反复确认怎么操作...” “在点击时候很犹豫...”	缺乏一定指引信息,信息反馈不足。对智能产品产生畏难、烦躁情绪。

针对这些问题,需要优化平台操作流程模式,改善信息接受过程与效果。考虑到老年群体的特殊需求,界面与系统必须经过包容性设计与测试,确保易用性、功能明确性、使用流程简单化和信息传达途径简短化等方面的改良。

(二)基于包容性设计的文娱产品界面设计流程

对人机交互界面设计的改进使系统更简单易用,老年人使用该界面的成功情节为:查看相关戏曲及新闻内容,进入下一级页面进入内容,最终获得图文和相关资料,如表 3。

表 3 包容性设计优化点

页面层级	设计内容
范围层	查看相关戏曲及新闻内容,进入下一级页面进入内容,最终获得图文和相关资料。
结构层	合理的设计交互方式,区分界面层级与模块分布,缩短交互路径。进行信息逻辑分析,以呈现逻辑关系,协助用户理解、记忆和处理信息。
框架层	对信息进行分类,明确主要次要关系,将有用的信息置于显眼位置,避免不必要的信息。查看相关戏曲及新闻内容,进入下一级页面进入内容,最终获得图文和相关资料,如图 2。
表现层	为了辅助老年用户认理解解界面功能的含义,提高操作效率和使用体验,通过图标、符号等对戏曲文化等界面信息进行优化设计,同时对信息内容与图标对应匹配,见图 3。

在交互设计中将其重新规整为上方位置导航栏和左侧内容导航栏,如图 2。将图片信息作为页面重点,文字热点信息展开作为可以点击内容。用户可以根据位置导航栏判断自己所处的页面位置,也可以根据左侧导航栏找到清晰的内容。在移动端设计时保持和网页版一致的设计原则,底部导航栏分为 3 个部分“首页”“戏曲专题”“我的”。在首页中划分为大图展示部分、功能区域划分和最新资讯部分。由于移动端的位置和距离都偏小,将内容部分归纳为图标和戏曲专题。图标中依据网页端的内容专题划分模块,方便老年人群找到内容。简化网页版较为复杂的界面,将内容和专题部分明显区分开。通过新的功能区域划分和交互流程的划分,用户获得更清晰的页面内容和更简单的操作流程。

(三)文化产品适老化的界面展示

在交互流程图设计的基础上细化,通过相关风格元素的确定来完善界面,如图 3。



图 2 移动版交互流程(首页界面、梨园漫话专题、戏曲专题)

Fig.2 Mobile interaction flow



图 3 移动版设计效果(首页界面、梨园漫话专题、戏曲专题)

Fig.3 Mobile design effects

1.针对页面可用性的问题,提升文字符号识别的度。文字部分选择辨识度高的字体,使用适当的字体大小、字间距和行距。当设计需要着重阅读和辨认的部分时,可以适度增加文字的可视强度。确保文字与背景具有足够的对比度,因为过于复杂的背景会使前景的文字难以辨认。可以通过增加背景图上的半透明蒙版等方式来加强两者之间的对比。

2.合理运用颜色,针对色彩感知度方面的问题。在颜色选择上,主色调选择较为沉稳明亮的颜色,符合传统文化产品的设计风格。在细节图标处选择不同的饱和度较高的颜色,方便视觉感知能力较弱的老年群体辨认。避免只使用颜色这一种单一信号作为识别方式,应在图标和色彩上标示明显的区分,加上辅助纹理等识别信号避免用户分不清。在移动设备上,老年用户需要比其他用户更强烈的色彩对比。过于相近的颜色容易导致老年人感知混淆,应在色彩上增强对比度,采用较高明度的颜色。

3.针对有效视野内的问题,将相关内容集中布局。使用图文元素将戏曲专题区分开,避免老年人在点击过程中误触。在设计结构上,基于老年人认知减弱的事实,尽量在页面布局重点位置集中布局。

4.使用合适的图标,针对操作效率的问题。图标元素应该与语义进行合理的匹配,能够通过元素唤起功能意义,让用户形成意义体验。用户对图标的操作,能够有效、迅速的搜索到图标、完成任务。在设计图标时应通过对图标突显的外在物理特征和图标语义的记忆,快速掌握图标所表达的信息。同时图标应有相同的直观风格,增强系统的通用性,同时使得界面合理美观。

(四)包容性评估

在界面设计后对界面进行包容性评估,选择10名老年人和10名设计从业人员进行评价。对寻找信息目标,完成交互操作等5个任务进行测试。被试人员对界面进行操作,对包容性问卷进行打分。最后记录人员给出的意见和使用感受,计算评估分值,如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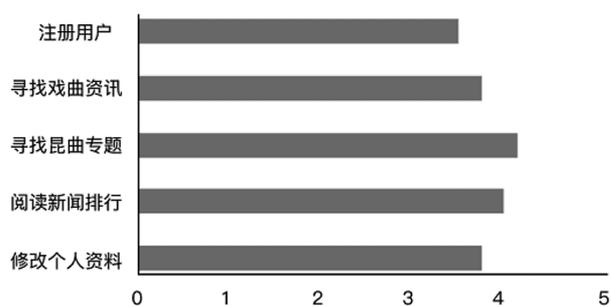


图4 包容性评估得分

Fig.4 Inclusivity assessment score

经过问卷及访谈得分结果,整体的界面操作良好。交互流程简化,视觉效果较为明显,问卷的分值在3-4分之间,说明操作基本满足老年人对于文化产品设计的要求。但在专业设计人员的评价下,还存在一些信息混杂、过多等评价。可在原型设计上进行调整后再对视觉效果进行设计。通过评估发现,用户体验较为良好,但在包容性上还存在改进的空间。在后续的设计上,还需对交互流程与视觉重点设计优化。

四、结论

在数字媒体发展下,互联网产品的适老化成为了急需研究的热点话题。本文通过文献分析法对现有的包容性理论和资料进行归纳,明确用户群体需求,对相关生理与心理需要提出了符合老年群体需求的设计策略和原则。在实践层面上,运用包容性设计的指导原则对传统文化戏曲网重新梳理,对现有文化产品进行创新设计。结合数字媒体艺术的新技术,推动文化产品的发展,使文化产品更加人性化,满足老龄人群的用户需求,提升老年群体的使用体验。通过对老年用户数字媒体接触的整体现状与技术应用的总结,为中国老年网络信息服务体系的完善提供数字媒体方向策略参考,在未来数字媒体中文化产品的发展带来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 [1] KEATES S.BS7000 -6:2005 Design management systems. Managing inclusive design.Guide[J].2005.
- [2] 尹丽仙,吴凤林.针对老年用户的包容性设计研究[J].包装工程,2015,36(14):128-131,140.

- [3] 白仲航,胡欣,李雄飞,等.基于包容性的适老化服务设计研究[J].包装工程,2023,44(2):9.
- [4] NEWELL A.Older people as a focus for inclusive design[J]. Gerontechnology,2006,4(4):190-199.
- [5] ZHANG W,LI Y,JEUNG J.How to Beautify the Elderly:A Study on the Facial Preference of Senior Citizens [C].HCII Proceedings:Part III.Springer-Verlag,2020,19:24.
- [6] The Paciello Group.Inclusive Design Principles[EB/OL].(2018-04-03)[2022-03-15].http://inclusivedesignprinciples.org.
- [7] 黎昉,董华.通用设计与包容性设计原则的发展和挑战[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8(5):71-78,210.
- [8] BLUSI M,NILSSON I,LINDGREN H,et al.Older adults co-creating meaningful individualized social activities online for healthy ageing[J].Studies in Health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cs,2018(247):775-779.
- [9] QUAN-HAASE A,GY M,WELLMAN B,et al.Connected seniors:How older adults in East York exchange social support online and off-line[J].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7,20(7):967-983.
- [10] 刘婵君,贾晓萌,林泳淇.国外老年用户网络健康信息使用行为研究:理论基础、影响因素与未来启示[J].情报杂志, 2021,40(6):178-186.
- [11] 郜红合,赵谦,吕家梁.基于包容性设计的老年群体餐盘设计[J].包装工程,2022,43(12):297-305.
- [12] 刘晓娟,谢瑞婷.欧洲老年人数字素养项目的实践经验与启示[J].图书情报知识,2023,40(2):117-130.
- [13] 林璐,孙文希.情境视角下适老化智能家庭健康产品设计策略探析[J].设计,2023,8(4):10.
- [14] 曹俊杰,张凯.基于认知负荷的老年人家用制氧机界面设计度量与优化[J].设计,2024,9(1):131-145.
- [15] 胡新明,徐伶俐,王剑,等.包容性设计视域下学龄前视障儿童玩教具设计研究[J].包装工程,2020,41(20):139-144.

(责任编辑:白琳)

Age-Friendly and Inclusive Design of Digital Chinese Opera Art Interface

CHEN Lei

(Department of Art and Design, Fuzhou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Trade, Fuzhou, Fujian 350202)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inclusive design principles with digital folk art interface design provides a design path that can be referenced for digital products targeting the elderly. Conside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gital media er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proposes interface inclusive design principles applicable to digital entertainment products. Taking Shenzhou Opera Network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elaborates on age-friendly design. Inclusive design involves in-depth interviews, collecting 25 user interview data, which are then transformed into requirements for digital folk art interface design. Subsequently,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operational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s after design completion was conducted to enhance user experience. The inclusive design concept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enhancing the user experience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using digital media products. It serves as a bridge connec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digital media, better meeting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needs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Key words: digital media; digital Chinese opera; interface design; inclusive design; age-friendliness

高校思政课讲好中国故事探究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为例

张云霞, 卢艳兰

(南昌航空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南昌 330063)

摘要:中国故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生动的教学素材,讲好中国故事有助于提升课堂教学的亲合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为例,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担负起讲好中国故事的使命责任,深刻理解“谁来讲”“讲什么”“怎么讲”3大命题,阐释“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主体维度、确定“弘扬主旋律”的内容维度、找对“奏响交响乐”的方法维度,将中国故事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和课程体系,引导学生主动投身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践中。

关键词:高校思政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中国故事

中图分类号:D41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4)07-0078-07

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特别谈到了会讲故事、讲好故事的重要性。他说:“会讲故事,讲好故事十分重要。思政课就要讲好中华民族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改革开放的故事,特别是要讲好新时代的故事。讲故事,不仅老师讲,而且要组织学生自己讲。”^[1]开好、讲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以下简称“概论”课)是当前重大政治任务。本文以“概论”课为例,围绕讲好中国故事这一鲜明主题,从谁来讲、讲什么、如何讲3个方面进行学理阐释,为思政课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提供理论参考和经验借鉴。

收稿日期:2024-01-05

基金项目: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BKS105);
南昌航空大学2022年校级教改课题(JY22095)。

作者简介:张云霞(1998-),女,汉族,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通讯作者:卢艳兰(1980-),女,汉族,教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一、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叙事共同体

同样的故事,由不同人来讲,效果和可信度大不一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不仅中央的同志要讲,而且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讲;不仅宣传部门要讲、媒体要讲,而且实际工作部门都要讲、各条战线都要讲。”^[2]需要动员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专职思政课教师要讲,兼职思政课教师也要讲;校内教师要讲,还要挖掘校外人员加入;老师要讲,也要鼓励学生讲,发挥多元主体讲好中国故事,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和资源,拓展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队伍。

(一)一课多师:在专兼携手中把中国故事讲深

“概论”课的内容很广泛,涵盖从古至今、从国内到国外、从经济到政治等众多领域,这也对教师的理论高度和知识广度都提出了极高要求。大多数思政课教师具备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理论素养,但是在如何选取故事角度、用什么样的方式讲解中国故事的能力还有待提升。因此,必须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壮大师资队伍,引入兼职教师,为讲好中国故事凝聚合力。“一课多师”是由专职教师、特聘教授、兼职教师组成的多主体携手育人的师资队伍,是为了打破一门课程

由单个教师“一讲到底”的困局,形成一门课程多个老师接力教学的专题团队模式,实现教学资源的有效整合、合理分配,助力思政课提质增效。不同教师的专业背景、经验阅历、人生体会不同,决定了他们对故事的选材、讲解方式等体现出各自的特点,更能激发学生的期待感和获得感,从而提高讲故事的效果,很好地避免了讲了听不懂、听了记不住的现象。针对讲好中国故事而言,“一课多师”实现了不同教师授课,为学生带来了丰富多彩、别具一格的中国故事,教师结合自身经验将故事中的各种要素有效汇聚起来,挖掘故事背后的本质哲理,充分调动学生的乐趣,把中国故事讲深。

(二)双师同堂:在内外结合中把中国故事讲透

当然,除了教师,讲好中国故事主体还可以跳出校内的范围,认识到校外人士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参与者。校内外“双主体”共同讲好一个中国故事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校内思政课教师基于自身素养升华理论,校外老师立足自身实践讲好中国故事,校内外结合让故事不再假大空,让理论不再是无感情的直抒。这种授课方式又称之为“双师同堂”,有利于汇聚多方力量,拓展“讲好中国故事”的资源。立足校园建资源、跳出校园找资源的理念,是积极引入各方资源,努力构建内外协同、一体贯通的资源建设模式。一要结合专题教学,邀请党政机关干部、专家学者、模范人物等走进校园、走进教室专题讲授在实践中所见所闻的一线故事,一方面补充了“概论”课的故事来源、更新了故事库,另一方面来自校外的一线故事很少被报道或提及也更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二要用好社会平台资源,建设育人实践基地,推动学校建设“家门口”的专题教学实践基地,让学生走出教室,近距离聆听中国故事,感知党的伟大奋斗历程和辉煌成就。三要构建多维立体学习资源,用好博物馆、纪念馆、主题展等场所,线上线下一体化开展“专题故事走读”主题活动,让学生“云游”纪念场馆、线上赏析故事、情境式诵读经典,引导广大学生自觉学习,主动参与讲好中国故事,把中国故事讲透。

(三)师生同台:在双向互动中把中国故事讲活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双向互动过程。随着教学理念的更新,亟需打破当前单向

的“你讲我听”的局面。通过“同开发、同讲述、同实践”的“师生同台”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化“被动”为“主动”,引导学生争当讲好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师生同台”是深化改革创新,提升“学好思政课”效果的举措。具体表现在:其一,共同开发主题宣讲。教师引导学生共同学习新知识、共同研讨新内容、共同交流新感悟。师生围绕宣讲好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选取故事题材,打磨作品,实现了由一人讲变为师生共讲,由听讲人变为宣讲人的效果。其二,共推大学生讲思政课。教师要转变思维,引导学生在深入思考,动手实践的过程中深化对知识的理解,实现由“课程本位”向“知识本位”再到“行为本位”的提升。^[3]一方面,学生围绕某一个特定主题设计微宣讲并录制微课,通过同辈间的传导力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延展;另一方面,结合当下发生的国内国际热点事件选定故事主题,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其三,共研师生同台式教学。思政课教师要在教学时设计师生互动、学生解读等环节让学生走上讲台,引导学生分析故事背后的哲理。此外,鼓励学生从个人成长维度讲好自己眼中的中国故事,带领学生真正参与实践教学。这一教学模式有利于指导学生做到知行合一,学会主动关心国家大事、深入分析时事政治,把中国故事讲活。

二、选取以“弘扬主旋律”为标准的叙事原料

讲好中国故事要在深耕内容上花心思。对“概论”课而言,要讲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五个故事”,思政课教师需把握最新版教材的编撰理念和教学目标,宏观掌握教材结构,微观萃取教学内容,结合故事内容和哲理道理遴选聚合点,在寓理于事达到教育引导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提高理论水平、增强实践能力的教学目标。

(一)将中华民族的故事融入“概论”课教学

讲故事是一种叙事行为,其目的是对人类文明进程中已被记载、正在记载、将要记载的文化性故事的符号化呈现与形象化表达。“在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没有中断、延续发展至今的文明,已经有5000多年历史了。”^[4]中华民族在“大一统”“大交融”“大团结”的历史过程中产生了灿若星河的民族故事,

这也是“概论”课面向青年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生动素材。

首先,要讲好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故事,使学生认识到“大一统”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内在基因。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还是秦汉时期建立并延续的天下一统,都是为了建立“大一统”的国家制度。“概论”课在传授维护国家安全和推进祖国完全统一等内容时,通过讲述“文成公主进藏”“凉州会盟”“桃花石”等中华民族在维护祖国统一中形成的生动有趣、真实有理的历史故事,展现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维护国家统一,旗帜鲜明反对一切分裂国家、分裂民族的言论和行为,增强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其次,要讲好中华民族“大交融”的故事,让学生深入理解中华文明蕴涵的包罗万象、和和共生的内生特质。比如:讲“概论”课第十章“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时,可以讲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茶马古道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深入阐释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促进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重要原因,也是坚定文化自信,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有效举措,使学生提振信心,认识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渊源和深厚力量。最后,要讲好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故事,让学生充分认识到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根本保证。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外来侵略,濒临“亡国灭种”的危境,为维护国家统一,各民族同仇敌忾、并肩战斗,产生了彝海结盟、白沙起义、八女投江等诸多感人故事。将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伟大事迹融入“概论”课教学中,对于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理论内涵和实践路径,为学生展现各民族像石榴籽一般的团结样态提供了形象生动的实践依据。

(二)将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融入“概论”课教学

党的历史是深厚的精神沃土,也是富饶的资源宝库。百年光辉历程孕育了无数交口称誉的感人故事,为讲好“概论”课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对引导学生准确把握党的发展脉络、精神图谱、丰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概论”课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要侧重于展示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初心与责任。

第一,融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故事,让学生知

道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与人民共成长的历史。通过讲好红军“半床被子”、焦裕禄兰考治沙、杨善洲为人民造绿洲、黄文秀返乡扶贫等故事,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定人民立场、服务人民需求、满足人民期待。使学生从中领悟“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为民情怀,坚定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全面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深刻意义。第二,融入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故事,使学生了解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懈奋斗在实现国家繁荣昌盛的最前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5]百年来有李大钊、方志敏、蔡和森等仁人志士,还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批投身“两弹一星”事业的科学家以及跋涉在脱贫攻坚道路上的数百万党员干部,他们的事迹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讲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原料。第三,融入为世界谋大同的故事,开拓学生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明晰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天下,讲信修睦的价值主张。教师在“概论”课教学中,可以通过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丰富实践故事引导学生立足中国看世界,明晰世界各国同呼吸、共命运的道理,深入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与实践指向。

(三)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故事融入“概论”课教学

回望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于风云动荡中“破局”,实现了从一穷二白到繁荣富强的华丽蜕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这一伟大事件,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6]期间也发生了许多发人深省、意蕴丰富的感人故事,并凭借着故事本身的客观性、鲜活性、引导性成为“概论”课教学的重要素材。

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故事融入“概论”课教学,必然要向学生讲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过去、现在与将来,疏通时间线,明晰关键点。要讲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长壮大的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辉煌成就的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巨变为何发生的故事,引导学生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发展,领会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成长历程是曲折的但是前景是无限光明的。从新中国的成立到改革开放的巨变再到新时代的伟大变革,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艰辛的成长历程,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成就,也产生了像开国大典、抗美援朝战争、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改革开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数不尽的奋斗故事。将这些故事穿插进“概论”课教学中,能帮助学生深刻理解为什么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等一系列重大命题,让学生领会国家、社会的深刻变革与繁荣发展是科学理论、正确决策、人民群众、党的领导等多种要素凝聚的合力。此外,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长历程,讲好新中国成立、发展,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怎样逐步变“强”的故事,帮助广大青年学生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的历史成就和奋斗经验,有助于学生在对历史故事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从而做到众擎易举,于变局中开新局。

(四)将改革开放的故事融入“概论”课教学

改革开放是中国成长路途中的重要节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7]在这个过程中,也诞生了许多振奋人心的故事,彰显了爱国、奋进、民主、自强等优良品质。小岗村的故事作为改革开放故事的起点,大包干的故事、蛇口巨变的故事、十八洞村蝶变的故事不断发生,这些故事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也蕴藏着丰富“概论”课教学内容的重要原料。

讲好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的发展故事,既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也要分析发展进程中面临的挑战。一方面,“概论”课要讲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紧扣“概论”课内容,借助乡村振兴、“一带一路”等故事挖掘新发展理念的丰富内涵、深刻意义;通过文旅消费、华为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理解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缘由、举措;在贵州“村超”“村BA”火爆出圈等故事中解读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布局,引导学生明晰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要义和现实举措。另一方面,还要讲透发展历程中的问题与挑战。向学生道明改革开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蹴即至是不可能的,需要在革新与转换过程中不断破解新问题。在“概论”课中,可以在对比东西部

区域发展现状、中国与西方国家发展差距等中找寻具体故事,解读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因与路径,为学生梳理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重大意义和光明前景,并坚定自信将改革开放一以贯之。

(五)将新时代的故事融入“概论”课教学

故事孕育在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之中。讲故事是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的重要途径。中国故事作为一种传播方式,要想变为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就需要紧密联系新时代以来中国提出的理念主张,正在进行的生动实践,用真实的事、真切的人来反映中国的实际现状,用故事映射理论。

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能够帮助学生深刻理解“中国怎样走近世界舞台中心”,增强中国“强起来”的来自自信。“概论”课应当把握好理论与故事呈现间的联系,讲清楚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人民美好生活的故事。引导学生关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热点问题,如“健康中国”“脱贫攻坚”“美丽乡村”等实践,从中领会党和国家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要讲清楚中国的外交故事,讲清楚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之路,融入“高铁外交”、对外疫情援助、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等实践故事,帮助学生明晰中国外交史上的大事件和艰辛的发展历程,了解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8]的使命任务,中国式现代化也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可或缺的重要素材,要善于以小见大,通过讲述高铁故事、航天故事、5G 故事等展现中国科技发展的巨大成就,解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教育、科技、人才战略的主要内容和基础性意义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通过讲述抗疫故事、扶贫故事、法治故事等展现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通过讲述蓝冠噪鹛故事、大象北迁故事、防沙治沙故事等展现中国生态保护的美好画卷,展现中国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中取得的显著成效。

三、将“奏响交响乐”作为叙事的方法论要求

故事素材关系着呈现内容的好与坏,讲故事的策略关系着能否将故事的内容真正传递给学生,关系着能否以故事的内容感染、打动、影响学生,从而达到讲故事的目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讲事实才能说服人,讲形象才能打动人,讲情感才能感染人,讲道理才能影响人。”^[9]由此,讲中国故事要立足“真”“形”“情”“理”,或呈现直观可靠的数据,使故事的真实性得到最大程度的认可;或通过生动的形象和图像,最大限度地实现学生与故事间感情碰撞;或通过亲切朴实的表达方式,在故事情节刻画中引发情感共鸣;或通过循循善诱的说理,融情于理,在潜移默化中接受道理。

(一)立足“真”:用雄辩数据陈述中国实际

“概论”课讲好中国故事的必要遵循和前进方向是内容真实、数据可靠,而故事的力量也在于此。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实践中取得的优异成绩,是我们叙事的深厚基础。用客观数据来叙述中国故事,通过数据呈现的形式让学生知道中国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为世界和人类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讲好真实的中国故事,应挖掘客观数据,运用比较的方式来叙述。通过数据对比,事物发展脉络清晰、直观地呈现在学生面前。首先,在时间维度上进行纵向比较,更加直观地表现事物的发展历程。比如在“概论”课中涉及经济发展内容时,就可以通过数据比较的形式,以讲故事的方式,纵向比较新中国成立初期与现今国民收入的具体数据,通过数据的涨幅来分析“钱袋子”日渐丰满的背后是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更得益于国家的强盛。此外,我国脱贫攻坚、“千万工程”、精准扶贫等都可以用数据的形式讲故事,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制度认同感。其次,在空间维度上进行横向比较。“概论”课具有宽阔的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在讲解过程中要将视野放在更宽广的世界舞台上,明确中国的世界方位。仍以经济部分的内容为例,将中国放在世界其他国家中进行比较,例举中美两国GDP总量对比数据,了解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几十年与几百年的历史进程,激发学生自豪感和自信心。在横向与纵向比较中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使学生认识

到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中国,世界方位中的中国,深刻感受事物是在曲折中不断前进的,增强思政课的育人力量。

(二)联系“形”:用生动事例阐释中国形象

形象是对事物的总体描述和感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注重塑造中国的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大国形象。^[10]讲中国故事,树大国形象,体现在具体的事例中,需要从典型的故事中寻找中国形象,在细节处窥探中国形象,在名言典故中发现中国形象。

首先,确立故事内容的典型性原则,是指单个故事具有能够映射全局的普遍性意义,彰显某一理念,呈现某种形象的作用。中国故事越典型越能体现中国现状,越具有教育价值。其次,立足故事细节的深度描写。在讲述故事时不能集中于宏大叙事宣传教育,要善于发挥细节表达的吸引力,注重对故事所涉及的局部特征、细微事实等相关细节的刻画,激发故事震撼心灵的力量。在讲述中国致力于修建匈塞铁路的故事时,通过解读人物和事件,让学生切实体会到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最后,引用名言典故的形象表达。“概论”课讲好中国故事时可以运用诗句、名言、典故等形象化的表达,让故事更接地气更有说服力,实现有效叙事,缩短与学生的距离。用诗句“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说明中国人民有崇尚和平的思想传统;用“半条棉被”的故事,形象生动地讲述中国共产党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会剪下半条给老百姓”^[11]的人。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讲:“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12]来驳倒“中国威胁论”,凸显中国历来追求和平的形象。

(三)聚焦“情”:用真情流露演绎中国情感

动情对于加深印象、激发情感具有重要作用。故事的表现不仅仅通过语言和文字,还可以运用图片和视频等方式增强情感的渲染。讲故事不是照本宣科的“漫灌”,更不是耳提面命的“说教”,而是要通过情理交融的讲述,给学生深刻的学习体验和心灵启迪。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用真挚情感把中国故事讲出温度,让思政课真正成为触动心灵的课程。

首先,运用语言艺术,营造氛围。语言是教学中不可或缺的载体,教师在讲故事时要善用言语表达,从

语句和语气上让学生在故事中感受情感变化。一方面,语句要贴切学生。教师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同时积极更新话语体系,使用学生喜闻乐见的语句来解读故事。另一方面,语气要错落有致。讲故事重点在讲,低沉、高昂、平直、曲折,不同的语调能够使学生更好地融入故事情节,产生情感共鸣,解读故事蕴含的情感与价值取向等。其次,运用现代技术,展示情景。情理交融地讲述中国故事需要教师利用媒体技术,借助图片、音频、视频等方式开展情境体验式教学,在调动情绪的过程中有效地传达信息。此外,还可以积极运用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技术还原故事发生的情境,搭建跨越时空的情感互动机制,让学生通过动态图像真实感受不同历史时期的典型场景,增强学生的课堂代入感和参与感。最后,运用社会实践,融入情感。结合实地走访,了解故事历史背景,开展现场领悟式教学。现场教学不仅可以增加课堂的实效性和吸引力,而且能够在调动情绪的过程中直观地传达信息。结合事物,置身实景讲中国故事,让故事真正具有现实厚度。例如,通过航空企业发展和转型的跌宕起伏,以最直观的方式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内涵与发展理念等。教师可以教学内容相关的文化遗址、重要场景、主题展览、典型企业、相关人物等为依托,让学生在“行走”中了解故事的前因后果。带领学生重温真实的历史场域,在实地参观中积极与学生互动交流,引领学生领悟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

(四)深化“理”:用哲学思维升华中国道理

诗以言志、文以载道,被反复传诵的故事,不仅仅在于动人心弦的内容,更在于其深藏的跨越时空仍发人深省的道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不要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要把‘道’贯通于故事之中。”^[13]在教学中,要善于跳出故事本身,让学生有启发、明事理,因此要选好故事角度,坚持问题导向,体现循循善诱,揭示出中国故事之“道”。

首先,选好故事角度,用小故事折射大道理。宏观故事往往不如贴近烟火气的故事动人,故事选材上要观照受众,小处着手。“概论”课在讲述中国故事时要认真研究学生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尤其要在故事选材上下功夫。“概论”课教师在给学生讲述中国式现

代化故事时,可以选取中国高铁、乡村振兴等烟火气十足的中国式现代化故事,让学生从故事中悟出中国式现代化何以推动中国发展的道理。其次,坚持问题导向,在解决问题中感悟道理。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教师在叙事时要善于捕捉疑问,巧设思考,引导学生从故事中听出“答案”和“启发”。思政课教师可以先提出“实现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是什么”这一问题,引导学生探寻答案,最后教师再用透彻的学理分析解答学生的疑惑和问题,从而逐步地把故事背后的道理讲透彻,在循循善诱中启人以道。最后,故事讲述后要提炼观点、激活反思,高校思政课要通过深刻道理升华中国故事,不仅需要故事讲述前引导学生“入道”,更要在故事讲述后总结反思“悟道”。仍以“实现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是什么”问题为例,教师在课堂上通过“问题引导—讨论思考—发蒙解惑”的教学策略,引导学生了解实现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是什么之后,还要善于进一步将问题概括升华。教师要通过以点带面式教学引导学生“悟道”,在讲清“实现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基础上,能够继续引导学生反思“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除了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还要遵循什么”的问题,由此向学生强调“牢牢植根于本国国情和实际”的重要性,从而提炼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特色的观点。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习近平重要讲话单行本:2020年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2021:292.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211.
- [3] 陈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三个维度[J].思想教育研究,2019(2):114-117.
- [4] 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4-04-02(002).
- [5]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2021-07-01)[2023-10-01].<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2146278>.
- [6] 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10-02(002).
- [7]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2-19(002).

- [8]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1. 21(001).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212. [12] 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在中法建交 5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3-27(001).
- [10]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2.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213.
- [11] 坚守人民情怀,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习近平在湖南考察并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纪实[N].人民日报,2020-09- (责任编辑:魏琛)

Exploration on Telling China's Story Well in Civ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Courses: Taking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Course as an Example

ZHANG Yunxia, LU Yanlan

(School of Marxism, Nancha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chang, Jiangxi 330063)

Abstract: Chinese stories are vivid teaching material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well can help improve the affinity of classroom teaching. Taking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take up the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telling China's story, deeply understand the three major propositions of "who should tell it", "what should be told" and "how should it be told", and explain how to tell it in the classroom. The course should deeply understand the three major propositions of "who should tell", "what should be told" and "how should be told", explain the subject dimension of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determine the content dimension of "carrying forward the main theme", and find the right way to "play a symphony". By explaining the subjective dimension of "joint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determining the content dimension of "promoting the main theme", and finding the methodological dimension of "playing the symphony", we can integrate the Chinese story into the content and curriculum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guide the students to actively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 vivid practice of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China Story

独立学院“党建+美育”融合发展路径探析

——以福州大学至诚学院传媒与设计系为例

张文春, 林逢春

(福州大学 至诚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2)

摘要:新时代,高校学生美育工作备受关注。美育是高校培根铸魂的工作,对提高大学生的审美意趣、党性修养等至关重要。独立学院基于此,开展“党建+美育”融合发展工作,将艺术浸润融入党员教育,创新党建工作的思路。从“独立学院—辅导员—大学生”三个角度探析“党建+美育”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面临的困境和发展路径,聚集美育资源、拓展美育实践途径。旨在助力独立学院党建工作走出校园、融入社会服务之中,形成较好的“党建+美育”品牌效应。为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增添色彩,进一步提高当代大学生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升党员教育的育人实效。

关键词:独立学院;美育;党建;融合发展;路径探析

中图分类号:D642;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4)07-0085-05

近年来,党和国家对美育工作的重视程度之高、布局力度之大前所未有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2015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指出,学校教育要“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把美育纳入各级各类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2023年12月,教育部《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指出:“进一步加强学校美育工作,强化学校美育的育人功能,教育部决定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大学生党支部作为高校的基层党组织,是教育、管理、监督、服务师生党员的基本单位。美育工作和党建工作在育人目标层面具有高度契合性,为两者的融合发展奠定了基础。^[1]独立学院有必要将“党建+美育”融合发展,增强大学生党员教育的实效性、艺术性,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政治观,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目标。^[2]

一、独立学院“党建+美育”深度融合发展的意义

独立学院属于本科层次的高等教育机构,是高等教育面向大众化发展过程中的新兴产物,对我国新时期的人才培养需求起到有效的补充作用,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大特色。^[3]由于独立学院里的部分学生从幼时起就开始培养文艺和体育等兴趣爱好,部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表现欲望相对较强,且独立学院与普通高校的培养对象和目标有所区别,因此独立学院在开展“党建+美育”融合发展工作中具有天然的优势和重要意义,可以形成自身的特色。^[4]

(一)“党建+美育”融合发展,德智体美劳协同育人向上向善向美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5]美育在学生全面发展中起着动力作用,即美育与四育相互融合,德美融合塑心灵,智美融合增才智,体美融合强体魄,劳美融合助圆梦,实现协同育人向上向善向美。因此,高校开展美育浸润行动,

收稿日期:2023-11-28

作者简介:张文春(1994-),女,汉族,助教,主要从事高校思想政治研究。

将美育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能潜移默化地彰显育人成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实现独立学院高质量发展素质教育的目标。

(二)“党建+美育”融合发展,独立学院育才策略有效有度有成

美育是高校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帮助大学生实现全面发展的关键一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6]新时代大学生大多为“00后”,他们思维活跃、思想流动性很强,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7]探索“党建+美育”融合发展,将美育融于大学生党员教育,提高其党性修养、专业文化技能等综合素质,并引导他们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大学生党员与普通学生间的紧密联系,以朋辈“尝试者”带动“观望者”,进而将美育成果进行有效转化,充分发挥其“润物细无声”的育人实效。

独立院校在开展美育教育工作时将“00后”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规律和美育特点相结合,因材施教制定培养方案。比如,以“党员先锋领航计划”为核心,将美育通过线上+线下、第一课堂+第二课堂、专题+日常等方式全方位融入大学生的日常,更好地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我、提升自我,促使大学生逐步向高素质、高能人才目标发展,保证育人实效持久且深刻,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

(三)“党建+美育”融合发展,思政教育全员全程全面

2019年4月,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提出,学校美育是培根铸魂的工作,高校要促进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和劳动教育相融合。^[8]2023年12月,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指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美育协同育人的观念逐渐深化。^[9]辅导员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骨干力量,也是推进“党建+美育”融合发展的主要执行者。把思想政治教育寓于“党建+美育”之中,有助于高校构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的育人体系,营造美育思政协同育人环境,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同时发挥美育陶冶情操和完善人格的作用,提高大学生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规律

的能力。^[10]

(四)“党建+美育”融合发展,推动党员教育入脑入心入行

新时代,独立学院开展“党建+美育”融合发展工作,首先应帮助大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领悟其精神内核,增强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11]其次应激发党员政治理论学习的动力,推动理论学习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再者应丰富党员教育方式,强化思想理论教育入脑入心入行。

二、独立学院开展“党建+美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党组织管理体系不够完善、管理人员力量不足

大学生党员发展数量稳步提升,大学生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压力逐渐增大。由于独立学院存在缺乏完善的党员管理机制、管理人员力量不足等问题,导致党建的首要工作岗位旁落,“党建+美育”融合发展工作不够深入,严重制约了高校党建工作的发展。从目前独立学院的党组织管理结构来看,有些仅配备党总支书记,没有专职的副书记;或仅配备副书记来负责系部的日常党务工作;有些虽配备了专职组织员,但大多数学生党支部书记是由辅导员兼任,身兼数职,兼而不专。

(二)辅导员美育知识缺乏、美育工作方式单一

开展“党建+美育”融合工作需要两手同时抓党建和美育。其中,党建工作是辅导员九大职责之一,是必须掌握的知识和工作技能。但大多数辅导员并无美育相关专业背景,自身美育知识不足;且多数辅导员除了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承担党支部日常工作外,还需处理与学生日常的谈心谈话、思想政治教育、突发事件、职业生涯规划、承担部分思政类课程的授课等各项工作。这就导致辅导员根本无暇开展自身美育知识学习和提升“党建+美育”的业务能力,也造成了辅导员在有限的时间内和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很难充分挖掘、整合美育和党建相关素材,更无法应用自如地实现“党建+美育”工作的互联互通。

此外,辅导员自身美育知识的不足,导致其开展的党员教育活动形式单一。例如在开展“三会一课”、

主题党日等活动时,一般采用的活动形式多数为学文件、听讲座、开大会、观看红色电影等。不可否认在一定的时间段内此类活动会起到教育意义。但这种由辅导员发起的“大水漫灌式”红色美育活动仍停留在单向灌输状态,并未能结合当代大学生的身心特点,将要传递的思想内涵转化为大学生较易接受的新语言和新方式,导致部分学生党员认为“党建+美育”活动流于形式,缺少吸引力和感召力。

(三) 学生党员美育创新意识缺乏、主动学习意识薄弱

高校虽有针对性地开展艺术性活动和开设艺术鉴赏类的相关通识教育课程,但大多数学生和学生党员兴趣不高,缺乏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多数的学生在选修美育通识课程和参与相关美育活动时呈比较明显的功利性:一是为了能够获得相应的选修课学分,保证自己能正常毕业;二是为了综合测评分数,增加自己获得奖学金的优势。此外,受传统观念和社会现实等因素的影响,大学生在校期间会将大部分时间投入考研考公、竞赛获奖、毕业就业等实际目标上,即使遇到生活压力或者心理困惑,也简单地认为只要坚持找到好工作或考上研究生,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从而忽视了审美情趣等综合素质能力的养成。综上所述,学生党员缺乏美育创新意识和学习主动性,较难实现美育协同育人目标。

三、独立学院基于美育背景下“党建+美育”融合发展路径

高校学生党建工作是立德树人之基,独立学院将美育教育融入党建工作中,不仅为全面育人奠定重要基础,而且能实现学校育人与育才的统一。下面以福州大学至诚学院传媒与设计系为例,阐述独立学院基于美育背景下“党建+美育”的融合发展路径。

长期以来,福州大学至诚学院传媒与设计系高度重视美育工作,结合学生的学科和专业特点,科学构建美育教育体系,从美育教育整体设计、美育教育内容梯度等方面,建立从知识拓展、多元实践到技能培养的渐进式推进机制。同时学生第一党支部依托两个设计类专业和一个网络与新媒体、表演专业优势,提

出了“三横三纵三融合”党建工作机制。

(一) 构建良好“课堂+美育”环境,孕育学习美生态土壤

1. 充分利用第一课堂学习美

传媒与设计系在第一课堂方面,结合新时代大学生全面发展需求和当前两个设计类专业课程开设现状,积极开展美育教学改革研究。支部教师党员中有福建省工业设计协会会员、福建省包装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包装创意设计大赛专业评审委员,他们在专业建设、学术科研等工作中,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利用自身专业知识服务师生,寓美于教融美于学,以美育人化美启智。而且由支部教师党员主导的“创意结构设计”“用户体验研究”获批福建省一流本科课程,获批省级本科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一般项目)1项。以上这些成绩,为设计类专业学生提供了更优质的美育教育资源和理论学习实践的平台,让学生在第一课堂中体会美育的重要性,从而主动学习美,获得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12]

2. 积极开展第二课堂培育美

传媒与设计系积极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培育大学生的审美情操,引领大学生发现美、感受美、创造美。该系充分发挥学科专业优势,探索开展“美育浸润文化节”沉浸式学习活动,精心谱写“美育作品中的党史”“美术创作中的党史”“美育实践中的党史”相结合的“三部曲”,实现“专业实践”与“党史学习教育”同频共振。该系将爱国运动主题的毕业汇演纳入表演专业的人才培养实践环节。其中,2017级表演专业毕业汇演爱国话剧《高原》受到广泛好评。进藏女兵震撼人心的故事引领师生重燃被暂忘的坚定信念和理想。学生们在长达半年的排练过程中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继承了剧中女兵运输队完成革命任务时的顽强意志,传承发扬了爱国爱党的精神,支部党员立志做有责任感、有使命感的青年人。

同时,该系结合专业特色举办“人间四月天,春日绘画体验”等美育活动。2022年,支部发挥摄影、设计、绘画的专业优势,将社会实践和专业实践相结合,组织支部党员重走习近平总书记当年的路,对比福建省福州、厦门、宁德等地市几十年间变化的照片,以创作连环画小册子的形式,绘制《山海图》画册。在建党101

周年期间,支部成员前往福州青年会广场开展“回顾历史,喜迎党的二十大,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主题党日活动。2023年新生季开展“智慧美育启迪心灵,数字艺术点睛校园”主题专业作品画展,将美育与党建相融合。该系以党建引路,以美育塑人,将“党建+美育”融合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二)创新“实践+美育”育人载体,推动打造大学生美育工作主阵地

1.坚持以赛促学创造美

传媒与设计系坚持以赛促学,以训促长。学生第一党支部以互联网+等赛事为重要抓手,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定期动员学生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参加各级各类学科竞赛。支部的优秀学子们在中国包装创意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福建省校园微拍大赛等各类各级赛事活动中不断斩获佳绩。2023年共斩获国家级和省级竞赛荣誉81项,成绩再创新高。该系通过鼓励大学生群体积极参与各项赛事,培养了学生创造美、践行美的能力,切实有效地提升了美育的育人实效。

2.投身社会服务传播美

支部注重知行合一,充分深挖利用红色资源,从党史故事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引导党员走出校园、走进苏区、走入乡村,实现从校园“小课堂”走向社会“大课堂”。支部依托省级大学生品牌实践队——“西红饰”服务队,组建学生党史学习宣讲队到省内苏区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苏区丰富的红色美育资源,深入开展学习调研和党史宣讲等实践活动,促进了红色美育文化的广泛传播,进一步筑牢大学生的精神之“钙”。支部党员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乡村墙绘喷涂文化墙和传授直播带货技能,积极投身社会服务,在实践中传播美。

(三)紧跟“时代+美育”步伐,助推以美育人实效更“活”更“美”

高校美育要立足新时代新征程,顺应时代之变,肩负起国家使命和人民期盼,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美育育人实效。传媒与设计系紧跟时代步伐,坚持“党建+美育”融合发展,发挥本支部省级样板支部示范引领作用和专业优势,开展富有时代气息、饱含红色精神的美术作品创作活动,将沉浸式的教育理念运用到

党员教育当中,提升了党员参与教育活动的积极性。让学生亲手创作党史学习教育美术作品、亲自讲述美术作品的创作历史和背景,让党员教育更加“鲜活”。

支部在“党建+美育”融合过程中,逐步探索形成了“图说我们的时代”“尽美文创”和“西红饰”服务队三大党建思政品牌。其中,“图说我们的新时代”深挖专业课程思政元素,发挥课程育人主渠道作用,推出大量原创校园文化精品;“尽美文创”团队紧扣时代主旋律,以专业载体“亮化”党员身份,以文创实践“活化”党员教育,将理想融入创作,不断强化以美育人,并获得了切实的教育实效。而“西红饰”服务队坚持志愿服务与专业相结合,成为福州大学至诚学院传媒与设计系大学生助力乡村振兴成长成才的训练营。

四、结语

综上所述,独立学院基于美育背景,党建工作应当顺应时代发展,将“党建+美育”融合发展,将艺术浸润行动融入党员教育全过程,旨在丰富高校党建工作的内容和形式,增强新时代大学生党建工作的实效性和吸引力。

参考文献:

- [1] 陈溪.基于美育的大学生党建教育实践方法探讨[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20(13):181-182.
- [2] 赵晴晴.基于美育视角的大学生党员教育路径探析[J].高校后勤研究,2022(12):58-60.
- [3] 王明照.新时期独立学院党建工作现状及对策研究[J].大学,2023(18):99-102.
- [4] 龚晓雪.独立学院美育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J].美术教育研究,2021(3):152-153.
- [5]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6] 习近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N].人民日报,2018-09-11(001).
- [7] 卜怡.新媒体视域下“0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大连:大连海洋大学,2023.
- [8] 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R].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2019(5):19-23.
- [9] 陈欣颖.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美育素养提升的逻辑起点与实现路径[J].华东纸业,2022,52(2):23-25.
- [10] 黄嵩.新时代高校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与美育融合的路径探析[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5(4):44-48,131.
- [11] 周慧君.文化自信视域下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美育教育的路径研究[J].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23,39(8):67-70.
- [12] 张琼瑶.新时代美育背景下高校艺术类专业党建工作研究:以重庆人文科技学院艺术学院为例[J].大学,2022(6):125-128.
- (责任编辑:魏琛)

An Analysis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ath of “Party Building+ Aesthetic Education” in Independent Colleges:

Taking the Department of Media and Design of Fuzhou University
Zhicheng College as an Example

ZHANG Wenchun, LIN Fengchun

(Zhicheng College,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Aesthetic education is the work of cultivating the soul of bac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aesthetic interest and party spirit of college students. Based on this, the independent college carries out the integration of "Party building + aesthetic education", integrates art into party member education, and innovates the ideas of party building work.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difficulties and difficulties of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arty building+aesthetic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ependent college- counselor -college students", gathers aesthetic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broadens the practic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t aims to help the party building work of independent colleges to go out of the campus and integrate into social services, form a better brand effect of "party building + aesthetic education", add color to the party building work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urther improve the enthusiasm and creativity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 party members, and enhance the 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 of party member education.

Key words: independent colleges; aesthetic education; party building;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ath analysis

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理论关联、 分析框架与协同进路

陈清森¹，杨天平²

(1.武夷学院 发展规划与评建处,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2.浙江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协同融教育、科技与人才为一体,对大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之间既存在相互支撑、相互包含的理论关联,也存在各有侧重、相互竞争的实践困扰。根据系统思维和协同立场,将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视为一个整体系统,搭建 CIPP(环境—输入—过程—结果)的分析框架,分别从环境、组织、活动、知识4个角度提出优化学校发展环境、完善学科组织治理、再造人才培养流程以及创生学科知识成果4个促进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协同的策略。

关键词: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协同进路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4)07-0090-07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部署,这是国家在宏观层面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以及人才强国的系统谋划。而在微观的大学场域,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协同正是贯彻落实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融合发展战略的关键所在。其实,有关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相互关系的探讨历来都是学界常议常新的热点话题。纵览既有研究,学界一方面基于不同视角探讨了两者在知识、师资、资源以及平台等方面的理论关联^[1-6];另一方面,则针对两者在思想认识、政策导向、人才培养模式、管理体制、组织体系以及评价机制等方面的疏离现状,提出诸如“把学科建设与本科教学改革看作一个整体系统”^[7]、学科专业一体化^[8-10]、

学科专业课程一体化^[11-13]以及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协同^[14-15]等弥合两者疏离的实践路径。

上述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借鉴,指明了系统思维、统一规划、加强协调以及资源整合等“协同”思路是解决两者疏离问题的基本方向。但是,既有研究大多将两者之间关系固步于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的关系,缺乏一个整体性的分析框架,影响了问题分析的全面性和解决策略的说服力。据此,本研究尝试引入一般系统论、“协同学”理论以及 CIPP 评价理论等相关理论资源,力图明晰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协同的理论内涵,构建分析框架,提出促进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协同的策略选择。

收稿日期:2024-01-31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 2024 年度博士扶持项目 (FJ2024BF056);福建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3 年度课题(FJJKBK23-021);2021 年度浙江省哲社规重点课题(21NDJC003Z)。

作者简介:陈清森(1983-),男,汉族,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与政策研究。

通讯作者:杨天平(1956-),男,汉族,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与政策研究。

一、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理论关联

从形态维度看,大学学科建设是学科“知识形态”“组织形态”“活动形态”3种形态构成的动态发展统一体。^[6]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同处于大学场域之中,面临同样的外部环境,同样也包含了组织机构、知识信息以及学术与管理活动等3种形态。那么,从理论上讲,两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呈现怎样的一种复杂样态?

(一)内在结构:紧密关联、相互支撑

首先,从学科建设角度来看,学科建设的成效主要表现为对学科结构的优化和学科内涵的充实。所谓学科结构,主要指的是学科类别、数量以及由此形成的结构特征。学科结构一方面可以直接约束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可能性与多样性,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学科交融、塑造学科文化,进而影响大学组织文化,最终对大学人才培养模式起到约束作用。而学科内涵包括学科使命与方向、学者规模与水平、学术物质条件、学术信息等,一方面上述学科内涵可以直接影响人才培养模式,另一方面,通过整合、精炼学科知识,支撑课程建设与教育教学活动,从而影响人才培养质量。^[5]

其次,从人才培养角度来说,其一方面依托专业组织,通过课程体系和教育教学活动与学科建设形成关联,另一方面因其与学科建设同样具有组织、活动以及知识等构成要素,两者可以通过共担教育使命,共建共享师资队伍、学科平台以及知识成果等方式产生紧密关联、相互支撑的相互关系。

(二)外在形态:互构共生、相互包含

在大学场域之中,学科建设一方面将高质量人才培养作为应有之义,有序开展探究、整合、应用以及教学等学术活动;另一方面,学科建设也需要源源不断的学科后备人才以积累学科知识,传承与弘扬学科文化。人才培养则一方面以学科建设为基础,依据某个学科的具体知识领域整合知识内容,进行课程开发,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学科建设中的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学术活动,在知识生产与运用过程中履行育人使命。

(三)工作实践:各有侧重、相互竞争

在实践中,因政策导向、体制隔阂、机制障碍等原因,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工作侧重往往不同。一般而言,学科建设重在知识生产;而人才培养重在知识传递。学科建设往往以学科方向凝练、人才汇聚与团队建设、资源整合与平台建设以及开展科学研究为主要实践要素;而人才培养则主要以教育教学、教师教学能力建设、办学条件建设为主要着力点。两者在人、财、物、学术信息等方面既存在协同,也难免存在竞争,尤其是在资源总量较为紧张、协调机制相对不完善的大学场域之中。

二、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协同的分析框架

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之间的理论关联佐证了将两者视作统一整体的可能性,而两者的实然样态则凸显了促进两者协同的必要性。在上述基础上,结合文献述评,构建两者协同的分析框架,为提出两者协同进路奠定理论根基。

(一)分析模型构建

基于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相互关联,本研究借鉴 CIPP 评价理论的框架,将大学的外部环境(Context)、组织载体(Input)、学术活动(Process)以及知识成果(Product)联结起来构建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协同的分析模型。如图 1 所示,虚线框内为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系统,包括组织、活动以及知识等相互关联的 3 个子系统,子系统内部也包含着丰富的要素类型。虚线框外围为外部环境,包含政治、经济、社会、科技以及文化等宏观环境要素。环境、组织、活动以及知识 4 个子系统恰好对应了 CIPP 的 4 种评价类型,分别为背景、输入、过程以及成果 4 种相互联系的评价。4 种评价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分析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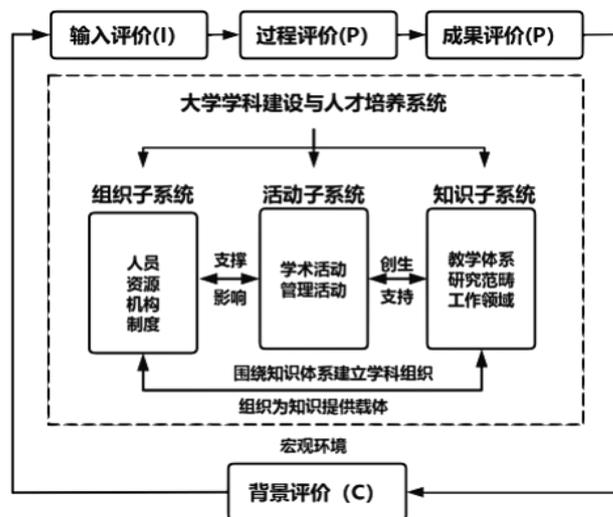


图 1 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协同的分析模型

Fig.1 Analytical model of the synergy between university discipline development and talent training

(二)分析维度阐释

以下将基于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协同的分

析模型,结合相关文献,详细阐释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协同各个维度的具体指标,如表1。

表1 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协同的测评维度

Tab.1 Evaluation dimensions of synergy between university discipline development and talent training

维度	指标	指标具体解释
环境	社会环境	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与政府政策导向、区域产业创新需求、用人单位人才需求、科技变革趋势以及社会文化观念的契合程度
	权力结构	学校在纵横两个维度的权力结构现状,具体包括领导层(顶层)、管理层(中层)、操作层(基层)等层面的情况
组织	院系领导	院系领导在学术素养、社会资本、管理理念与经验等方面的情况
	制度导向	学校在教师职称评定、教师考核与培训、教学管理、科研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导向情况
	资源配置	学校(学科)在经费规模与配置、学科平台共享、实践教学基地等方面的情况
活动	学术活动	教学活动的研究性情况;科研、社会服务活动的育人性情况
	管理活动	发展规划、实施与评价等管理活动的情况
知识	学科知识基础	学校(学科)的知识宽度、知识深度以及知识异质性等方面的情况
	教师知识能力	教师的知识吸收、整合、创新、转化以及应用方面的能力情况
	本科生知识获取	本科生在课程学习、毕业论文、科学研究成果等方面的知识获取情况

1. 环境维度

环境维度与背景评价相对应,是对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系统与外部环境协同状况的分析。相关研究指出:“组织外部的协同主要基于共同战略目标的认可和知识与能力的互补需求。”^[17]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系统作为一种开放系统,难免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外部环境有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之分。但是与自然环境相比,社会环境不但更加复杂,对大学办学的影响也更大。^[18]因此,本研究主要从对大学外部社会环境进行分析。

2. 组织维度

组织维度与输入评价相对应,是对组织子系统协同状况的分析,可从组织的权力结构、院系领导、制度导向以及资源配置等4个方面展开。

指标一:权力结构。大学权力结构的分布可大致分为高层决策、咨询建议、部门协商、部门指导以及基层组织5大层面。高层决策指校领导对学校学科建设的顶层设计;咨询建议指学术委员会的运行机制;部门协商是指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商机制;部门指导是指职能部门对二级学院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事务的协调与指导;基层组织是指二级学院下设的系、所、研究中心等基层学科组织机构的构成和运行状况。

指标二:院系领导。诸多领导理论均已表明组织领导对组织绩效有显著影响。^[19]而作为具有“底部沉重”特征的高等学校,院系领导对学校发展的影响就更为重要。作为基层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领导者,其在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上的成就与素养、社会资本情况、协同治理理念以及管理经验,均是影响系统协同的关键要素。

指标三:制度导向。制度要素对系统内的个人、群体和组织均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有学者指出“未知与已知、好奇与责任、精确与模糊构成了科研和教学二者间的内在属性差异”。^[20]由此可见,知识生产与高级专门人才培养两者之间存在内在逻辑差别。正因为这种差别,再加上外部政策导向和评价机制的影响,教师往往要面对教学、科研以及服务中的角色冲突和利益矛盾。有研究指出,“学科—专业协同机制需要在人事管理、科研管理制度和教学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21]总之,在此指标上,本研究将从教师职称聘任、教师考核、教学管理、科研管理等制度导向等角度评测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协同状况。

指标四:资源配置。资金、设施、图书资料等学术物质资料是学者进行学术活动的基础条件。^[22]因此,影响系统运行的首要因素是经费、设施、设备、图书资料等学术物质资源规模的充分程度。再者,有学者在实证调查后发现学科专业建设过程中存在资源分配“不均”^[23]与“失衡”^[24]问题,造成教学、科研资源比例的失调,加重“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成为制约学科专业一体化建设的一大原因。总之,大学的资源规模及其配置情况将会影响其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协同水平。

3. 活动维度

活动维度对应过程评价,是对活动子系统协同现状的分析。在本研究中,包括学术活动以及管理活动

两种活动类型。

指标一:学术活动。大学学术活动实质上就是以知识为对象、工具和目的的活动,具体包括教育教学、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等。有研究提出:“从科研的育人属性到教学的学术性,建构教学和科研协同创新机制;从而使侧重科研的学科建设和侧重教学的人才培养得到了协同发展的可能。”^[25]由此可见,学术活动指标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教学活动的研究性情况;其二是科研、社会服务活动中的育人性情况。

指标二:管理活动。学科建设的活动形态是由学科建设的规划、实施以及评价等环节组成的全过程。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协同体现在这个一过程的各个环节之中。其中实施环节包含了制度建设、资源配置、学科专业调整优化、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学科团队构建、学科平台建设等具体内容。

4. 知识维度

知识维度对应成果评价,是对知识子系统协同状况的分析。以下从学科、教师以及本科生3个主体分析其具体指标。

指标一:学科知识基础。有研究根据知识基础观,将组织知识基础的内涵概括为“知识宽度”“知识深度”和“知识异质性”,并探讨这三者对学科—专业协同机制的影响。^[24]其内在逻辑在于:高质量的教学与科研能够相互促进,而教师的学科方向与主讲课程内容如果存在异质性则会影响学科与专业的协同发展。因此,本研究在“知识宽度”方面,分析学科在科研、教学、服务等方面是否同步发展,是否具有丰富的成果和经验;在“知识深度”方面,分析学科在某一研究领域是否做出突出贡献,具有较高影响力。在“知识异质性”方面,分析学科的主要方向与所课程内容在方向是否一致。

指标二:教师知识能力。根据资源基础观、知识观以及组织观,知识能力被定义为组织对内外知识和资源等进行协调、重构以及更新的能力,体现在知识的生产、获取、吸收、共享、整合与应用等过程中,是决定组织吸收和创造新知识的能力。^[26]毫无疑问,大学组织知识能力的主要承载者是教师。因此,考察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系统知识维度的协同情况,可以从教师知识能力情况进行分析。

指标三:本科生知识获取。《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指出“本科生是高素质专门人才培养的最大群体”^[27],而且因此本研究从本科生知识收获角度,参考国家第五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将本科生在科研参与、课堂学习、应用能力以及学位论文等方面的高阶知识获取情况作为分析知识子系统的协同状况的具体指标。

三、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协同进阶

本部分将基于分析框架,从环境、组织、活动以及知识等4个维度,提出促进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系统的协同的策略选择。

(一) 优化学校发展环境以驱动系统协同

根据“协同学”理论的不稳定性原理,优化大学的政策与市场环境,深化产教融合,有利于驱动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产生协同效应。

就政府而言,一要强化教育统筹,对接国家产教融合政策,协调政府各相关部门,通过政策引导、发展规划、项目规划、经费支持、资源调度等途径建立产教融合的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二要强化中介作用,发挥信息和政策优势,搭建产教融合事务决策和协商平台,积极为产教牵线搭桥。三要加强监督管理和动态成效评估,利用增减经费投入和政策倾斜等工具,对参与产教融合的高校和企业进行奖惩,以调动各方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

就市场而言,一是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将企业的先进设施设备、技术人才、项目资源等引入高校,在合作领域、内容和形式上不断拓展丰富创新,促进校企同步发展。二是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桥梁和平台作用,以减少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因竞争性选择而带来的能量损耗。^[28]

(二) 完善学校组织治理以保障系统协同

根据“协同学”理论的协同效应原理和支配原理,大学应在顶层设计、制度供给、资源支撑、基层建设等方面加以系统改进,为系统协同奠定良好的组织基础。

1. 强化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协同的顶层设计

大学应坚持学科专业课程一体化的战略规划。在发展方向上,要坚持需求导向,紧跟国家和区域发展

战略,完善学科和专业的结构优化调整机制和特色发展引导机制,完善学科和专业的准入、调整和退出机制,调整学科和专业结构,不断强化学科和专业的优势特色。在发展策略上,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学科建设为基础支撑,以专业建设为主要抓手,以课程建设为重要连接点,对接产业需求打造紧密结合、相互支撑的学科群和专业群,促进学科和专业的交叉融合,产教科教双融合,教学、科研、服务一体化发展。在发展任务上,要将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布局、加强学科教学科研团队和平台的一体化建设、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升专业建设、课程建设以及校政企行多主体协同育人水平等作为重点。

2. 增加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协同的制度供给

在制度供给上,大学要以学科专业课程一体化的战略规划为指导,着重强化教师激励机制,激发学校上下推动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协同的动力。

第一,持续优化教师职称聘任、考核评价以及绩效奖励制度,平衡教师在教学、科研以及社会等活动中的角色冲突。具体而言,要坚持人才培养中心地位,以质量和贡献为导向,适度扩大教学改革成果和社会服务成果在教师评价体系指标体系中的类型和范围,合理调整教学、科研和服务等相关指标的权重占比,引导教师积极参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重点鼓励教师将科研和产业服务的项目和成果转化为教育教学资源,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科研以及社会服务能力。

第二,不断优化教学科研管理制度,出台更多引导产教科教双融合的具体举措,激发教师参与教学、科研和服务的积极性。具体而言,要一体化完善教研教改、科研管理、成果转移转化等制度,赋予教师更多的学术自由,使教师在更为宽松的学术氛围中从事教学、科研以及服务活动,并在各种活动中融汇贯通,共同提升人才培养效能。

3. 强化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协同的资源支撑

大学的发展离不开充足的资源和合理的资源配置。首先,为破解“巧妇难为少米之炊”的资源配置困境,保障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系统的协同,大学要根据学科专业课程一体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充分利用自身的学科特色和人才培养优势,以知识和能力优势来获取政府和市场的青睐,与校外主体共同构建多元、

开放、共享的区域资源集聚高地。其次,大学还要基于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协同的内在逻辑,打破组织内部的机构、人员、经费、学术物质资料、信息等壁垒,建立和完善资源配置和管理监控机制,促进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合理配置,切实降低管理重心,进一步凸显二级学院的办学主体地位,构建底部沉重的资源配置格局,保障学科专业课程一体化的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4. 夯实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协同的基层组织

首先,以权力重心下移为抓手推动基层学科组织建设。要根据学院学科专业建设的实际情况,加强基层教学和科研组织的整合、撤销和新建,明确基层学科组织的使命和目标,完善基层学科制度与运行机制,落实建设经费与人员编制,落实学科专业带头人的权限,落实基层学科组织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一体化职责,全面提升基层学科的实体化、建制化以及组织化水平。

其次,以学科人才引育为重点提高院系领导综合素质。在院系领导选任上,要通过外引内培,遴选师德师风优良,具备较高学术水平、较丰富实践经验,同时又具备一定管理能力和经验的专业技术人才作为院系领导的后备人才。在院系领导干部培训上,要促进干部培训常态化和系统化,不断丰富培训内容,拓展培训形式,提高院系领导的服务意识、业务素质和管理能力。

(三)再造人才培养流程以维持系统协同

有研究指出:“如果把学科建设作为一个过程,则实现学科育人功能的方法倾向于科学研究、队伍建设、国际交流等与人才培养的结合。”^[14]由此可见,如果将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视为一个整体系统,那么就需要将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协同的过程体系化、制度化,即进行人才培养流程再造。

1. 制定具有校本学科特色的人才培养目标

在制订人才培养目标方面,大学应严格执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市场的具体需求,结合学校学科方向和学科知识体系的优势特色,对人才培养目标中学生的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人格)等综合素质进行具有学校特色的结构化设计,要进一步细化专业人才培养的规格,明确专业人才的质量标准和

毕业要求。这是促进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过程协同的第一步,也是高质量人才培养的第一步,显得尤为关键。

2.设计与学科布局相得益彰的人才培养方案

在设计人才培养方案方面,要综合考量学校学科结构以及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具体情况,进行课程体系的优化组合。要采取有效措施,鼓励教师及时吸收科研和产业实践项目和成果,将之转化并融入课程体系之中。只有在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协同过程中,坚持将人才培养目标融入学科方向凝练、专业结构调整、学科团队建设、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对外交流等活动之中,才有可能打造出具有区域特色和学校优势的学科知识“蓄水池”,而且是拥有产业界和学科界双重源头的“一池活水”。

3.优化产教科教双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方面,大学要维系活动子系统的持续协同,实现教育、科技与人才“三位一体”融合发展,向内就要打通教育链、创新链、人才链,向外就要拓展对接产业链和工作世界(职业),从而构建起四通八达的“产业—专业—课程—学科”知识流动网络。具体要做到将人才培养融入教学、科研以及社会服务等学术活动中,持续深化产教科教双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具体要做到既提升教学活动的研究性,同时也要提增科学研究活动和社会服务活动的育人性。

(四)创生学科知识成果以促进系统协同

在知识成果维度上,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关联之处就在于能否促使教师的科研成果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教育教学资源,使得本科生的知识获取和学习体验得到充分支撑。因此,可通过提高教师知识能力、强化课程和教材建设等方式来达到促进系统协同的目的。

1.以学科团队建设为重点提升教师知识能力

在认识上,要重视教师知识能力的整体提升。教师是高校知识活动的发起者和主导者,其在知识的获取、吸收、整合、创新、传播、转化、应用等方面的能力水平对大学知识活动的繁荣、知识成果的丰硕和人才培养的成效均具有不可置疑的影响。唯有具备较强的整体知识能力,教师才有可能将学科知识成果转化为人才培养资源,转化为高质量的人才培养成效。在行动上,要优化管理运行机制,根据学校学科专业课程一体化规划,整合资源、凝练方向、形成合力,依托学

科点建设科研创新服务地方团队、依托本科专业建设专业团队、依托课程建设教学团队。通过引导教师参与“有组织”的学科团队建设,帮助青年教师加速“找到并确定自己的学科方向,加快其从‘菜鸟’开始成长和转型”^[9]。

2.以课程教材建设为抓手疏通知识流动网络

课程和教材是支撑大学本科教育教学的主要内容载体,是联系学科与专业之间的天然中介,是疏通“产业—专业—课程—学科”知识网络的关键所在。学校要加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强化激励导向制度供给,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制定具体的建设目标,明确各二级学院和基层学科组织的建设任务,聚合科研和产业服务项目和成果,鼓励和引导教师及时将最新科学研究的前沿或产业实践融入相关课程和教材体系。

综上所述,本研究聚焦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协同问题,试图厘清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理论关联,在构建一个二元归一的整体分析框架基础上,为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协同提出可能的策略选择。

参考文献:

- [1] 马廷奇.交叉学科建设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J].高等教育研究,2011,32(6):74.
- [2] 段红云.论学科建设的合力[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2(3):41-42.
- [3] 倪亚红,王运来.“双一流”战略背景下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实践统一[J].江苏高教,2017(2):8.
- [4] 李力.大学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互动的现实困境、历史逻辑与实践经验[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9(2):112.
- [5] 别敦荣.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J].大学与学科,2020,1(1):37-40.
- [6] 宣勇,方学礼.论本科教育中的学科责任[J].北京教育(高教),2020(6):13-14.
- [7] 马廷奇,王长喜.学科建设与本科教学改革[J].中国高等教育,2009(Z3):45.
- [8] 杜卫,陈恒.新建地方院校应走学科专业一体化建设之路[J].中国高等教育,2010(11):39-41.
- [9] 袁广林.学科专业一体化:新建本科高校学科建设策略[J].高校教育管理,2016,10(2):82-85.
- [10] 张海涛,邹波.应用技术型本科高校学科专业一体化路径

- 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16(17):60-63.
- [11] 付八军.论新建本科院校学科、专业与课程的一体化建设[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8):77-80.
- [12] 段红红,徐权.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科、专业与课程一体化模式的构建[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2,30(9):168-170.
- [13] 林杰,洪晓楠.论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的耦合整生:基于学科、课程、专业一体化的视角[J].教育科学,2019,35(5):61-66.
- [14] 马廷奇.一流学科建设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9(3):3-10,8.
- [15] 刘光成,唐贤清.一流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如何实现协同互动[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9,18(1):124.
- [16] 康翠萍.高校学科建设的三种形态及其政策建构[J].高等教育研究,2015,36(11):37.
- [17] FORTWENGEL J.Practice transfer in organizations:The role of governance mode for internal and external fit[J].Organization Science,2017,28(4):690-710.
- [18] 别敦荣.应用型高校的办学理念与建设路径[J].中国高教研究,2022(4):1-8.
- [19] NORTHOUSE P G.Leadership:Theory and Practice(6th edition)[M].Thousand Oaks,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 Ltd.,2013:26-45.
- [20] 刘振天.教学与科研内在属性差异及高校回归教学本位之可能[J].中国高教研究,2017(6):18-25.
- [21] 王凯,胡赤弟.“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创新人才培养绩效影响机制的实证分析:以学科—专业—产业链为视角[J].教育研究,2019,40(2):87,85-93.
- [22] 宣勇.论大学学科组织[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2(5):31.
- [23] 张旭.教学研究型大学学科专业一体化建设路径研究[D].沈阳:沈阳师范大学,2016:24-25.
- [24] 江月.教学研究型大学学科专业一体化建设研究[D].武汉:湖北大学,2018:39.
- [25] 周光礼,马海泉.科教融合:高等教育理念的变革与创新[J].中国高教研究,2012(8):21.
- [26] 宁焯,樊治平.知识能力:演化过程与提升路径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31.
- [27] 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EB/OL].(2018-10-08)[2023-03-23].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1810/t20181017_351887.htm.
- [28] 张元宝.地方高校产教融合的困境与出路:共生理论视域下问题的探讨[J].中国高校科技,2021(10):85.

(责任编辑:魏琛)

The Discipline Development and Talent Training in University: Theoretical Connection, Analysis Framework and Synergy Approach

CHEN Qingsen¹, YANG Tianping²

(1.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Evaluation,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2.College of Education,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4)

Abstract: The synergy between discipline development and talent training in university which merge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However, between discipline development and talent training, there are not only theoretical relations that supports and embraces with each other, but also practical problems that have different emphasis and competition with each other. According to systematic thinking and synergy position, the paper regards university discipline development and talent training as a whole system, and sets up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CIPP (Context-Input-Process-Product). From four aspects which are environment, organization, activity and knowledg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four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synergy between discipline development and talent training which are optimizing the schoo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perfecting discipline 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 re-engineering the process of talent cultivation, and creating knowledge achievements of discipline.

Key words: discipline development; talent training; synergy approach

大学生同伴排斥对学习投入的影响机制及自我肯定的干预作用

戚心洁^{1,2}, 薛罕艺³, 连榕²

(1.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2.福建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173;
3.福建省南平第一中学, 福建 南平 353000)

摘要:为考察大学生同伴排斥对学习投入的影响,探究执行功能和焦虑在其中的作用以及自我肯定的干预效果。研究1采用整群抽样法进行问卷调查,考察执行功能和焦虑在大学生同伴排斥和学习投入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研究2选取被试128名,采用回忆范式创设同伴“排斥—接纳”情境,进行自我肯定干预,再采用学习情境投射测量学习投入水平,验证同伴排斥对学习投入的影响和自我肯定的干预效果。结果表明:大学生同伴排斥可以负向预测学习投入,执行功能和焦虑在其中起链式中介作用;自我肯定干预能有效调节同伴排斥对学习投入的影响。这说明同伴排斥是降低学习投入的风险因素之一,执行功能和自我肯定干预能有效缓解同伴排斥对学习投入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大学生;同伴排斥;学习投入;执行功能;焦虑;自我肯定

中图分类号:B8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4)07-0097-07

学习投入是学生在学习中表现出的持续的、充满积极情感的状态,它不仅与个体的自我认知和身心健康积极相关^[1],还能很好地预测学习成绩、厌学倾向和辍学率^[2-3]。学习投入是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4],不良家庭气氛^[5]、不公平的课堂氛围^[6]、消极的师生关系^[7]均会负面预测学习投入水平。那么可以推测同伴排斥作为一种负面的人际关系同样也不利于青少年的学习投入。同伴排斥是指由于被某一团体或他人所排斥或拒绝,个人的归属需求和关系需求受到阻碍的现象和过程。^[8]根据需要威胁时间模型,经历排斥会降低个体在归属感、自尊感、控制感以及有意义的存在感等方面的感知,而这些基本心理需求的感知能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投入。^[9-10]虽然Li等人以我国西南地区青少年为研究对象,通过相关研究表明了被欺凌经验能显著负向预测学习投入水平。^[11]国外以受欺凌的青少年为对象开展的纵向研究更明确了同伴排斥对学习投入的负向预测作用。^[12-13]但是以上研究

仅考察了排斥经历对情绪或认知某一个方面的影响,并没有综合考虑认知和情感的变化。而执行功能作为人类的高级认知功能,在个体进行目标达成行为中起到了重要的调控作用。^[14]虽然已有研究表明执行功能中的工作记忆容量会因为经历排斥而显著降低^[15],但未关注执行功能中的其他部分受到排斥的影响。从认知—情感人格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青少年经历排斥之后,人格系统中的认知、情感单元将被激活,互相作用共同影响其学习投入。执行功能在个体的情绪调节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目前还没有从认知—情感的视角全面考量该问题。同时,由于同伴排斥的广泛性和隐蔽性,目前还没有较为有效且容易操作的干预方式,而自我肯定作为一种简单易行的增强自我价值感的方式已被证实具有提高自我整体性的积极作用。因此本次研究将综合探究同伴排斥与学习投入之间的认知(执行功能)—情感(焦虑情绪)变化路径,以期从消除不良环境因素的角度提升学习投入水平。

同伴排斥破坏了个体的归属感。从自我决定理论看来,个体会将有限的认知资源关注于恢复和提高归属感的途径中,造成认知功能狭窄,显然这会导致执行功能水平的降低。执行功能是个体在信息加工中,根

收稿日期:2023-12-07

作者简介:戚心洁(1989-),女,汉族,讲师,主要从事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据当前任务目标,通过对资源的调配,自上而下地对相关信息进行储存、计划和操控的过程。^[16]目前普遍认为执行功能由抑制控制、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组成。一方面,大量研究表明社会排斥会降低工作记忆的容量,阻碍抑制控制水平^[15];同时根据认知资源有限理论^[17]可以推测,经历排斥破坏了个体的自尊、归属感等基本需求。个体会消耗有限的认知资源用于恢复被破坏的基本需求,从而导致认知灵活性的降低。另一方面,认知控制理论认为,执行功能可以帮助个体调节注意力和自我控制水平,提高学习任务表现。^[18]已有研究发现抑制控制能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投入水平,工作记忆能有效调节焦虑对学业成绩的影响^[19],同时执行功能水平高的儿童拥有更强的学习能力和学业表现^[20-21]。故提出研究假设 1: 执行功能在同伴排斥和学习投入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从社会身份理论来看,自我认同和自尊心的建立基于他们所属的社会群体,大学生感知到被排除在群体之外是焦虑产生的主要原因。动机与投入理论认为,焦虑是个体不适应环境的表现,这种不适应感会产生抑制学习动机的效果,从而降低个体学习投入水平。以往的研究证实社交焦虑会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的学习投入水平。^[14]情感事件理论指出,个体所处环境中的事件会引发个体的情绪反应,而情绪反应对个体后续的特定行动具有决定作用,即形成“经历排斥—产生焦虑—学习投入降低”的反应模式。因此提出研究假设 2: 焦虑情绪在同伴排斥和学习投入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本质上是一种认知控制。^[22]较高的执行功能有助于个体高效率地应对现实生活中的困难情境,减少负性情绪的产生。^[23]执行功能作为人类的高级认知功能,它在同伴排斥和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极大可能是通过调节由排斥产生的焦虑情绪体现的。执行功能的 3 个子成分均被证实参与了个体情绪调节作用,其中抑制控制和工作记忆被证实能正向预测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24];抑制控制水平高的个体在情绪背景的干扰中有更好的回忆表现^[25];长或短期的工作记忆训练均能改善个体的情绪调节水平^[26];认知灵活性能促进个体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与转换,并且在困难情境中起到了降低消极情绪的作用^[27]。因此提出研究假设 3: 执行功能负向显著预测焦虑情绪,且在同伴排斥和学习投入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

在建构同伴排斥对学习投入的影响路径之后,如何通过这一路径缓解同伴排斥危害是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同伴排斥威胁青少年的自我整体性,破坏人类基本的归属需要和自我评价。而自我肯定对于恢复个体的自我整体性有着广泛的积极作用。^[28]自我肯定理论认为,自我肯定能够为个体提供对于自我认识和可利用资源更广阔的视角,降低威胁事件对自我完整性的负面影响,帮助个体重新获得自我认同和归属感。^[29]目前虽然没有直接的因果证据表明自我肯定在不良情境下对学习投入行为具有保护作用,但研究表明自我肯定干预能显著长期提高个体的自尊水平并促进学业表现^[30-34],能有效缓解消极情绪,以及改善挫折情境下的执行功能水平^[28]。综上,提出研究假设 4: 自我价值肯定在同伴排斥与学习投入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经历排斥后采用自我价值肯定干预的大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显著高于未采用自我肯定价值干预的大学生。

一、同伴排斥对学习投入的影响路径研究方法

(一) 研究对象

选取福建省某两所综合性大学学生共计 1300 名,回收有效问卷 1146 份,有效率为 88.15%。其中男生 623 人(54.4%),女生 523 人(45.6%)。

(二) 测量工具

1. 大学生社会排斥问卷

采用吴惠君编制的《大学生社会排斥问卷》。^[35]问卷采用 5 点计分,从 1 分到 5 分,分数越高表示排斥程度越高。共计 19 个项目。本次研究中 Cronbach's α 系数是 0.96。

2. 焦虑自评量表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该问卷共有 20 题,采用 4 级评分法,分数越高代表焦虑越严重。该量表在本次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是 0.912。

3. 成人执行功能自评量表

采用在中国青少年中验证了信效度的成人执行功能自评量表。^[36]量表包括 14 个项目,使用 5 点计分(1 完全符合-5 完全不符合)。量表分为工作记忆和抑制能力两个维度,得分越高,表示个体执行功能相应成分表现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

为 0.868。

4.学习投入量表

采用方来坛等人修订的中文版学习投入量表。^[37]共 17 道题目组成,分为活力、奉献、专注 3 个维度。采用 5 点计分法,分数越高代表学习投入越多。在本次研究中 Cronbach's α 系数是 0.946。

(三)结果

采用 SPSS26.0 对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信度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及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数据的管理和分析。

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发现,60 个项目中,共提取出 8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公共因子,且第一个公共因子解释了变异量的 26.89%,小于 40%的临界值,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相关性分析

对同伴排斥、焦虑、执行功能和学习投入四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探索。相关分析如表 1 所示,接下来通过中介效应进一步探究变量间的作用机制。

表 1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n=1146)

Tab.1 The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each variable (n=1146)

	M	SD	1	2	3	4
1.同伴排斥	35.17	14.65	1			
2.焦虑情绪	39.26	7.53	0.19**	1		
3.执行功能	45.28	9.63	-0.42**	-0.30**	1	
4.学习投入	53.03	13.84	-0.24**	-0.51**	0.31**	1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下同

3.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检验中介模型的方法,首先采用 SPSS26.0 的宏程序 process3.5(modle6)检验执行功能和状态焦虑的链式中介作用。结果显示:同伴排斥显著负向预测执行功能($\beta = -0.41, t = -15.41, p < 0.001, 95\% CI = [-0.31, -0.24]$),同伴排斥显著正向预测状态焦虑水平($\beta = 0.08, t = 2.59, p < 0.001, 95\% CI = [0.01, 0.07]$),同伴排斥显著负向预测学习投入($\beta = -0.09, t = -3.53, p < 0.001, 95\% CI = [-0.14, -0.04]$)。执行功能显著负向预测焦虑水平($\beta = -0.27, t = 8.75, p < 0.001, 95\% CI = [-0.26, -0.16]$),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投入($\beta = 0.13, t = 4.74, p < 0.001, 95\% CI = [0.11, 0.27]$);焦虑情绪显著负向预测学习投入($\beta = -$

$0.44, t = -16.67, p < 0.001, 95\% CI = [-0.90, -0.71]$)。

其次,采用 Bootstrap 法(5000 次抽样)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2,三条路径的 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说明三条路径的中介效应均显著。

表 2 执行功能和自尊的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Tab.2 Chain mediation analysis of executive function and self-esteem

	Effect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相对效应
总效应	-0.14	0.02	-0.18	-0.09	100%
同伴排斥-执行功能-学习投入	-0.06	0.01	-0.08	-0.03	39.85%
同伴排斥-执行功能-焦虑情绪-学习投入	-0.05	0.01	-0.07	-0.03	35.12%
同伴排斥-焦虑情绪-学习投入	-0.04	0.02	-0.07	-0.003	25.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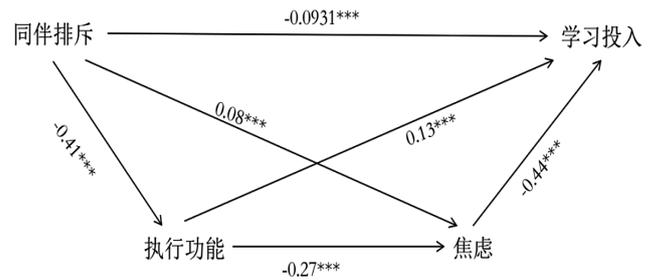


图 1 执行功能和焦虑在同伴排斥和学习投入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Fig.1 Chain mediation effect of executive function and anxiety between peer rejection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研究 1 初步证实了同伴排斥对学习投入的影响及其内部机制,接下来通过研究 2 进一步对同伴排斥对学习投入的因果关系进行验证,最后基于自我肯定理论,探究自我价值肯定的调节作用。

二、自我肯定的干预作用检验

(一)研究对象

使用 G*power 3.1 软件计算实验所需样本量,在显著性水平=0.05 且达到中等效应($f = 0.25$)时,预测达到 80%统计效力的总样本量为 128 名。在福建省某市综合大学内招募被试 167 名,其中男生 93 名,女生 74 名,被试平均年龄为 19 岁(SD=1.08)。将被试随机分入排斥肯定组(共 42 人,男 21 人,女 21 人)、排斥非肯定组(共 34 人,男 17 人,女 17 人)、接纳肯定组(共

42人,男22人,女20人)、接纳非肯定组(共49人,男33人,女16人)。

(二) 实验设计

采用2(情境:排斥、接纳) \times 2(肯定条件:自我肯定、非自我肯定)的被试间设计,因变量是学习投入意愿。

(三) 实验程序和材料

1. 同伴排斥感的操纵和核查

改编自 Baumeister R F.的想象范式^[38],要求被试结合图片进行10分钟的写作。排斥组被试想象以下场景:在一项团体活动中,其他同学之间有说有笑,但是很少与你交流,将你排挤在外,当你向他们打招呼时,他们也对你爱理不理、视而不见。处于这样的场景中,请描述一下你的情绪体验和内心感受。接纳组被试想象以下场景:在一项班级活动中,你与其他同学之间有说有笑,你们彼此交流自己的观点,同学非常认可你、赞赏你的付出,在活动过程中,你们相处融洽。处于这样的场景中,请描述一下你的情绪体验和内心感受。

完成想象任务后,所有被试需要回答两个问题“在上面的场景中,你是否感到被排斥?”“在上面的场景中,你是否感到被忽视?”作为实验操纵的有效性检验。两个问题均为7点评分(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分数越高,被排斥感越强。本研究中两个问题的相关系数 $r=0.973(p<0.001)$ 。

2. 自我价值肯定干预

采用 Cohen 和 Sherman 开发^[29],并已经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应用的自我肯定范式^[30]。自我肯定组要写出自己认为最重要的6种价值观并进行排序,以及为什么重要的原因。非自我肯定组需要写出最不重要的6种价值观并进行排序,以及为什么不重要的原因。

3. 学习投入的测量

采用 Destin 和 Oyserman 对学习投入的测量方式^[39],即计划每天花费在学习和完成作业上的平均时间。为了避免社会赞许性效应的影响,借鉴情境投射方式的方式^[40],材料以第三人称视角展开:今天是星期五,傍晚放学陈东走在校园里,下午的太阳暖暖地照在身上,和煦的微风又轻又柔,空气中有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青草味。有的同学在场打球,有的同学教室里讨论问题。如果你是陈东,明天星期六你准备花多少时间在学习和做作业上?0—7小时请选择。选择分数越高代表学习投入水平越高。

(四) 结果

1. 同伴排斥有效性检验

为了检验同伴排斥情境和接纳情境的操纵是否成功,对排斥组和接纳组的排斥体验情绪和忽视体验情绪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排斥组的排斥情绪体验得分($M=5.55,SD=1.18$)显著高于接纳组($M=1.34,SD=0.60$), $t(165)=29.72,p<0.001$ 。排斥组的忽视情绪体验得分($M=5.59,SD=1.31$)显著高于接纳组($M=1.35,SD=0.60$), $t(165)=27.62,p<0.001$ 。说明同伴排斥感操纵成功。

2. 自我肯定的调节效应检验

对学习投入的得分进行2(情境:排斥、接纳) \times 2(肯定条件:自我肯定、非自我肯定)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情境的主效应显著, $F(1,166)=11.08,p=0.001,\eta^2=0.06$,排斥情境的学习投入($M=3.32,SD=0.21$)显著低于接纳情境($M=4.25,SD=0.19$),表明同伴排斥能负向预测学习投入。肯定条件的主效应显著, $F(1,166)=18.71,p<0.001,\eta^2=0.10$,自我肯定组的学习投入($M=4.39,SD=0.19$)显著高于非自我肯定组($M=3.18,SD=0.20$);情境与自我肯定的交互作用显著, $F(1,166)=10.52,p=0.001,\eta^2=0.06$ 。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排斥情境下,自我肯定组在学习投入的得分($M=4.38,SD=1.68$)上显著高于非自我肯定组($M=2.26,SD=1.50$), $p<0.001$,在接纳情境下,两组没有显著性差异, $p>0.05$ (见图2)。这说明自我肯定能显著调节同伴排斥情境中大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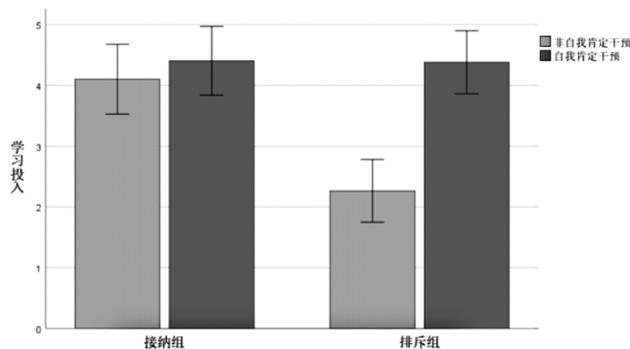


图2 不同条件下的学习投入意愿

Fig.2 Learning engagement willingness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三、讨论

(一) 同伴排斥与学习投入的关系

研究1、2分别通过问卷调查和实验的形式探讨

了大学生同伴排斥与学习投入之间的因果关系,为同伴排斥负向预测学习投入这一结论提供了较为充分的实证支持。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再次验证了学习投入的社会文化情境发展综合模型。自尊是青少年学习的内在动力,同伴排斥破坏了青少年的自尊水平,导致个体学习投入的减少。同时,一方面根据有限认知资源理论,个体为了应对同伴排斥带来的消极情绪,会消耗有限的自我控制资源,而学习是需要个体应用自我控制来实现长时间专注的一项任务。故自我控制资源的减少会削弱学习投入的水平。另一方面从行为主义的视角来看,同伴排斥主要发生在学习场所,这就将学习与被排斥的消极情感体验联结起来,形成条件反射。只要大学生处于发生排斥的学习场景中,就会引发负面情绪的重复体验,从而阻碍他们的学习行为。

(二) 执行功能和焦虑的中介作用

研究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初步明确了执行功能在同伴排斥和大学生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1、假设2。研究结果说明同伴排斥会降低个体的执行功能水平,对焦虑情绪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并且通过影响执行功能和焦虑情绪能显著负向预测学习投入水平。研究结论厘清了同伴排斥造成的认知、情感变化路径,验证了认知情感人格系统理论,说明同伴排斥作为破坏个体基本需求的威胁事件会通过减低个体的执行功能从而引发个体对焦虑情绪的调节失败,继而产生消极情绪降低学习投入。其中执行功能对焦虑情绪的调控,也体现出其在困难情境中对个体的保护作用。虽然同伴排斥会降低大学生的执行功能,但同时执行功能又会发挥自上而下的调控作用,从而有效降低焦虑水平,继而缓冲同伴排斥对学习投入的不良影响。再次体现了执行功能在维护青少年自我整体性和心理健康水平中的重要性。^[41]虽然社会、学校也在积极预防排斥行为发生,但由于其具有隐蔽性和模糊性,寻找能应对排斥行为的个体积极因素也显得尤为重要。经历排斥的个体并不只是被动地承受痛苦,而是能主动调动认知资源应对威胁。这也提示,教育者在处理诸如同伴排斥、霸凌行为的时候,不仅要注重对排斥者的教育和监管,同时要帮助被排斥者提高执行功能的水平,这不仅可以帮助被排斥者主动寻求避免排斥的方式,同时也能够有效调节经历排斥之后的消极情绪,更快恢复正常的认知情绪状态

投入学习生活中。日常教育者或者教育相关机构部门可以通过如工作记忆训练^[42-43]、体感运动训练^[44]等认知训练方式提高执行功能,从而帮助青少年更好地应对同伴排斥带来的伤害。

(三) 自我肯定干预的调节作用

研究2证实了自我肯定在同伴排斥情境中对于大学生学习投入的保护作用。在经历排斥,采用自我肯定进行干预之后,大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和接纳组相比没有显著差异。这一结论验证了自我肯定理论的效用,也为如何有效缓解青少年经历同伴排斥带来的伤害提供了有效、可行、简便的现实策略。研究结果表明:自我价值肯定能很好地帮助大学生在人际困难情境中恢复自我完整性,提高学习动机水平。除了能缓解同伴排斥对学习投入的破坏以外,自我肯定也被证实可以有效缓解诸如家庭人际冲突、自我危机事件,群际冲突等许多社会和个人问题^[24],具有较大的实际使用价值。今后可将其应用于帮助大学生缓解由人际交往产生的焦虑等情绪问题上。

四、不足与展望

虽然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均表明自我肯定会提高执行功能水平并降低焦虑情绪,但是在本次研究中仅确定了排斥和学习投入之间的因果性以及自我肯定在两者之间的调节作用,并没有确定自我肯定在“排斥—执行功能”和“排斥—焦虑”之间的调节作用。接下来的研究将通过实验完善这一模型。

参考文献:

- [1] 周爱保,胡砚冰,刘锦涛,等.青少年社交焦虑与学习投入的关系:意向性自我调节的解释作用及其年龄差异[J].心理发展与教育,2022,38(1):54-63.
- [2] 吴佳桢,傅海伦,张玉环.感知社会支持与学生学业成就关系的元分析:学习投入的中介作用[J].心理科学进展,2023,31(4):552-569.
- [3] 向祖强,马芳芳,周森,等.学习动机对学习倦怠的影响:学习投入的中介作用和个人成长主动性的调节作用[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2,30(9):1394-1400.
- [4] WANG M T,DEGOL J L,HENRY D A.An integrative development-in-sociocultural-context model for children's engagement in learning[J].American Psychologist,2019,74(9):1086-1102.

- [5] 李其容,杨艳宇,李春萱.父母冲突、青少年日常自我效能和学习投入:日常消极情绪与日常沉思在父母冲突调节效应中的中介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23,39(2):236-246.
- [6] 王怀勇,郑意颖.课堂公平对高中生学习投入的影响及其机制:链式中介模型[J].心理科学,2022,45(3):591-598.
- [7] 谭丽苹,李晴,郭成.师生关系对留守儿童学习投入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心理与行为研究,2022,20(6):782-789.
- [8] 杜建政,夏冰丽.心理学视野中的社会排斥[J].心理科学进展,2008,16(6):981-986.
- [9] 刘在花.成就目标定向对中学生学习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习投入的链式中介作用[J].教育研究与实验,2022(5):98-103.
- [10] DEGOL J L,BACHMAN H J.Early self-control and sustained attention problems:Associations with youth achievement,motivation,and engagement[J].Cognitive Development,2023(65):101290.
- [11] LI L,CHEN X,LI H.Bullying victimization,school belonging,academic engagement and achievement in adolescents in rural China:A serial mediation model[J].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2020(113):104946.
- [12] VVARELA J J,MUÑOZ G J,RESCHLY A,et al.Bullying behavior and school bonding for predicting student engagement among Chilean adolescents[J].Journal of School Violence,2022,21(3):327-341.
- [13] BUHS E S,LADD G W,HERALD S L.Peer exclusion and victimization:Processes that medi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peer group rejection and children's classroom engagement and achievement? [J].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2006,98(1):1-13.
- [14] DIAMOND A,LING D S.Review of the evidence on,and fundamental questions about,efforts to improve executive functions,including working memory[J].2020,12(7):12-21.
- [15] 杜肖丽,CODY D,徐梦思,等.社会排斥对视觉工作记忆容量的影响[J].心理科学,2023,46(1):11-18.
- [16] MILLER E K,COHEN J D.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prefrontal[J].Annu Rev Neurosci,2001,24(1):167-202.
- [17] BAUMEISTER R F,VOHS K D.Strength Model of Self-regulation as Limited Resource:Assessment,Controversies,Update[M]//Self-regulation and Self-control.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18:78-128.
- [18] WANG M T,BINNING K R,Del Toro J,et al.Skill,thrill,and will:The role of metacognition,interest,and self-control in predicting student engagement in mathematics learning Over Time[J].Child Development,2021,92(4):1369-1387.
- [19] 张小聪,周仁来.考试焦虑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工作记忆容量的调节效应[J].中国特殊教育,2016(12):49-53.
- [20] 祝孝亮,赵鑫.执行功能在不同年级儿童数学能力中的作用[J].心理学报,2023:1-15.
- [21] DIESTEL S,SCHMIDT K H.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gnitive control deficits in the link from emotional dissonance to burnout symptoms and absenteeism[J].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2011,16(3):313.
- [22] STAWSKI R S,ALMEIDA D M,LACHMAN M E,et al.Fluid cognitive ability is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exposure and smaller reactions to daily stressors[J].Psychology and Aging,2010,25(2):330.
- [23] 刘芳,霍瑞,韩铖铖,等.执行功能对个体情绪调节策略使用倾向和调节效果的影响[J].心理与行为研究,2022,20(3):382-389.
- [24] ALAMOS P,WILLIFORD A P,DOWNER J T,et al.How does inhibitory control predict emotion regulation in preschool? The role of individual children's interactions with teachers and peers[J].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22,58(11):2049.
- [25] GUO X,LI Y,ZHANG Q,et al.Weakening of recognition memory caused by task-irrelevant emotional encoding context can be modulated by individuals' inhibitory control[J].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18(134):201-209.
- [26] LONG Q,HU N,LI H,et al.Suggestion of cognitive enhancement improves emotion regulation [J].Emotion,2020,20(5):866-873.
- [27] AKDENIZ S,GÜLTEKİN AHÇI Z. The role of cognitive flexibility and hop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neliness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J].Educational an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ist,2023,40(1):74-85.
- [28] WALTON G M,WILSON T D.Wise interventions:Psychological remedies for social and personal problems [J].Psychol Rev,2018,125(5):617-655.
- [29] COHEN G L,SHERMAN D K.The psychology of change:Self-affirmation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J].Annu Rev Psychol,2014,65:333-371.
- [30] 杨宝琰,柳玉姣.元刻板印象威胁对县城农村高中生学校归属感的影响:身份认同整合和自我肯定的作用机制[J].心理发展与教育,2023(5):645-653.
- [31] BORMAN G D,CHOI Y,HALL G J.The impacts of a brief middle-school self-affirmation intervention help propel African American and Latino students through high school[J].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2021,113(3):605.
- [32] FOTUHI O,EHRET P J,KOCSIK S,et al.Boosting college prospects among low-income students:Using self-affirmation

- to trigger motivation and a behavioral ladder to channel it[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22,122(2):187.
- [33] SHERMAN D K,HARTSON K A,BINNING K R,et al.Deflecting the trajectory and changing the narrative:How self-affirmation affect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motivation under identity threat[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13,104(4):591.
- [34] BINNING K R,COOK J E,PURDIE-GREENAWAY V,et al.Bolstering trust and reducing discipline incidents at a diverse middle school:How self-affirmation affects behavioral conduct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adolescence[J].*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2019(75):74-88.
- [35] 吴惠君,张姝玥,曾宇倩.大学生社会排斥问卷的编制与信效度检验[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3,21(12):1829-1831.
- [36] 刘海玲,郭绍青,贺相春,等.成人执行功能自评量表在中国青少年中的信、效度检验[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2,30(5):1170-1173.
- [37] 方来坛,时勤,张风华.中文版学习投入量表的信效度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8,16(6):618-620.
- [38] PARK J,BAUMEISTER R F.Social exclusion causes a shift toward prevention motivation[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2015(56):153-159.
- [39] DESTIN M,OYSERMAN D.Incentivizing education:Seeing schoolwork as an investment,not a chore[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2010,46(5):846-849.
- [40] 李沛沛,黄程,寇彧.社会排斥与个体助人意愿:归属感需求的调节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7,25(4):597-602.
- [41] 齐玥,杨国春,付迪,等.认知控制发展神经科学:未来路径与布局[J].*中国科学:生命科学*,2021,51(6):634-646.
- [42] 贾世伟,齐丛丛,陈乐乐,等.工作记忆负荷对反馈加工过程的影响:来自脑电研究的证据[J].*心理学报*,2022,54(3):248-258.
- [43] 彭婉晴,罗韩,周仁来.工作记忆刷新训练改善抑郁倾向大学生情绪调节能力的 HRV 证据[J].*心理学报*,2019,51(6):648-661.
- [44] 盖笑松,许洁,闫艳,等.体感游戏促进儿童的执行功能:运动强度和认知参与的作用[J].*心理学报*,2021,53(5):505-514.

(责任编辑:黄超)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Peer Exclusion on University Students'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the Intervention Role of Self-affirmation

QI Xinjie^{1,2}, XUE Hanyi³, LIAN Rong²

(1.School of Psycholog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17;

2.Fujian Chuanzheng Communications College, Fuzhou, Fujian 350117;

3.Fujian Nanping No.1 Middle School, Nanping, Fujian 353000)

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eer rejection on learning engagement in university student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executive function and anxiety in it, and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self-affirmation. Study 1 used the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to investigate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executive function and anxiety on adolescent peer rejection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Study 2 used the recall paradigm to create peer exclusion-acceptance situations, self-affirmation interventions, and measured learning engagement levels through learning context projection,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peer rejection on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the effects of self-affirmation interventions. Results shows peer rejection can negatively predict university students' learning input, and executive function and anxiety play a chain mediating role in it. Self-affirmation interventions were effective in regulating the impact of peer rejection on learning engagement. Peer rejection is one of the risk factors for reducing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executive function and self-affirmation interventions can effectively buffer the negative impact of peer rejection on learning engagement.

Key words: university students; peer rejection; learning engagement; executive function; self-esteem; self-affirmation

数字化转型下 SECI 多模态教学模式实践

张姗姗¹, 陈欣¹, 方小枝²

(1.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财经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51; 2.合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 高校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在于教学模式的转型。传统教学模式存在诸如数字资源建设投入大、学生学习动力不足、思政元素融入度低、教学评价不精准等痛点, 基于 SECI 理论和多模态教育理论, 采用案例、问卷调查等方法, 对《数智税费计缴》课程进行了研究。遵循经济性和教学效果最大化原则, 形成了互动—反馈—点评—测试 SECI 多模态教学模式, 提出整合教学资源进行数字化和模态化改造、提升教师数字素养以及完善教学与互动设计、精准数字化教学评价等建议, 以为高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数字化; SECI; 多模态教学模式; 教学实践

中图分类号: G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109(2024)07-0104-06

国家“十四五”规划和党的二十大报告等明确“加快数字化发展, 建设数字强国”“推进教育数字化”战略, 2023 年是实施教育部“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关键年。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 增强其适应性就要大力发展适应新技术和产业变革需要的职业教育。高职院校数字化转型是运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思维和数字化方法来实现“教学转型”的过程样态^[1]。教学是高职院校的中心工作, 更是落实教育数字化转型广度和深度、增强适应性的“主阵地”场景。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在“转型”, 创新教学模式是重构教与学关系与教学过程数字化, 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教学的重要节点。国内外学者在教学模式如混合式教学模

式、个性化教学模式和虚拟仿真教学模式等领域已有诸多研究, 教学模式仍需创新, 使其更加符合高职教学的语境。随着数字技术与数据技术的综合实践, 特别是慕课技术的大规模推广, 多模态教学模式日趋常态化。本文拟以“数智税费计缴”课程数字化转型为例, 阐述 SECI 多模态教学模式, 以期同行借鉴参考。

一、SECI 理论及多模态教学

1995 年, 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于在 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 中提出知识创造就是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互相作用、互相转化的过程, 历经“社会化(Socialization)、外显化(Externalization)、组合化(Combination)、内隐化(Internalization)^[2]过程, 每完成一次 SECI 循环, 知识创新就完成一次螺旋上升。多模态教学是基于运用眼、耳、手等多种感官, 采用图像、声音、语言、动作、表情、文字等多种手段和视觉、触觉、嗅觉、听觉等多种符号模态来进行交际的话语分析理论, 强调语言以外的符号同样具有意义, 且能表达意义^[3]。国外, Cazden 和 Cope^[4]提出“多元识读教学法”, Stein^[5]提出“多模态教学”法; 国内, 张德禄^[6]、赵春荣^[7]、童慧^[8]和陆吉健等^[9]探讨了多模态教学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和智慧教学方式。随着 ChatGPT、VR/MR、自然语言处理和生理信息识别等技术的推广, 学

收稿日期: 2024-02-25

基金项目: 安徽省高等学校质量工程项目(2022jyxm206); 安徽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22AH052661); 安徽省提质培优计划慕课项目(任务 50);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校级质量工程项目(2021xkcsz03);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校级质量工程项目(2022xjxyj06)。

作者简介: 张姗姗(1981-), 女, 汉族, 讲师, 主要从事创新能力方面的研究。

通讯作者: 陈欣(1979-), 男, 汉族, 副教授, 主要从事教学法方面的研究。

习资源更加容易生成多模态资源^[9],多模态交互更加自然化和具象化^[9];多模态评价更加精准化和多维度化^[9]。高职教学数字化转型为 SECI 理论教学应用和多模态教学模式的实施提供了更多的空间。^[9]本文基于数字化转型、SECI 和多模态教学理论,融合高职学生学情特点,构建一种知识转换过程的 SECI 多模态教学模式,以期提高学习效果。

二、数字化转型 SECI 多模态教学模式内涵

SECI 多模态教学模式包括 4 个环节,一是社会化(Socialization)。通过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以及师生与外界的互动,利用社交化的方式共享知识和经验,建立相互信任和沟通的关系,形成群体智慧。二是外显化(Externalization)。将隐性知识(如经验、技能和价值观等)转化为外显形式(如文档、PPT 和视频等),使其更容易被理解和共享。三是组合化(Combination)。将不同来源的知识进行整合和组合,产生新的知识或信息,例如在数字化课堂中,可以将不同的资源和方法结合起来,创造出更加丰富的教学内容。四是内化(Internalization)。将外显形式的知识或信息转化为个人的隐性知识,使其可以应用于实际问题解决中,并反思自身的学习过程,形成长期的学习记忆和习惯。通过这 4 个环节的循环,高职课程数字化转型 SECI 多模态教学模式可以不断地促进知识的转移和共享,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思维能力,同时也为教师提供更多的教学资源和方法。

三、数字化转型 SECI 多模态教学模式建构

(一)SECI 多模态教学设计

1. 设立以学生为中心、教师点评引导的 SECI 设计理念

秉持校企深度融合的理念,坚持运用终身学习的教育观、工作任务导向的教学观、能力本位的质量观和校企合作的开发观。遵循“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职业能力培养为目标”的设计理念,以满足学生未来职业需要为原则,以数字化课程资源和多模态学习平台,采用自主性学习、过程性学习和体验式学习,通过

互动—反馈—点评—测试的教学环节设计,辅以拓展的专业资源库、技能大赛资源、1+X 资格证书资源和多阶段多样化的个性化学习资源设置,形成以学生为中心、教师点评引导的 SECI 教学设计理念。

2. 均衡经济性和教学效果原则,整合多模态数字化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是教与学的基石。改造、重组或重构传统的教学资源,开发电子文本、图像、声音、动画、视频等多模态教育资源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途径。模态资源不同,供用特征和意义潜势不同,如视频资源易于引起高职学生学习兴趣,但容易遗忘。文字资源较难理解,但一旦内化则不易遗忘。综合高职院校数字化转型进步不一,模态选择经济性原则和教学效果最优化原则是 SECI 多模态教学模式实施的基础。教学中常用的模态有图片模态、图表模态、书面语模态如文字、口语模态如口气、发音、声音和声调、音频模态、视频模态如动画、微课、肢体动作模态如手势、距离、表情、身势和视线等^[10]。实践中往往是多种模态的组合,如微课视频中有口语、文本、视频、音频、图表等。

3. 组织多模态互动,提升教学效果

互动是 SECI 多模态教学设计的关键。互动有如问答、讨论、访谈、演讲、角色扮演和报告展示等多种方式,互动主体可以是师生间、学生间、小组间和人机间等互动,也可以是课前课后的线上互动和课中的线下互动,还可以是学习通、雨课堂、智慧学等数字化平台的互动,以及 QQ 群、微信群等互动。学生在互动过程中,调用不同的多种感官模态组合进行学习和沟通,促进学习效果最大化。

4. 融入多模态思政元素,落实三全育人目标

课程思政是落实中央“立德树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SECI 多模态教学模式可把如依法纳税、诚实守信等思政元素以多模态的形式自然引入课程,力求在“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中影响学生,比如动画视频学习中图像+声音模态更宜“入心入脑”。

(二)SECI 多模态教学实施过程

1. 课前自主学习,完成简单任务问卷调查,组织线上 SE 多模态教学

教师通过数字化平台发布学习任务,如观看微课

或慕课视频学习等任务,这里包含了声音、图像、图表等非语言模态。其后,学生自主学习 PPT 课件、教案、讲义等文字资料,遇到比较难懂的问题可选择线上与教师、学生或小组进行口语、声音、文字等多模态互动讨论。然后,教师通过发布单选题、多选题、计算题、案例分析等简单任务方式对学生自主学习效果进行反馈,同时为课中教学完成定量大数据采集。最后,教师通过发布问卷调查完成重点、难点和困惑知识点、技能点的梳理,为课中教学提供定性数据,定量数据和定性数据的采集为过程性评价建立基座。学生通过学习微课或慕课视频,利用多种学习工具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并记录学习过程中的问题^[1]。视频学习、自主学习分组讨论是互动(S),简单任务和问卷调查是反馈(E)。

2. 课中实施 SECI 多模态教学循环,内化知识技能素养

教师首先对课前任务完成情况和学习效果进行点评(C),然后发布练习测试(I),通过对比课前简单任务反馈结果和课中练习测试结果,教师可以判断课前预习效果,再次调整课中重难点和关键知识技能点。至此,课前完成 SECI 多模态教学的第一次循环。随后,教师对课前学习中重难点问题,导入案例、视频、动画等课题学习任务,最大化刺激其器官接收知识,提高学生学习和主动性。^[1]创设良好的讨论环境,学生分组讨论,可选择师生、生生、组组等方式进行互动,提高各组讨论的有效性。小组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增加了组员之间的团队合作能力和凝聚力。^[1]互动(S)中,采取视频、动画等模态学习方式,符合高职学生学习特点,如偏好视频学习,迷恋高科技产品,互联网适应能力强,软件应用学习力强,喜欢体验式学习,乐完成过程性任务等,易于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具象化认知,增强体验感。师生、生生、组组等口语模态互动有助于培养学生团队协作能力,提升沟通交流能力和过程性学习能力。教师通过提问、小组代表讲解、平台提交讨论结果、制作表格、图片、视频等多模态方式完成反馈。反馈(E)中,学生提供的多种多样的模态学习结果,知识—技能—素养完成了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习效果为中心、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的转换,同时提升了高职学生软件

工具平台的操作能力,培养了学生严谨、诚信、规范的职业品质和爱岗敬业的劳动态度,提高了学生数字素养,同时为教师下一步的点评提供学习效果的数据,为教师再次修正重难点提供了判断基础。教师根据反馈结果进行点评。点评(C)中,教师重点阐述学生过程性学习中薄弱环节和问题,引导学生推导出正确答案,养成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习惯。教师多采用口语、肢体动作模态、文字等模态,线下口语、肢体动作模态增强了教学临场感和认知临场感,促进学生精神集聚,提升了学生学习专注力和学习效果。PPT、WORD 等文字模态学习是视频学习向文字学习转换的独有途径设计,促进了学生知识和技能具象化向抽象化转换、显性知识向隐形知识转换、学生知识和技能学习顿悟的迸发。最后教师发布练习进行测试学习效果。测试(I)中,学生可通过数字化平台提交练习答案,教师根据数字化平台数据评判学生学习效果,为下一个互动—反馈—点评—测试教学循环奠定基础。测试中主要应用了文字(文本)、图表等模态,学习效果是隐形知识显性化的结果,增进学生荣誉感、获得感,培养了学生求真务实、精益求精、开拓创新的工匠精神,提升了学生数字素养的科学精神。至此,完成了第二个完整的 SECI 多模态教学循环。教师再导入新的案例、视频等课题,进入下一个互动—反馈—点评—测试多模态教学循环。最后,课中小结,发布课后拓展任务和要求。

3. 课后完成拓展任务问卷调查,组织线上 SECI 多模态教学

教师数字化平台发布拓展任务和学习要求,学生可通过自主学习或师生、生生、组组等方式进行讨论互动(S),再通过平台把讨论结果反馈(E)给教师。教师通过平台对拓展学习情况进行点评(C),然后发布分层练习或测验(I)。学生自主选择对应难度层次的作业或练习。发布拓展学习问卷调查,测试学生学习效果,采集定性化数据。数字化平台完成课后拓展任务的学习数据的采集。

综上,课前一课中—课后过程,课前课后是自主性学习,课中是过程性学习,实训课程是体验式学习,教师与学生通过互动—反馈—点评—测试多模态教学循环实现知识—技能—素质的显性—内化。具体而

言,教师发布学习任务,学生先通过“S:互动(Socialization,潜移默化模式)”实现知识“社会化”,形成创始场;又通过“E:反馈(Externalization,外部明示模式)”展示成果完成知识“外在化”,形成对话场;再通过教师“C:点评(Combination,汇总组合模式)”完成知识“组合化”,形成系统化场;后通过“I:测试(Internalization,内部升华模式)”完成知识“内隐化”,形成练习场,终达成学生“隐性知识—显性知识—隐性知识”内螺旋上升。模态选择遵循了视频动画学习向文字学习模态的转换的规律,实现了具象化向抽象化的转换,也是学生学习顿悟的过程。不同模态学习资源和学习工具的协调使用不仅增加了学习的趣味性^[1],符合高职学生特点,更能调动学生不同感官促进知识内化,提高学生学习的专注度和持久性^[1]。教学中,单一模态资源,课程思政元素融入难度较大,多模态教学资源,思政元素融入角度和融入点较多,学生数字化能力和素养目标更宜达成,更能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激励学生更加努力地学习。线上线下协同配合,提高了 SECI 多模态教学模式适应性,符合经济性原则。数字化平台课前一课中—课后,线上一线下一线全过程采集教与学的效果,输出即时性符合学生学习效果最大化原则,构建“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教学模式,实现教学全过程、全环节的数字化转型。

(三)SECI 多模态数字化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是诊断、调控和检验教学的有效途径。^[10] SECI 多模态教学秉承经济性原则和学习效果最大化原则,制定了“数据采集标注标准”“评价权利分配模型”“综合素养评价”等,有利于大数据驱动的精量化教与学动态评价机制的实现。数据采集标注标准制定主要针对学生任务完成效果测度,评价标准中主要包括了传统的文字、图表模态、图片模态、动画视频模态、音频模态及微课视频模态,但并不包括如表情、视线、手势、身势和距离^[10]等肢体动作模态,而声音、发音、口气和声调等口语模态等数据的采集,提高了 SECI 多模态教学在各高职院校的適切性,有利于现有资源环境下该教学模式的推广。综合素养评价主要包括过程性评价、终结性评价和增值性评价。过程性评价成绩一般不低于 50%,由课前预习、课中探究和课后拓展的简单任务、典型任务和拓展任务指标构成。

终结性评价根据课程标准和学院教学规定组合期末考核试卷和小组总结汇报进行测定。增值评价是以课后测试成绩和课前测试成绩增加值计算成绩增值率,按照教学管理制度进行折合成增值评价分数。课前简单任务测验和课后拓展任务分层测试形成的数据对比促进学生学习效果数据化、定量化和显性化,课前问卷调查和课后问卷调查的对比定性化数据促进学生知识—技能—素养学习提升。学生综合成绩以绝对指标为主,辅以学习对比度、达成度、一致性为主的相对指标,因材施教。每一个 SECI 多模态教学循环中互动—反馈—测试采集的数据,都是数字化平台自动完成,是评价权利分配模型正常运行的前提。

以《数智税费计缴》课程为例,在大数据与财务管理专业 1 班(实验班)和大数据与财务管理专业 2 班(对照班)运行 SECI 多模态教学模式,教学评价结果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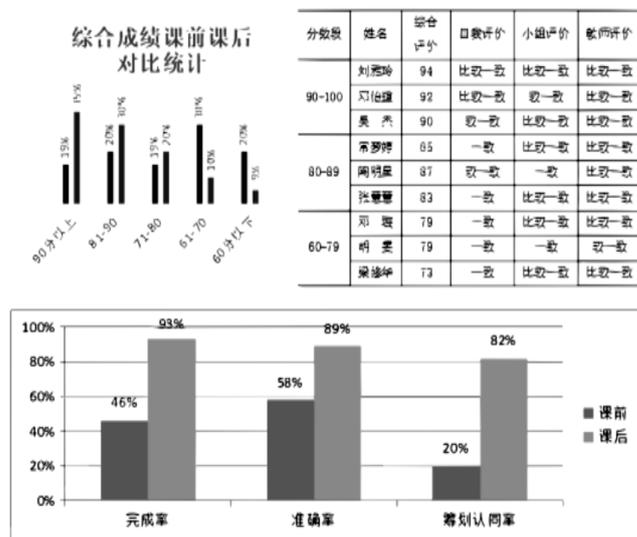


图 1 教学评价

Fig.1 Teaching evaluation

实验班学生综合成绩平均成绩提高了 8.4 分,同比提高 12.8%,最高分及中位度分别提高了 18 和 3.5 分。相对指标,学习目标达成度 86%,测评价结果一致性占 93%,提高了 16 个百分点,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完成率从课前的 67%提升到课后的 93%,准确率从 72%提升至 89%,税收筹划能力评价从 40%认同感提高至 79%。自我认同感和自我满意度大幅提升,达到不同生源分类施教的目的。

四、数字化转型 SECI 多模态教学模式反思与建议

SECI 多模态教学模式嵌入数字化手段,具有实时交互、虚实共生特点,突出职业教育教学特色,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职业教育的实践性和专业性,使学生更好地适应产业需求和市场变化,同时提升了教师的数字化素养。为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如何以 SECI 模式重构高职教学资源,如何让预设性课堂和生成性教学和谐共生,如何均衡经济性原则与学习效果最大化原则,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完成全员、全程、全课程立德树人所有模态数据采集生产实时画像”,教学诊改和教学反思的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一)整合教学资源进行数字化和模态化改造,增强教学模式适应性

SECI 多模态教学模式的实施需要诸如政策、资金及软硬件等支持。首先,学校需要制定如激励性管理制度、教科研项目申报、技能竞赛等政策促进 SECI 多模态教学模式实施与推广。其次,学校以经济性原则配置整合教学资源。学校应根据自身实际,筛选本教学模式最低所需软硬件设施,如多媒体教室、学习通、雨课堂等软件,学生会使用智能手机,实训室有基础的实训软件平台等软硬件设备。再次,教师要深入学习 SECI 理论和多模态教学原理。最后,教师整合教学资源,完成数字化和模态化改造。数字化改造和模态选择要以数字化评价可量化为准,不易量化教学资源尽量不选。如教师可能需要设计多样化的 PPT、音频、视频、文字、图表等模态化资源适用高职学生特点,避免选择口语模态、肢体动作模态等不易量化模态。学情不同,知识—技能—素养目标不同,模态不同,优势劣势各不同。教师应合理配置多种模态组合,力求教与学效果最大化。课中互动环节,可能需要在学通、雨课堂、课程平台和微信群等来回切换,需要关注对学生注意力和互动效率影响。

(二)提升教师数字素养,实现数字技术与教学融合

数字化的本质是人的数字化,高职教与学的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是“人”的数字化转型,即提升教师数字素养。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转”。首先,高校根据教育

部《教师数字素养》制定本校诸如数字化意识、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应用等数字素养标准。其次,高校构建数字素养“测—评—培”机制。高校可通过研训结合的方式组织教师参加数字素养实践,以教师数字化测评定级和考核评价激励教师主动识变、主动求变、主动应变。最后,教师提升数字素养价值认知,积极参加研究与培训。教师要把数字技术与教学技术融合的理念作为专业发展的驱动力,积极开展数字化教学研究。教师要成为 SECI 多模态教学模式的程序员、学习空间的构建者、学习时间的设计者、教学资源的创作者、教学流程的实施者及教学数据的分析者。教师不但要懂数字技术还要恰当地运用数字技术设计教学内容,通过不同的模态资源和方式把晦涩的显性知识内化为学生易理解的知识—技能—素养。技术可以为教师提供提升教学效果的数据,并实现实时采集、及时反馈、适时干预,但教师不可言传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精神、经验等隐性知识却无法用技术进行传授^③,只有技术与教师融合达到人之“慧”与技之“智”合二为一,才有助于高职学生学习效果最大化目标的实现。

(三)完善教学与互动设计,精准数字化教学评价

SECI 多模态教学顺利实施的关键是教学设计,具体包括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目标、教学资源、重难点、教法与学法等设计。首先,教师要根据人才培养方案设计合理教学目标,设计教学重难点、设计教法、设计学法和 SECI 教学循环步骤等,合理规划教学时间。其次,教师应基于各班学情不同适时调整优化多模态组合,发挥不同模态最大的优势,以期达到最大的教学效果。再次,教学互动设计。SECI 多模态教学中,互动能刺激学生的全方位感官,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最终促进显性知识的内化。互动设计是关键一环,包括互动主体、互动模态、互动方式、思政元素等选择。是选择师生、生生还是组组互动,是选择语言模态还是选择非语言模态,是线上互动还是线下互动,均会影响教与学的效果。教师慎重互动环节设计是给予学生完整有序课堂的重要节点,也是 SECI 多模态教学模式执行的核心所在。从次,修改教学设计。SECI 多模态教学模式需要数字化转型、教师、学生、教法、学法、线上、线下、空间、时间等全方位协同,任何一个环

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影响教学效果。因此,SECI 多模态教学设计需多次修改,多次完善,确保教学效果最大化。^[5]最后,精准数字化教学评价。教师要确保 SECI 多模态教学模式运行时软硬件智能感知设备和工具能够准确实时采集记录多模态数据,同时注意多个软件如实训和理论教学软件采集评价数据的融合问题。引用“评价权利分配模型”“综合素养评价”时要结合学生个性化问题,可适当调整分值权重。课后课前测试成绩计算增加值和增值率,把增值评价折算为分值融入过程性评价是提高精准化的重要环节。

五、结语

本文以数字化转型为背景,基于 SECI 理论和多模态教学理论构建了 SECI 多模态教学模式,旨在提高高职学生在课程学习时隐性、显性知识的转化和内化,最终达到提升学生学习效果。大数据与财务管理专业多年多班次的教学模式改革实践表明,该教学模式设计的操作性强,学生课程学习参与度高,学生通过互动感知场、反馈交互场、点评系统场和测试系统场能有效地进行了隐性知识—显性知识—隐性知识的转化,课程学习效果好。此外,为促进 SECI 多模态教学模式的推广,分别从资源数字化改造以增强教学模式适应性、提升教师数字素养以实现数字技术与教学融合以及完善教学与互动设计以精准数字化教学评价等提出相应的教学建议。

(责任编辑:魏琛)

参考文献:

- [1] 张永波.高职院校数字化转型:内涵特征、体系建构与实现路径[J].职业技术教育,2023,44(5):6-11.
- [2] 杨青.知识管理视角下新时代青年教师能力培养路径研究[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1(2):150-156.
- [3] 舒晓杨,王连喜.数字化时代高职多模态教学模式探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3(14):80-87.
- [4] CAZDEN C,COPE B.A pedagogy multi-literacies:Designing social futures[J].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1996,66(1):60-92.
- [5] STEIN P.Rethinking resources in the ESL classroom:Rethinking resources:multi modal pedagogies in the ESL classroom[J].TESOL Quarterly,2000,34(2):333-336.
- [6] 张德禄.多模态学习能力培养模式探索[J].外语研究,2012(2):9-14.
- [7] 赵春荣.多模态视域下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构建[J].开放学习研究,2021,26(5):27-34.
- [8] 童慧,杨彦军.基于多模态数据的智慧课堂教学互动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22,43(3):60-68.
- [9] 陆吉健,周美美,张霞,等.基于 MR 实验的“多模态+人机协同”教学及应用研究[J].远程教育杂志,2021(6):58-66.
- [10] 李倩,侯敏.大学英语混合式多模态设计学习模式研究[J].高教学刊,2023,9(13):72-76.
- [11] 郁文景,周金芝,常雪琴,等.多模态视域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J].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23,38(2):38-46.

Teaching Practice for SECI Multi-mode Teaching Mo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ZHANG Shanshan¹, CHEN Xin¹, FANG Xiaozhi²

(1.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Anhui Technical College of Industry and Economy, Hefei, Anhui 230051;

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efe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601)

Abstract: The core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high school lies in "transform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aching mode is key.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has pain points such as large investment in school digital resources construction, insufficient student learning motivation, low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inaccurate teaching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SECI theory and multi-modal education theory, this paper adopts methods such as case study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take the course "Intelligent Tax Payment" as an example. Following the principles of economy and maximization of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n interactive-feedback-comment-test SECI multi-modal teaching mode is formed.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or integrating teaching resources for digitization and modal transformation, improving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perfecting teaching and interaction design, and accurate digitized teaching evaluation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Key words: digitization; SECI; multi-modal teaching mode; teaching practice

JOURNAL OF WUYI UNIVERSITY

No.7 Vol.43, Jul., 2024

- The Basis,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Zhu Xi's Theory about Method of Self-cultivation
..... LI Shuting(1)
- From Ceremony to Cultural Performance: A Study on the Change of the Hanshan Tea Ceremony in Wuyishan
..... HE Ying(6)
- The Dialectical Connotation and Era Value of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LIU Fuqiang, YOU Qiuli(12)
- Analysis On the Subject Dimension of Marx's View of Historical Progress; Also On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Subject The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HAN Bowen(18)
- The Value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Direc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grity Culture in the New Era
..... YU Xingping(25)
-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ternal Logic,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Practical Orientation
..... LI Yuan(32)
- Venture Capital and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New Third Board of SMEs
..... ZHOU Lei, ZHANG Lifeng(38)
- The Allocation and Construction Dimensions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Charity Trust Subjects
..... XU Donglin(45)
- A Study on the Path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Narrative:
A Case Study of Fujian Business Culture JIANG Yingying(52)
-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Local Traditional Opera in the Context of Media Convergence:
Taking Cantonese Opera as an Example HE Xueling(58)
- Research on the Modern Jewelry Design Based on Suzhou Embroidery Elements
..... HUANG Lukun, YANG Ying(65)
- Age-Friendly and Inclusive Design of Digital Chinese Opera Art Interface CHEN Lei(71)
- Exploration on Telling China's Story Well in Civ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Courses:
Taking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Course
as an Example ZHANG Yunxia, LU Yanlan(78)
- An Analysis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ath of "Party Building+ Aesthetic Education" in Independent Colleges:
Taking the Department of Media and Design of Fuzhou University Zhicheng College as an Example
..... ZHANG Wenchun, LIN Fengchun(85)
- The Discipline Development and Talent Training in University: Theoretical Connection, Analysis Framework and
Synergy Approach CHEN Qingsen, YANG Tianping(90)
-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Peer Exclusion on University Students'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the Intervention
Role of Self-affirmation QI Xinjie, XUE Hanyi, LIAN Rong(97)
- Teaching Practice for SECI Multi-mode Teaching Mo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 ZHANG Shanshan, CHEN Xin, FANG Xiaozhi(104)